

# 关于清除党内 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二)

(党内文件·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办公厅編



## 出版說明

在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在政法系統中揭露出一批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窃据了相当高的职位的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手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們有共同的卑鄙目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無产階級專政。他們強調“司法独立”、“审判独立”、而抵制党的领导；以“無罪推定論”、“有利被告論”来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开脫罪責；提倡所謂“最高监督”和“监督的监督”，企圖把人民檢察院这一对敌人实行專政的工具，轉向对付人民自己；散布“階級斗争息灭論”，宣傳“国家專政职能消失論”，作为取消無产階級專政的理論根据。他們为了达到卑鄙的政治目的，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他們同党和人民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党的組織和广大党员幹部對他們的反动言行，进行了坚决的駁斥和斗争，並把他們开除出党，这是我們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現將政法系統中党組織开除右派分子的決定三十五件，彙集成冊，供縣級以上的黨員幹部閱讀。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

## 目 录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賈潛 党籍的决定.....	( 1 )
——附賈潛簡历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魯 明健党籍的决定.....	( 5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寅 夏党籍的决定.....	( 8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郝紹 安党籍的决定.....	( 11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張向 前党籍的决定.....	( 15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朱耀 堂党籍的决定.....	( 19 )
——附朱耀堂簡历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楊显 之党籍的决定.....	( 22 )
——附楊显之簡历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民庭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田明 中党籍的决定.....	( 24 )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李甫山党 籍的决定.....	( 27 )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党组对右派分子刘惠之的处理 結論.....	( 28 )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党组对右派分子王立中的处理	

結論.....	( 35 )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對右派分子劉汝械的處理	
結論.....	( 41 )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機關委員會關於開除白步洲黨	
籍的決定.....	( 44 )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右派分子	
陳達之的結論和處理決定.....	( 45 )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右派分子	
彭達的結論和處理決定.....	( 48 )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右派分子	
安汝濤的結論和處理決定.....	( 55 )
中共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支部關於開除鮑廷干黨籍	
的決定.....	( 60 )
中共遼寧省監察廳總支委員會關於開除極右分子張	
靜超黨籍的決定.....	( 62 )
中共遼寧省監察廳總支委員會關於開除極右分子方	
一臣黨籍的決定.....	( 65 )
中共廣東省人民檢察院黨組關於右派分子鄭北辰的	
處理結論.....	( 71 )
中共廣東省人民檢察院黨組關於右派分子盧偉良的	
處理結論.....	( 74 )
中共廣東省民政廳分黨組關於右派分子關山的處理	
結論.....	( 77 )
中共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支部關於開除右派分子鄒	
家箴黨籍的決議.....	( 81 )
廣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整風領導小組關於右派	
分子林芳的結論.....	( 84 )
——附林芳簡歷	
右派分子李子萱的反黨言行及中共湖南省委對他的	

处理决定.....	( 86 )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薛一平 党籍的决定.....	( 89 )
——附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三支部关于右 派分子薛一平的政治結論	
中共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厅支部关于开除右 派分子王志坚党籍的决定.....	( 95 )
中共福建省委整風学习班晋江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 極右分子許集美的結論.....	( 97 )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韓述之的处理結論.....	( 103 )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徐亞夫的处理結論.....	( 105 )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鞠华的处理結論.....	( 108 )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关百胜的处理結論.....	( 109 )
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关于右派分子邓声永的政治 結論.....	( 111 )
中共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总支第四支部关于开 除右派分子李俊成党籍的决定.....	( 114 )
中共安徽省監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方碧溪党 籍的决定.....	( 118 )



布后，他說：过去我們办案“拜四門”（意思是指請示党委和征求有關部門意見）今后不这样做了。他認為党委过問具体案件，就是“干涉”了“审判独立”，他說：“党委都管了，还要法院幹什么？死刑案件再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就等于形式”。党为了教育他，曾对他这种錯誤的謬論，进行过批判，但他仍坚持他的看法，他說：“审判独立，我了解是按法律。中国法律不完备是依政策办事，不能独立，將來法律完备了，审判也就独立了”。

賈潛一貫反对中央教育和改造司法幹部的指示。司法改革运动时，曾集中批判了他严重的超階級、超政治的旧法观点和他的以旧法为資本的权威思想，但后来事实証明他根本沒有虛心接受同志們对他的批判。几年来，他經常流露对司改不滿，認為对他批判錯了。他說：“关于我的旧法观点問題，若按分、厘、毫、絲、忽計算，只有忽那么多，我想是可以的，若說我有严重的旧法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說：司改时，他是百元以下的，把他当了老虎打。他長期抱着委屈的情緒，有时唉声嘆气說：“理是直的，路是弯的，历史会作結論的”。賈潛不仅拒绝对他个人的改造，而且也反对司法改革运动，他对这个偉大的运动採取了否定的态度，他經常談到司改中的一些缺点，从沒有談过司改的積極意义。他說：“要批判旧法，必需懂得旧法，不懂就不能批判”。

賈潛几年来反对並抗拒执行机关党组的决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为了貫徹执行中央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关于死刑案件批准程序的重新規定”和了解下級法院审判工作情况，决定今后改判案件必須征求省、市委和下級法院意見的規定，作为党组成员的賈潛在思想上有严重的抵触情緒，賈潛为反对这个决定，不仅在开始时写过一個書面意見，強調提出改判死刑案件应依照法院組織法的原則办事，不應該征求省市的意見；而且当院領導向他作了批評指示后，他仍沒及时貫徹执行，沒有把这个規定向刑一庭审判員傳達布置，（后来由高克林同志亲自傳達布





置)沒有及時解決執行中的一些問題，以致造成刑一庭審判員中較普遍地存在着“維持好辦，發回放心，改判麻煩”的錯誤思想。而賈潛對這種錯誤思想不僅不予批評，反而在庭里說“這樣作不一定對，不一定合乎法律手續。”並且說“這是產生遷就思想的根源，是發生‘錯誤’的原因”。

賈潛在实际工作中，經常以“無罪推定”“有利于被告”等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開脫或減輕罪責，篡改和削弱人民法院專政的職能，他認為在法院未證明被告犯罪以前或者法院判決未發生法律效力以前，應該假定被告是無罪的。他說這是“保證審判案件確鑿有據，防止主觀成見入人于罪的極重要原則。”他常向幹部說：“你們考慮死刑案子，應先考慮被告可以不死，然後再找它是否可以死的原因。”一九五五年開展肅反鬥爭，檢查批判右傾思想時，他認為沒有右傾，（註：經黨組復查不是事實）一九五六年審判日本戰爭犯罪分子時，他一再主張改變中央決定的刑期，要給戰犯古海忠之減刑二年。（註：因領導上不同意，未成。）賈潛這種荒謬的主張，充分證明，他完全站在敵對階級的立場上，不是去鎮壓敵人，懲罰犯罪，保護人民，而是完全相反地在保護敵人，寬容罪犯，打擊人民。

賈潛幾年來，打着學習法律科學的幌子，企圖復活舊法，販賣他的舊法觀點，當領導上指出他的錯誤時，他到處散播不滿情緒說：“有人不懂法律科學，還不讓人家談法律科學。”他甚至無中生有地指責說：“有人認為做審判工作，只要懂得馬列主義一般理論和政策原則就行了，不需要懂得法律科學。”又說：

“法律科學上許多基本原理，如犯罪構成，犯罪階段……等已成為法律科學上的普遍真理。”他污蔑“蘇聯社會主義法學還沒有跳出资本主義法學的范围。”

賈潛不但堅持舊法觀點，借“審判獨立”和“法律科學”來反對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而且還存在着嚴重的特權思想和個人野心，一貫的反黨反領導，幾年來，他鬧待遇、鬧地位，對他

的級別不滿意，認為沒有提級是“吃了黨齡短的虧”。他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長期的進行反黨反領導的活動。對於黨組的決定，他正面不提，背後反對，對領導的批評他認為是打擊，“潑冷水”。他經常在背後陽一句、陰一句散布流言蜚語，貶低領導的威信，說“領導同志業務是外行，只有政治口號，不懂法律”，他埋怨“領導對他不信任”，“說話不頂事”，認為領導委屈了他，常以“尉遲恭，敬德之感”，來形容他的處境，以博取別人的同情，以致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曾有人為他抱不平說：“賈庭長是後娘生的，不被重視”，“兩頭受氣”。

賈潛是黨組成員，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刑庭庭長，直接掌握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他的地位和他所擔任的工作的重要性，使他所犯的嚴重錯誤，在政治上、組織上造成的危害，影響是極端嚴重的。他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蝕了我們一部分幹部，而且在實際工作中使我們作為人民民主專政武器的審判工作，脫離政治、脫離實際而變得軟弱無力。從這次整風運動中刑庭已經揭露的事實來看，不少過去沒有學過舊法的人，在賈潛的舊法觀點侵蝕下，逐漸模糊了自己工人階級的意志，甚至喪失立場，配合右派分子向黨進攻，反對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由於賈潛一系列反黨、反領導的活動，使刑庭一些同志迷失了方向，把刑庭的審判工作引導到了嚴重錯誤的道路上，使刑庭審判工作嚴重的脫離黨的領導，走向右傾以致脫離實際、脫離政治的傾向。為了嚴肅黨紀和純潔黨的隊伍，支部大會一致通過開除賈潛出黨。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 附：賈潛簡歷

賈潛，原名賈榮卿，曾用名賈君毅，男，一九零三年生，河南滑縣人，大學畢業，地主成份，舊律師出身，一九四二年參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入黨。參加革命前，曾任：偽山東省民政廳

科員，代理科長，山東省府單行法規編委會委員、山東濟寧鄉村建設實驗區長官公署政治顧問兼管軍法，滑縣承審員，滑縣抗日民主政府科長。參加革命後，歷任：冀魯豫行署秘書主任，司法處長、高等法院副院長，晉冀魯豫邊區參議員，晉冀魯豫、晉察冀兩邊區高等法院院長，華北法院審判長。現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廳廳長，黨組組員。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支部關於 開除右派分子魯明健黨籍的決定

魯明健，男，41歲，湖北武昌人，地主家庭出身，學生成份，大學肄業。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七年參加工作。歷任：副縣長、縣委副書記、專員、市委副書記、前中央政法委員會參事、政法五機關黨委副書記、政法幹校教務處副處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魯明健公開宣揚無產階級專政取消論，反對對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實行專政，反對黨對人民法院的領導。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一、魯明健攻擊一九五五年社會肅反運動，污蔑反右傾的方針是無的放矢，是造成錯案的主要原因。他說：“來勢很猛很急，反右傾的壓力很大”、“我們不加分析地一股勁反右傾”。他又說：“錯誤來自上級，來自中央（不是黨中央）。如反右、捕殺數字、外調勞改犯、一攬子等等，都是中央貫徹下來的，其中根本問題是右不右的問題”。“說法院右，至現在未加糾正。”他把肅反審判工作中由於對某些政策界限區別不清，發生個別錯判案件的事實加以夸大，歪曲說是盲目反右傾造成的結果，他說：

“我不同意把政策界限放在首要原因，領導思想是首要原因。”

並否定社會肅反運動的偉大成績說：“上面歪一寸，下面歪一丈。”

二、魯明健極力反對一九五七年春為加強同刑事犯罪分子的鬥爭而採取的反右傾，搞運動的方針。他攻擊這是指導思想的錯誤。他說：打擊刑事犯罪反右傾、搞運動，“用這種精神作指導思想，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若再反右，會造成混亂。”

三、魯明健公開宣揚無產階級專政取消論，篡改國家的專政職能。他認為我們國家的專政職能消失了。他說：“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國內形勢起了根本變化，階級關係變了，這時再強調鎮壓，就不對了。現在的主要職能是組織經濟文化職能。”他還認為人民法院有“懲罰與教育”的雙重任務。一九五七年春季以來，他宣揚人民法院現在主要是調整人民內部矛盾的任務。

四、魯明健篡改黨和國家對於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貫實行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他說對於反革命“從寬是主要面，但必要時也有從嚴。”他甚至荒謬地認為強姦犯、盜竊犯和流氓等壞分子都是人民內部問題，“絕大多數是勞動人民”；他認為對這些犯罪分子“多數要依靠教育改造”不能強調懲辦。

五、魯明健以所謂“法制”抵抗黨對人民法院的領導。他認為黨的領導對公安、檢察、法院“三機關相互制約和法院獨立進行審判的積極性，起了某些抑制作用。”他誣蔑黨的領導是產生錯案的根源，攻擊實現黨對人民法院的領導的聯合辦公室“從形式上看是按照法律規定執行的，但實質上仍是‘一攬子’的作法”。因而有三個“弊病”：“往往容易犯主觀主義”；“削弱了互相制約作用”；“有時審判人員通過審理發現案情有出入或量刑不當，提出不同意見，往往得不到支持，使得某些錯案得不到及時糾正。”他並且污蔑黨的領導是肅反運動中的“黑暗面”，公然提出“黨委過問具體案件是值得研究的。”他還說：“搞運動往往時間短，任務急，勢必造成一攬子，妨礙依法辦事。……如果搞運動是否會把幾年來辛辛苦苦建設起來的法制制度（指法

院組織法）又冲垮了。”他所謂加强“法制”的目的，實質上是束縛国家机关对敌斗争，制裁国家工作人員。他誣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員“普遍的違法乱紀”，司法机关違法乱紀更严重。又說：“只有加强法制，才能扫除这些消极因素”。

長期以来，魯明健坚持上述反动观点，在工作中向党向领导对抗，並且利用在北京政法院、校、政法学会講課和座談会的机会散播反动言論，流毒四方。

六、魯明健还趁着这次整風的机会，进行反党反领导活动，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歪曲和捏造事实，公开地攻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和党组副書記高克林同志。攻击党组“不按党章办事。”是“少数人包办代替”；誣蔑高克林同志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並且进行人身攻击；捏造“高院的癥結所在，就在高克林同志身上”，“就是沒有揭开”等煽动性言論，在群众中制造混乱。

魯明健在政治品質和思想作風上狂妄自大，吹嘘自己，貶低別人，欺上压下，兩面三刀。魯明健的反党反领导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充分証明他已經墮落为反动的資产階級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將魯明健开除出党。在反右派斗争中，魯明健对自己的反动言行，檢討較深刻，悔改較好，还应当在今后繼續进行脱胎換骨的改造。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支部关于开除 右派分子刘寅夏党籍的决定

刘寅夏，一九三八年入党，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党总支候补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兼审判组长。

刘寅夏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不仅不依据党的方针政策行事，依靠党的帮助和指导，把自己的工作严格地置于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相反的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拒不执行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对审判工作的指示和规定，生怕党来“干涉”他的工作，向党闹“审判独立”，主张“有利被告”论。使审判工作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不能及时而有力地惩罚犯罪、打击敌人，大大地削弱了人民法院作为专政工具的作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刘寅夏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严重地丧失立场，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已经完全丧失了党性，成为敌对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刘寅夏一贯反对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不执行党的指示和决议，主张“审判独立”。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为了贯彻执行中央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关于死刑案件批准程序的重新规定”和了解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情况，决定改判案件，必须征求省市委和下级法院的意见。刘寅夏对这一规定不但没有很好执行，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他说改判案件征求意见的制度是“劳民伤财”，“容易是非不分”，“破坏法制”。认为改判案件征求意见的结果是“维持好办，发回放心，改判麻烦”。他说：“由于征求意见麻烦，产生差不多的思想”。把“迁就思想”和产生“错案”的原因，都归咎于这一制度，他说：“由于没有一个准，下级法



院不同意，省委不同意，打電話也不大好說，為了照顧關係，覺得維持好辦。以致工作象斯大林一樣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不僅這樣，劉寅夏還散布流言蜚語，破壞領導威信，一九五五年他處理山西呂白二則破壞交通案，高克林同志指示他打電話征求山西省委的意見，他却叫一書記員去征求承辦該案的書記員意見，高克林同志批評了他，他便在組內散布不滿情緒說：“高副院長批評我為什麼不服從他的指示，我劉寅夏自參加革命一貫是服從領導執行指示的”。

劉寅夏的反黨行為表現是多方面的，他在調查湖北李知本案件時，以所謂“法律科學”，大肆攻擊當地黨委，對湖北省監委因李知本案向中央監委的報告，公開表示反對，他說：“這個報告寫的太籠統。”“這個報告的一些結論，我不同意。因為是推測的，缺乏事實根據和事物的內在聯繫，自然也看不出因果關係來”。他還污蔑湖北省監委同志“指鹿為馬”，把自己的反黨行為自夸是“三戰呂布”。在整風運動中，右派分子攻擊我們法院工作時，劉寅夏質問我們法院“是否講是非”。

劉寅夏在實際工作中，受到舊法觀點的侵蝕，存在著嚴重的資產階級法律觀點，主張“有利被告”論，認為最高人民法院發生“錯案”原因之一，是“對被告有利方面考慮不夠”。說我們處理案件“大胆宣告無罪的少”。把犯罪分子的嚴重罪行，借口是“思想落后”，對“生活不滿”而發洩出來的“落后言行”，以開脫罪責。

劉寅夏借口“法律科學”，反對反教條主義，向法院向領導進行攻擊。他說：“法律科學是個好東西”，但“院裡不支持”，污蔑“院領導非常主觀，不懂法律科學”。黨對劉寅夏這些錯誤，曾經有過批評，但他不正視自己的錯誤，在整風運動中，還惡毒地攻擊領導處理案件“不從法律科學角度研究問題”，而是“用行政命令來解決問題”。

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劉寅夏不但沒有貫徹執行黨的方針，相



反的，却歪曲历次整風运动說：“整風整过好几次了，内容大体相同，每次运动都是热火朝天，以后又恢复了。……弄的当面点头，背后摇头，就不好，因为想到运动以后，怕又复了員，開个有意见，長期隔閡”。他說：“一九四二年整風，大会上開，号召坦白，一陣風就过去了，作用不大，不解决问题”。

刘寅夏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場来对待整風运动的。当我们对右派分子开始反击的时候，他对一个有严重錯誤的書記員說：“你是党的培养对象，因为我对你負責，你要知道批評別人，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思想，缺点暴露多了与你没有什么好处”。刘寅夏对待別人的錯誤，就是採取这种容忍包含的态度。在反右派斗争中，刘寅夏竟向右派分子拉关系，洩露組織机密，他对一个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說：“你不过是司改时批判了一下有些情緒，没有什么目的”。並向右派分子討好說：“批判你时我們都受过批評”。作为刑一庭整風领导小组成員的刘寅夏，已經完全背叛了党的立場。

在整風运动中，刘寅夏为了掩盖自己的錯誤，到处活动，宣揚自己沒有問題，为了爭取別人的同情，他对一些有錯誤的青年說：“你没有什么問題，是青年，跟着人家跑”。甚至为了否認自己的錯誤竟要挾做记录的同志修改记录，並謾罵人家是“混蛋”。刘寅夏对人对事对自己对別人都缺乏批評与自我批評的精神。

刘寅夏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他不是整風运动中一时認識不清而犯了錯誤，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他虽然在革命队伍中經历了二十年，但在思想深处蘊藏着可恥的个人主义思想，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

在組織上，刘寅夏突出地表現了無原則和無組織性，把旧社会一套拉拉扯扯的庸俗的作風帶到党内生活中来，他注意私人关系，而不重視組織原則，不以严格的原則态度来要求自己 and 同志。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竟不惜洩漏組織机密，無論

在肅反問題上、整編問題上、發展組織問題上，以及這次整風運動反右派鬥爭中，都發生過這樣的問題。可是劉寅夏卻沒有正視這些嚴重的錯誤，相反的還處處尋找借口，企圖說成是合法的行為。劉寅夏在這嚴重的鬥爭關頭，不是忠誠老實地勇于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是採取投機取巧的辦法，企圖蒙混過去。

在思想作風上，劉寅夏處心積慮追逐個人威信，兩面三刀，拉攏打擊，他對領導對同志都是採取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兩面手法。當觸及到他的痒處時，他就明槍暗箭進行反攻，或者是暴跳如雷，追查質問，例如1956年評選先進工作者時，支部書記提到他在1955年肅反運動中有右傾，大家不同意提他為候選人時，他便暴跳起來，聲言“這場官司一定要打”，第二天他便質問總支書記為什麼說他有右傾。

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劉寅夏在階級鬥爭的緊要關頭，配合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進攻，充分地暴露了他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為了嚴肅黨紀，純潔黨的隊伍，支部大會一致通過開除劉寅夏的黨籍。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支部 關於開除右派分子郝紹安黨籍的決定

郝紹安，男，三十四歲，山西洪洞縣人，中農出身，學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參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五月入黨，歷任戰士、班長、排長、連指導員、團保衛股長、師政治部聯絡科長等職，一九五〇年轉業，任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員。

在這次整風運動中，郝紹安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道向党進攻。他反對黨領導審判工作，攻擊黨領導的司改運動，否定黨領

導審判工作的成績，丑化領導，誣蔑審判委員會。

郝紹安主張資產階級的“審判獨立”，反對黨領導審判工作，反對審判工作為政治服務。最高人民法院黨組為了貫徹執行黨中央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關於死刑案件批准程序的重新規定”的指示，和使審判工作更好的為政治服務，防止孤立辦案，決定改判案件必須征求省、市委和下級法院的意見。郝紹安對這一決定大為不滿，在大鳴大放時，惡毒的進行攻擊，說：這一決定是“以黨代政”，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是對“審判員的不信任”，這樣做“影響審判員在工作上的鑽研性和積極性”。主張取消這一決定，企圖使審判工作離開黨的領導。

郝紹安惡意的攻擊黨領導的司改運動，詆毀黨的幹部政策。在鳴放期間，郝紹安也和其他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樣，以學習“法律科學”為借口，攻擊黨粉碎舊法觀點和批判教條主義的措施。他說：“領導思想以為政治可以代替業務，一見科學有些抬頭，就一棍子打死，說是舊法，所以儘管在學，但領導不支持，貫徹不到實際中去”，“從這方面看，對法律科學研究，不是提倡而是壓制”，這是領導的“孤立的政治觀點，不重視法律科學，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

郝紹安對我黨的幹部政策是仇視的。他說：“人事部門總以為黨員好一些”，這種“宗派主義情緒在司改後有這種遺風”，實際“有些非黨幹部並不比黨員差，司改後強調清一色，一直沒有改變”，“形式上重政治質量，實質上是政治工作非常差”，“審判員、助審員單純強調政治質量，不重業務，這樣自然形成宗派主義。故對學過司法的，認為有舊法觀點不信任”。叫囂要“換一批文化水平高的人”來擔任審判工作，希望使那些不堪改造的舊法人員來掌握專政武器。

郝紹安為了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僅對黨領導審判工作和黨領導的司改運動加以攻擊，同時也對黨、政領導加以丑化和誣蔑。郝紹安把黨、政領導依照黨的政策方針處理案件的事實，顛

倒黑白的說成是依照“个人的意見”，渲染是“刑事案件与院長的矛盾”。把副院長高克林同志亲自办案，詆毀为“走形式”，是制造“麻煩”。誣蔑高克林同志的“审判思想抓不住，这样判也不对，那样判也不对”。領導“对庭的审判工作不重視，对审判工作只是摆門面，实际是审判工作第二”。他積極配合资产階級右派分子攻击审判工作“出入人罪”、“無法可依”的論調。

郝紹安为了把党領導的审判工作形容成“漆黑一团”。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也大加誹謗。他說：审判委员会討論案件是“够瞧的，有些簡單道理也不能說服人”。“根据什么原則处死，沒有个准”，“到底起什么榜样不明确”。他完全抹煞了审判委员会正确貫徹执行党的政策方針的事實。

郝紹安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攻击最高人民法院不民主。他捏造說：“我院領導与被領導之間，鴻溝相当深，下边提意見，上边不吭声，打击民主情緒”，“高院有这样風气，誰提意見多了，誰就倒霉”，“高副院長在大会上表示很民主，号召大家提意見，实际是独断專行”，“我院民主作風不够，与高副院長独断專行分不开”。

郝紹安在大鳴大放中，積極为右派分子呼冤叫屈，同右派分子一唱一和的攻击党。郝紹安把最高人民法院几年来同一貫坚持资产階級立場、宣揚资产階級法律观点的右派分子賈潛的斗争，惡毒的說成是党的“宗派主义”，是“輕視業務”。当右派分子朱耀堂不怀好意的說：“高院領導在审判监督的問題上与董老的思想不同。最高人民法院是通过审判来监督下級法院的工作。不能發指示，而高副院長認為监督就是領導”的时候，郝紹安就接着說：領導上“对审判监督的意义体会不到”，“高副院長不能体会董老意圖”。从上述事实中，明显的看出郝紹安是把党作为他的斗争对象，而把右派分子作为他的同盟軍。

郝紹安在日常处理案件上，違反党的政策原則，明目張胆的

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責。反革命犯周承澍，在一九三〇年，携我党营救遇難同志經費一万八千元逃跑，一九四七年又在国民党报纸上写文章辱罵我党和人民政府。江苏省高級人民法院以背叛革命拐款潛逃罪判处周犯有期徒刑5年。周犯上訴，郝紹安竟欲改判免于周犯的刑事处分。在他拟的判決中說：周犯“叛党后並未进行反革命活动。在伪报刊上謾罵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是在上訴人（周犯，下同）早已經变成商人和資本家，只能是出于阶级本性的反动思想行为，故均不構成反革命罪。但上訴人拐走共产党营救遇難同志的巨款，确实給共产党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損失，已構成貪污罪。但因事情發生在二十七年以前，与現行貪污不同……因此原审判刑不当”。后經审判委员会討論，批駁了郝紹安的荒謬主張，維持了原判。这充分說明了郝紹安是完全站在反革命罪犯的立場上，为反革命犯作义务辯护。

郝紹安向党猖狂进攻，不仅表現在大鳴大放阶段，而且在反右派斗争的深入阶段，他仍然散布反党言論，用以蠱惑和煽动別人对党的不滿情緒，並推卸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責。高克林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全院幹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刑一庭存在着“审判独立”、右傾等等根本性的問題后，郝紹安在十月十五日到十月二十三日五次小組会上，仍然不断的暗放毒箭，說：“改判案件征求省、市委和下級法院意見的决定，在高副院长一九五五年談后，打电话的方法問題沒有解决，以后就慢慢發展了”，“有些人从打电话方法上，已滾入了审判独立的泥坑”，“但方法問題沒解决，也有一些責任”。他企圖把刑一庭一些人反对党领导审判工作的責任，推到党、政领导的身上。同时他还繼續誣蔑院的“审判委员会討論案件有的不明确是事实，該杀不該杀的道理是什么？体现中央政策在那里？”並煽动的說：“鳴放时全院各單位都只是放，未提出反对意見，这不仅是刑庭問題，故領導上提法要全面一些”。“刑庭犯了錯誤，有幸災乐禍的”。

郝紹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不是偶然的，在他参加革命前，是沾染了浓厚的升官发财的资产阶级思想。参加革命后，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並未徹底改造。近几年来，他在政治立場上日趋右傾，驕傲自滿，自以为是和反党反领导的“抗上思想”愈益發展，斤斤計較个人得失，对党和领导心怀不滿，已經由一个共产党员蜕化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而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期，就必然的暴露出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面孔，向党惡毒地进攻。为了严肃党纪和純潔党的組織，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郝紹安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支部关于开除 右派分子張向前党籍的决定

張向前，男，四十六岁，河北省曲陽县人，富农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分。北平大学法律系畢業，一九三八年二月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一月入党。历任县司法科長，專署司法科長，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推事，华北人民法院审判長，組長，最高人民法院前华北分院副庭長，庭長等职。一九五四年九月調任本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兼組長。

在这次整風运动中，張向前的許多言行，是和右派分子賈潛、朱耀堂、林亨元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相呼应的。首先他反对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主張审判独立。本院党组为了貫徹执行中央“关于死刑案件批准程序的重新規定”，决定凡是改判死刑案件必須征求省、市委的意見；以后又决定改判一般刑事案件应征求下級法院的意見。張向前对党组这一正确决定不但不去努力貫徹执行，相反地却大肆进行誣蔑，他說党组这一决定“形

成审判人員的‘維持好办，改判麻煩，發回放心’的思想”。不仅如此，他还把党组这一决定誣蔑成是为了“照顧关系”，是“宗派主义情緒”。这就是說，法院审判案件党委不能过問，实际上是反对党对审判工作的領導。他認為只有“审判員操生杀予夺之权……但我們強調下級服从上級”。这就很明显地暴露了張向前反党的“审判独立”的实质。

張向前还攻击領導上对中央的政策不傳達，不研究，不貫徹，誣蔑审判工作有法不依，並把我們的审判工作宣揚是漆黑一团。他在刑庭审判員、助审員座談会上說：“在执行政策上，一个政策公佈后，很少具体貫徹，甚至沒有”。一九五六年刑庭年終总结时他說：“在法制观念上，應該強調法律，依法办事，但我們实际做法上法制观念不是那么强的。如处理貪污案、反革命案很少根据貪污条例、反革命条例判处的。原判不引用条文，我們也不引用。对于加刑，也乱来一道，有的由三年加五年，五年加七年，七年加無期，無期至死刑，我們想怎样就怎样，沒有按法处理”。

張向前还打着“法律科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階級法律观点，片面強調“有利被告”，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开脫罪責。在一九五六年刑庭年終总结大会上，他說我們的判决书“……不講道理。……对人家有利的不說，只說不利的”。例如他在办理案件中，对伪軍出身、夜間潛入栗姓妇女家中企圖强姦犯支万林，因栗母久語不睡而仇恨，当栗母出屋查看屋門时，即將母栗砍伤一案。張向前認為支犯“强姦是預备行为”，“未發生严重后果”，企圖为支犯开脫死罪。再如对先后四次姦淫一个十一岁幼女，被控告后竟持刀行兇拒捕，砍伤公安人員，並企圖杀死張姓全家的罪犯齐福来，張向前認為“强姦幼女，預备杀人，严重是严重，后果不是太严重，仅有危險性，判死刑是否过重？”“沒有法律，量刑不好办，往往我們是佐刑，几种罪在一起就沒边，按合併論罪來說，沒有一个判死之罪，不論再有几个



罪，也不能处死的”，主張不判齐犯死刑。又如周承澍背叛革命携款潛逃一案，周犯一九三〇年曾任我党全国互救总会常务委員，經手党营救遇难同志的經費。周犯于同年十二月叛党潛逃，並將上述經費一万八千元（当时幣值）拐走。一九四七年周犯在国民党报刊上撰文謾罵党和人民政府。張向前認為“多少年以前的事，情况变化了，携款潛逃沒有投敌，不是反革命”，“拐款潛逃算貪污，已过二十七年了”，“謾罵共产党是普遍的思想問題”。他主張“严格說应按無罪处理，迁就一下就免于刑事处分”。

張向前还反对批判教条主义。刑庭在一个时期內，对于学习法律科学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傾向，院領導根据这种傾向进行了批判，他不但不接受，反而对院領導表示不滿，說：“我們曾經有一个时期強調法律科学，但为了反对教条主义而沒有坚持下来，如果坚持下来，可能少出些錯誤。由于沒有利用法律科学分析问题，所以不犯罪的也主張判一点”。他甚至誣蔑院領導“不重視業務，也不研究業務”。說：“审判委員會討論重大案件，一般說后果严重，手段殘酷，情节恶劣，这几句話就决定把人杀了。……同时也沒有結合法律科学分析案情。……审判委員會討論案件，体会政策精神很少”。企圖在审判人員中制造混乱。破坏院領導、党組和审判委員會的威信。

張向前在鳴放中为右派分子賈潛鳴不平，誣蔑和丑化院审判委員會。他說“賈庭長說話不頂事，……我感覺誰当权誰頂事，刑庭的人不当权，故不能解决。”他对民庭張开基同志說：“刑一庭主要的矛盾是对院領導的矛盾，刑一庭在高院吃不开，很多同志不願在高院工作”。又說：“审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时，曾、何（按：曾汗周、何蘭阶二庭長）一發表意見，案件就决定了，曾、何是哼哈二將”。去年五月二十四日刑二組行政小組鳴放会上当有人說院內有宗派主义情緒时，張向前馬上揮嘴說：“說吧！碰了也不要紧”，进行煽动。

張向前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是消沉的。当批判右派分子楊显之时他不願發言，指定他發言时，他叫別人写稿，也不說明具体内容，在会上把別人写的稿念了几段应付。他对右派分子賈潛的态度也是曖昧的，高副院長在大会上第二次点了他的名，要他表示态度，他才不得不就“赵家富申訴問題”和“維持好办、改判麻煩、發回放心”等話的起因要求說明，根本沒有結合自己的思想观点进行檢查。当領導上再次号召每人进行檢查时，他虽然也写了檢查材料，但却对人說：“翻过来，掉过去，就是这些問題，戴上兩個帽子算了吧”。企圖蒙混过关。

張向前的錯誤絕不是偶然的，是有其階級的和历史 的根源的。張向前出身于富农家庭，受的是資產階級大学法律教育，入党后，虽然接受了党的長期教育，但他反动的資產階級旧法观点，並沒有得到改造。他对党对审判工作的領導，長期存在着一系列对抗情緒。他以反动的資產階級法律观点企圖篡改社会主义的法律，已經發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步。

从上述事实証明，張向前是一个党內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刑庭支部全体黨員一致通过，开除張向前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業經总支委员会討論通过，並經上級党委批准。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总支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支部关于 开除右派分子朱耀堂党籍的决定

朱耀堂，一九三八年入党，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党总支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朱耀堂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他公开地和背地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阴谋活动。

在整风运动中，朱耀堂公开地攻击党组，他别有用心地诬蔑党组说：“党组形式上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少数人包办代替”。“从一九五五年到现在院和党组对刑事方面的方针政策没有很好地研究和具体貫徹，因此造成刑庭工作上很大困难”。认为“院领导和党组对刑庭工作的指导存在问题”。他说“从院首长的分工上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朱耀堂对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他说：“审判委员会问题很多，对案子讨论简单，有的只有一个‘杀’字，或一个‘判’字”。他为了煽动刑庭干部攻击审判委员会，他歪曲事实说：“审判委员会讨论死刑案件三分鐘一个，一分鐘一个，一个上午就十几个，全通过了，究竟审判委员会是怎样掌握的‘少杀长判’”。他把审判委员会说成是少数人包办代替的不民主的形式机构，他说：“审判委员会委员分三级：党组成员委员、非党组成员委员、列席人员”。“在会上往往几个人一发言，其他的人就不说话了”。认为审判委员会不慎重，不民主，有些人有反对的意见也不敢拿出来。

朱耀堂不仅攻击了党组和审判委员会，而且对院领导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他反对院领导同志亲自参加办案，他说这样

做花費相當多時間“真是侍候不起”。他反对領導亲自接待來訪說：“院領導亲自接談來訪很好，但也給我們工作造下困难”。为了煽動刑庭幹部对院領導个别同志进行攻击，他說：“×××副院長審核案件相信秘書，不相信審判員”。朱耀堂对于在工作中的錯誤从来就沒有認真檢查过，他对領導善意的批評採取抗拒的态度，他說：“院首長对刑庭工作只有批評，很少幫助和指导，有的批評起了積極作用，但是有的批評起了消極作用”。

在整風运动中，朱耀堂背着党进行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动。他利用他的院整風領導小組成員、刑一庭整風領導小組長、总支副書記和刑一庭支部書記等合法身份，以参加小組座談会、个别談話的机会，煽動点火，挑撥离間，破坏團結，造謠誣蔑，丑化領導，猖狂地向党进攻。他在小組座談会中作过許多煽動性的發言和惡毒的攻击，但他都不讓作記錄。他說：“高院有哼哈二將”，“是少数人当权作主”，有“当权派”，“一把手、二把手”。並到处点火，把党組成員排列次序，企圖破坏党組的領導核心。

朱耀堂进行反党陰謀活动是有他个人野心的，他公开地向党伸手要地位，他說：“从領導力量配备上也有問題，刑庭党組成員只有賈潛一个，如院里对刑庭加强領導，應該增加党組的成員。审判委員會的成員也只有兩個。我認為应加强党組和审判委員會对刑庭的領導”。很明显，朱耀堂已經道出了要增加刑庭的党組成員和审判委員會的委員，增加誰？自然是他自己。

朱耀堂在刑一庭副庭長任內，党对他是信任的，他虽然不是党組成員，但党組召开會議大多数他都参加了，特別是討論有关审判工作問題，他都被邀参加，但他不仅不坚决执行党組的决定，反而抗拒乃至誣蔑。一九五四年最高人民法院党組为了执行中央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关于死刑批准程序的重新規定”和了解下級法院的审判活动情况，規定改判案件必須征求省市党委和下級法院的意見。朱耀堂反对这个决定採取了巧妙的手法，指示

审判員將不应發回更审的案件，大量發回更审，他說：“我在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提出处理案件採取大量發回更审的办法，第一因改判領導通不过，第二因改判征求意见下边不同意，發还更审好办事。而且發还更审首先从時間上拖一下，原来要杀的，后来就不一定要杀，原来不同意改判的，后来就改判了”。他認為这样做是必要的。由于他这样做，使不少應該及时鎮压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得不到及时的鎮压，严重地削弱了人民法院的專政作用。朱耀堂为了反对党組关于改判案件必須征求省市党委意見的規定，認為征求意见，是造成“迁就思想”和造成“錯案”的原因，他說：“迁就思想的客觀原因，是上面通不过，下面頂”，“發生錯案与迁就思想有关”。朱耀堂为了摆脱党对审判工作的領導，歪曲省市党委审批案件的眞象說：“所謂省市党委，並不一定是整个省市党委，只是党委的个人”。

朱耀堂几年来在刑庭工作中，一貫反对中央反右傾的方针，抗拒領導对刑庭右傾的批評，他說：“刑庭几年来感到压力很大，主要是右傾帽子的压力”。他在实际工作中，強調“对被告有利”論，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开脫罪責，並公开支持賈潛的旧法观点，为賈潛鳴不平，反对院領導对刑庭學習法律科学中的教条主义的批評。

朱耀堂存在着严重的驕傲自滿情緒，几年来由于作了一些工作，表現得沾沾自喜，自高自大，毫不虛心听取領導上的批評和同志們的意見，他十分缺乏自我批評的精神，很少勇于修正自己的錯誤。因此，他对党逐漸滋長着不滿的情緒，同党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致在整風运动中，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便以为时机已到，積極进行鼓动和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他已經完全丧失了党性，成为和共产党员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纪和純潔党的队伍，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朱耀堂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 附：朱耀堂簡历

朱耀堂，男，現年三十六岁，山西省洪洞县人，家庭成份城市小資产階級，本人学生出身。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六月入党，历任晉冀豫区党委特务連排長，一二九师后方政治部保衛部幹事，冀魯豫軍区政治部直工科副科長，区長、組織部長，县大队政委，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审判組長等职，一九五四年任刑一庭副庭長迄今。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支部关于开除 右派分子楊显之党籍的决定

楊显之，一九三九年入党，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員兼組長。

在这次整風运动中，楊显之在階級斗争的紧要关头，背叛了党的立場，对党领导的司法工作，进行恶毒的攻击。他反对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主張“审判独立”。認為法院审理案件，党的领导不是原則，原則是“該怎么办就怎么办”，“依法办事”。他說改判案件征求省市党的意見是一种掩盖矛盾的办法，这种办法不仅不能起監督审判作用，反而使我們工作更被动。

在整風运动中，楊显之明目張胆地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方針、政策的指示。他說：“司改中对資本主义的法律一棍子打死，如批判旧法观点时認為打得最准的是什么‘磚瓦論’，現在看来这种批判是值得研究的”。他誣蔑司改运动是“宗派斗争”，“存在盲目情緒”，“搞时不講道理，不讓說話”，为司改运动中被批判的对象抱冤喊屈，並抹煞司改运动的成績，肆意攻击說：目前全国司法工作“落后”，是由于司改造成的惡果。

楊显之不仅攻击党的领导和党对司法工作的方针政策，而且还猖狂地攻击了党的幹部政策。他說我們使用幹部，重政治輕業務，只注意政治質量，不注意法律知識。說我們使用幹部，不從業務出發，而是從印象出發，從宗派情緒出發。攻擊我們對幹部使用，只要有政治水平就行，而不願承認司法工作的專業化。甚至惡毒地攻擊領導說：“不重視法律科學，就難重視學過法律科學的人或者教育幹部學習法律科學”。右派分子要為舊法人員招魂，楊显之却埋怨我們不重視學過“法律科學”的人。楊显之這些言行已背叛了黨的立場，而完全站到資產階級右派的反黨立場上去了。

楊显之出身於地主家庭，在他的思想深處，存在着嚴重的個人主義思想，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不是忠心耿耿地為黨工作，而是時刻在考慮個人的名譽，處心積慮要當“青天”。

楊显之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間，幾年來嚴重地存在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反對黨的領導，主張“審判獨立”。平常他就反對改判案件征求省市黨的意見，他說征求意见，“是一種遷就，是違法的，也是侵害公民利益的”。他攻擊我們法院的正常活動，誇大缺點，他說：“我們應該宣布無罪的案件，不敢宣告無罪，無罪的判決，還要寫成有罪的判決”。說我們處理案件，“輕信口供”，“判決是口供主義”。

楊显之在工作中忽視當時當地的鬥爭情況，脫離政治，脫離實際，孤立地強調法律科學，積極宣揚“無罪推定”的原則，主張把這個原則運用到審判實踐中來。楊显之在實際工作中還主張“被告有利論”，他攻擊我們處理案件“對被告人的利益不注意，對原判採取庇護的態度”。說我們“論罪科刑不確切，有些罪行論堆”。

在這次整風運動中，當右派分子向黨進行猖狂進攻的時候，楊显之配合黨外右派分子向黨進攻，在這嚴重鬥爭的緊張關頭，



他沒有經得起考驗，背叛了黨的立場。為了嚴肅黨紀，純潔黨的隊伍，支部大會一致通過開除楊顯之黨籍。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 附：楊顯之簡歷

楊顯之，男，四十二歲，山東鄆城縣人，地主家庭出身，學生成份。一九三六年在梁漱溟創辦的荷澤鄉村建設研究院畢業後，在山東范縣等地任鄉農學校教育主任。一九三九年十月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四〇年三月參加工作，曾任區長，縣司法科長，秘書，冀魯豫行署行政科長，司法科長，一九四九年調華北人民法院任審判員，審判組長，同年十月調最高人民法院任審判員，審判組長。

一九四五年在鄆城任司法科長時，因處理楊志家村群眾揭發的反霸案件配合減租減息反霸運動不力，受過批評，一九五〇年因其保存的黨內文件被人偷看，受過當眾警告處分。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民庭支部關於開除 右派分子田明中黨籍的決定

田明中，男，四十一歲，山西省臨汾縣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學生成份，一九三六年五月參加工作，同月參加中國共產黨。歷任我軍政治指導員、團教育股長、旅衛生部政治委員、師政治部組織科長、最高人民法院代理審判員、審判員等職。

田明中是一個有二十一年黨齡的，經過黨長期教育的黨員，過去也為黨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於他出身於剝削階級，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又不能自覺地改造，一有機會就追逐個人名譽地

位，他把自己的斗争历史和在党领导下所做的一些工作，当作丁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要待遇的“资本”，因而居功自傲，自以为是，在工作中总想显示自己“有独到之处”。我们知道党内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企图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把党的事业当作他们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正是这样田明中当个人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就由不满党而一步一步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步，这是不足为奇的。

一九五七年五月整风运动开始后，田明中在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掩盖下，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小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和党的领导人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田明中污蔑党领导的历次运动是“只准左、不准右”，“在会上要说‘左’的词句，反面的意见不能说”，“运动中总要找几个典型，总要有个人倒霉”。他说：“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一整都是特务……结果都没有问题，这有什么成绩？”又说：“三反时把一些好人错误地打成了老虎，后来甄别退款”。对一九五二年的司改运动说：“司法是有继承性的，旧法不是完全没有用”，“旧法人员是可以改造的，过去对旧法人员有宗派主义”，“如郑文同（前华北分院代理审判员，旧法人员）……调到石家庄，人家至今还不满，我们既提不出问题就扣了个帽子”。

他反对党的干部政策，他认为“现在当部长的就当一辈子部长，而许多有才能的人没有被提拔，不合理，应实行改革”。并提出他自己的反动方案“谁有能力谁来搞，不行的就下台”，

“下台后可以养起来，生活困难的可以补助，有苦劳的可以给抚卹金”，他声称：“这是整个干部政策问题，不只是本院”。

田明中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员，极尽丑化、谩骂的能事，指这些人为“泥人”、“玉体”、“特殊人物”。他把高级干部住的“红门”，比作封建统治者的“朱门酒肉臭”，认为“特权思

想与特殊待遇有关”。

他在整風小組座談会上公开散布反苏言論，說：“苏联說什么都是他們發明的”真有些“阿Q式”。並污蔑我們“把苏联都說成是香的是教条主义”。据同志們揭發。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苏共中央处理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反党集团的決定后，田明中很激动地說：“苏联怎么搞的”，“这件事我一輩子也不能相信”。

田明中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企圖为反革命分子表弟賈怀义开脫罪責。（詳細情况見“田明中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

支部大会認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整風运动中应当站在党的立場，本着爱护党、維護党的團結，帮助領導克服“三大主义”以改进工作的原則，实事求是地向党向領導提出自己的意見。田明中却恰恰相反，他是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向党向領導进行惡毒的攻击。事实証明，田明中已經和党和人民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完全丧失了工人階級先鋒战士——共产党员的立場，而蜕化成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加强党的战斗力，为了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右派从党内来向党进攻，为了維護党綱党章、严肃党的紀律，出席支部大会的十二名正式党员一致通过开除党内右派分子田明中的党籍，並报請总支核批。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

##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李甫山党籍的决定

(一) 李甫山，男，陝西延長县人，中农家庭出身，教員成份。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党，任县党部副宣傳委員。一九二七年春参加共青团，两个月后轉为共产党员。一九三〇年冬失掉組織关系。一九三四年到延安国民党办的民团訓練队受訓，同年冬加入哥老会。一九三五年春曾任延長县民团（反动武裝）分队長（在此期間与楊增衍同志發生关系）。一九三五年延長解放后参加我方工作。历任县委秘書，西北保衛局秘書，專署保安科長（地委常务委員），陝甘宁边区保安处办公室主任。晉綏公安总局副局长，晉南行署公安处長，甘肅省公安厅長（省委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办公厅主任，最高人民檢察院东北工作团（处理日本战犯的临时組織）主任，最高人民檢察院二厅厅長。

### (二) 主要錯誤事实：

#### (1) 攻击偵查处理日本战犯的方針、政策。

李甫山在偵查处理日本战犯工作中，就抱有想“表現一下自己”“出出風头”的不純动机与目的。經常散布不滿领导的流言蜚語。整風开始后，他一方面肯定处理日本战犯的成績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則攻击领导对“偵訊日本战犯的方針、政策、方式方法是有錯誤的”，企圖否定领导作用，把处理日本战犯工作的成績窃为己有。

(2) 利用整風时机，到处煽風点火，陰謀搞垮领导。在資产階級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紧要机头，李甫山为了搞垮领导，进行了向群众煽动，背后串連，向外机关活动以及出題目誘惑攻击领导等一系列的反党、反领导的陰謀活动。

(3) 在檢察工作兩條路線的斗争中，李甫山積極支持右派分子刘惠之、王立中的反党路綫，阻撓党組对中央指示的貫徹和實施。

(4) 長期对党不滿，經常抗拒和反对領導。

(5) 压制批評，打击报复，蛮橫無理，惡霸作風。李甫山品質極端惡劣，一貫对批評者实行打击报复，甚至进行政治陷害。

(三) 李甫山反党反領導是一貫的。在这次整風期間，他又向党向領導进行惡毒的攻击。他的錯誤被揭發后，又一直坚持反动立場，抗拒領導和群众对他的帮助，仍以歪曲、捏造事实等手法，繼續誣蔑攻击領導，坚决与党对抗，态度特別惡劣。李甫山不仅是一个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且是一个長期隐藏在党內的个人野心家、陰謀家和坏分子。已經中央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因此，决定开除李甫山党籍。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机关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党組 对右派分子刘惠之的处理結論

(一) 刘惠之，男，云南易門县人，一九〇七年生，家庭出身經營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入党，一九二九年在日本东京求学时被捕，供認了自己是中共黨員，于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間出獄，一九三一年五月間又在北京恢复了組織关系。一九三三年請假到上海后，因惧怕北京白色恐怖，擅自不回北京而脫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云南又与党接上关系，（进入党内情况，本人交代同別人証明不一致，尚未作結論）参加了工

右派  
敵和

甫山  
台陷

他又  
持反  
等手  
甫山  
的个  
因

庭出  
二九  
三一  
敵关  
不回  
进入  
了工

作。历任国民党云南日报編輯，緬甸侨商报社編輯、社長（該报是我党領導的），重庆新华日报編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組長，东北軍区民主同盟軍（起义部队）秘書長、支队政委，东北大学副教育長，人民解放軍第五十軍司令部秘書長、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最高人民檢察署副秘書長，最高人民檢察院運輸檢察院副檢察長。

## （二）主要反动言行：

一、散布“最高监督”、“监督的监督”、“二線监督”等謬論，篡改檢察机关的專政职能，並把檢察机关駕于党和其他国家机关之上。

中央指示檢察机关的任务是办理反革命和其他刑事案件，而刘惠之却說“这样一来就把檢察机关的性質改变了，就不成为法律监督机关了”，又說：“和犯罪作斗争不是檢察机关的專有任务”，“檢察机关若只起調查、偵查的作用，其作用就小了，其机关也就可有可無了”。他把檢察机关的打击鋒芒指向国家机关和幹部。他特別強調监督一切的一般监督工作，說：“以中国情况而論，我国基層組織的違法決議、命令就比較多了，幹部的違法乱紀情况就更多了”，“違法現象很多，單靠一些監察机关还不够，还需要檢察机关的监督”。他对于行政主管部門和国家監察机关的檢查监督工作是不信任的，認為这些机关在监督違法中还会發生違法，必須由檢察机关再对它們加以监督。他說：“虽然有这些机关管理違法，但不是就沒有違法，或是所有違法都能依法解决，因此就需要檢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来进行，……这也就是檢察机关的监督的监督、最高的监督”。关于偵查监督工作，他主張“以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公安机关在打击犯罪中的“違法行为”，实际上是限制和束縛对敌斗争的手足。关于审判监督工作，他強調“保护被告权利”。

从刘惠之的一貫表現来看，他对阶级斗争是漠不关心的、消極的，沒有革命热情。早在一九四八年东北解放时，他就对东北

大學的學生說：“在東北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以後主要是向自然作鬥爭了”。一九五一年冬，他代表最高人民檢察署出席指導華東分署召開的第二屆華東檢察工作會議（會議內容討論、檢查、總結鎮反工作，討論改變體制，布置一九五二年工作），但他在講話中竟根本未提到鎮反工作。一九五六年以來，他更強調說“階級鬥爭結束了”、“群眾運動結束了”。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主持召開的九個運輸檢察院檢察長座談會上，當幹部提出要他報告敵情時，他置之不理，而對彙報中提到的公安機關的缺點錯誤却很感興趣，立即指示幹部加以整理。他主持制定的一九五七年運輸檢察院工作計劃，對於對敵鬥爭也只字未提。特別是在辦理案件中，他站在地主、反革命分子的立場上，以無罪推定論、有利被告論為罪犯開脫罪責。在他審查批辦的二十二件案件中，即有八件是為地主惡霸、反革命和其他罪犯開脫罪責的。例如，在肅反運動中，廣州鐵路局的一個肅反對象來斐成殺死了肅反積極分子唐福秋，很明显是一個現行反革命殺人案件，但劉惠之卻說“來斐成只恨唐福秋一人，殺死了他，而沒有恨所有肅反幹部”。因此他認為不是反革命殺人，並說：“如果一定給他戴上反革命帽子，他就是死也不會冥目的”，充分表現了他是同情這個反革命分子的，而對被殺害的積極分子則說是“笨蛋”。地主惡霸分子沈東為土地糾紛殺死中農沈之敬一案，劉惠之認為二人沒有剝削和從屬關係，因而不是階級仇殺，而是一般仇殺，主張減刑。

同時，劉惠之關於最高監督的說法，實際上是主張由檢察機關對國家工作實行最高監督，因而同黨分庭抗禮，爭奪領導權，因為只有黨才能對國家工作實行最高的領導和監督。

二、反對黨領導檢察機關，廣泛散布黨不應領導檢察工作的謬論。

從劉惠之領導運輸檢察院以來，即一貫反對黨領導檢察工作，特別是自一九五六年八月運輸檢察院體制座談會後他利用開



業務會、視察工作、同有關部門座談、向黨委彙報等各種機會，廣泛散布反對黨領導檢察工作的謬論。據已經查明的，他曾在兩次業務會議上和在濟南、鄭州、廣州等地視察工作中散布這種謬論。他說“黨委不熟悉法律”，“不懂業務”，“企業黨委領導檢察機關不合法”，黨委領導和監督檢察機關辦案“會影響幹部積極性的發揮”，是“黨政不分”。因此，他企圖把黨的領導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不許黨委過問案件，他說“黨委的領導，領導什麼，應該是方針政策的領導，屬於純業務性質的問題，黨委不應干涉，否則就成了黨政不分”。他還把黨委的絕對領導，降低成業務機關的附屬品，說辦案“真如有偏差，黨委可以向其上級機關提意見”，不許黨委直接糾正。他還把黨對檢察機關的領導看作是暫時的過渡的現象，說“將來幹部的政策法律水平提高了，即可以使用制約作用，不必黨委批”。他甚至還把企業黨委看作是被監督的對象，說“被監督的領導檢察機關是有矛盾的”。總之，他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黨對檢察機關的領導。

劉惠之不僅口頭上散布上述反黨謬論，而且他曾向山東省檢察院提出要在濟南鐵路運輸檢察院試驗不要黨委過問具體案件的問題。由於他的上述反黨謬論，不僅造成了某些運輸檢察院的幹部和黨委的關係不正常，並且運輸檢察院的右派分子（如錦州鐵路運輸檢察院代理檢察長尚永祿），就是拿着他的謬論向黨進攻的。

三、抗拒中央對檢察工作的指示，企圖把他所領導的運輸檢察院變成獨立王國。

1. 否定中央對檢察工作指示的正確性，拒不執行中央的指示。

中央一再指示，檢察機關的一般監督工作基本上不要作，但要保持這一武器。而劉惠之卻說“一般監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檢察工作同資本主義國家檢察工作的根本區別”。他認為中央的這個指示是違反法律的，他說“如批捕起訴、出庭支持公訴不全部

担負就是違法，但其他条不执行就不是違法嗎？”他曲解彭真同志指示的精神，他認為彭真同志仅是根据莫斯科市只抗議了一件一般監督案件，就說苏联实际上沒有做一般監督工作。他說：“苏联出版的一些書刊上介紹了許多一般監督工作，几个苏联專家和去年来的代表团也介紹了不少，我們到苏联去，他們也介紹了許多經驗，难道人家是撒謊？”他又說：“苏联司法代表团回国后写給我們几个司法机关的信中，还是要我們加强一般監督，怎么能說苏联对一般監督也有所改变”。他还在高檢院五十八次党組扩大会上質問領導上“一般監督究竟是要不要呢？还是暂时要？”此外，他还不同意中央关于通过批捕、起訴进行偵查監督工作，不要把監督面搞得过寬的指示。

对于中央对一般監督的历次指示，他从未向他所領導的运输檢察院作傳達，相反的，他在布置和視察工作中，屡次強調一般監督工作的重要性。甚至一九五七年一月少奇同志对一般監督工作作了指示后，他仍然違背中央的精神，在二月間派出四个工作组到北京、东北、上海、济南、广州等地貫徹他对一般監督工作的布置，三月十三日他还在广州铁路运输檢察院全体幹部會議上再次強調一般監督的重要性。在今年四月中央書記处再次对一般監督工作作了指示后，他还对齐齐哈尔和广州铁路运输檢察院的檢察長說：“一般監督工作仍应按照运输檢察院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座談会的精神，把它搞起来”。他違背高檢院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檢察長會議上所确定的以批捕、起訴、出庭、劳改監督为一九五七年的主要工作的决定，坚持执行他自己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关于运输檢察院的各項業務全面发展的布置。

刘惠之拒不执行党的指示，可是对于右派分子黃紹竑对党的誣蔑和攻击却積極加以支持。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运输檢察院召开的九个运输檢察院檢察長座談会上，他把黃紹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上以攻击檢察院起訴書为名来誣蔑肃反运动的發言，（关于起訴書部分）在会上照样宣讀，並布置考慮貫

微。

2.企圖把全國運輸檢察院變成實行垂直領導的獨立系統。他強調運輸檢察院的特殊性，認為在工作上應根據特殊情況，統一布署，統一行動。他主張業務上的垂直領導，不同意由省、市檢察院領導各地運輸檢察院，並擅自改變省、市檢察院對當地運輸檢察院的工作指示和決定。他還準備在高檢運輸檢察院設立人事處，垂直管理幹部。他強調高檢運輸檢察院是一個獨立單位，並曾主張把高檢運輸檢察院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水上運輸檢察院”。

劉惠之鬧獨立性、鬧分散主義的活動，是受着他的資產階級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支配的。他不滿意現任運輸檢察院副檢察長的職務。在刻造運輸檢察院的圖章時，他認為應大於省檢察院的圖章。撤銷運輸檢察院時，他提出免去他的現任職務時，應把他的新職一同公布。

四、散布流言蜚語，進行非組織活動，並且在整風期間，點火煽風，攻擊領導。

幾年來高檢院黨組的工作，是遵守向中央的請示報告制度和集體領導制度的，關於檢察工作的方針任務等重大問題，都是經過會議集體討論和報請中央批准的。但是劉惠之卻進行非組織的活動，散布流言蜚語，攻擊幾年來的方針政策和集體領導。尤其在高檢院黨組擴大會議討論中央對檢察工作指示期間，他和王立中、李甫山進行非組織活動，到中山公園議論對中央指示和高檢黨組的不同意見，當時劉惠之曾煽動說：“講，講，講，擺開講，一定要講清楚”。這一次的活動，實際上是統一他們向党鬥爭的態度。他在高檢院五十八次黨組擴大會上集中地發表了反黨反領導的言論，又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運輸檢察院助理檢察員整風會議上，歪曲事實，點火煽風，攻擊領導。他攻擊“高檢方針任務不明確”、“混亂”、“朝令夕改”；攻擊“集體領導是比較差的，院務會議和黨組會議討論時，還不是知無不言，言

無不尽”、“未能广开言路”；攻击中央关于保持一般监督作为武器的指示，是不遵守組織法，說“到底要不要遵守就成了問題，似乎要遵守，又似乎不要遵守”；把批判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經驗，歪曲为反对学习苏联經驗，質問說“对苏联先进經驗到底学不学？学什么？应明确”；还誣蔑領導上有宗派主义，等等。对于上述意見，刘惠之从沒有正面地向領導上提出过，也沒有在工作中深入实际研究解决業務上的問題。因此，他的目的不是善意地帮助領導上改进工作，而是想在高檢院制造混乱。大鳴大放期間，本院右派分子的許多論調和刘惠之是一致的，証明这些言論是直接間接由他散布的。

在整風运动中，他積極攻击領導，但对反右派斗争却十分消極。高檢院黨組指派他参加北京政法战綫的反右派斗争，会上右派分子对于由共产党员担任檢察員、由檢察机关作出免于起訴决定，以及对張鼎丞檢察長本人都进行了攻击，但刘惠之却無动于衷，一言不發，当領導上要他發言时，他說“人家对檢察院提出問題不多，沒有什么可講的”。在高檢院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說本院沒有右派分子。四厅一个幹部准备写大字报批判右派分子李实育，他对这个幹部說李实育有些論点还不容易駁倒，于是这个幹部就不敢写了，起了阻撓反右派斗争的作用。他对于右派分子誣蔑檢察員必須由共产党员担任这一規定是宗派主义的反动言論，表示同情和支持，說“這個問題今后应当考虑”，还說“这一規定束縛了檢察工作的發展”。

(三) 以上事实，完全說明了刘惠之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本質，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坚持反动立場，走向了公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妄圖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点，篡改无产阶级專政工具的檢察工作的性質，反对党对檢察工作的領導。我們認為刘惠之是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在檢察机关內的代理人，是混入党內的阶级異己分子。經黨組討論决定，將刘惠之划为右派分子。並决定撤銷他原有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

八級降至十二級)。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 對右派分子王立中的處理結論

(一) 王立中，男，湖南永縣人，一九一六年生，家庭出身貧農，本人成份貧農，一九三〇年五月參加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入黨。歷任警衛員、營政委、團總支書、主任、政委、分區支隊長、政治部主任、旅政治部正副主任、師副政委、最高人民檢察署辦公廳副主任、正副處長、最高人民檢察院一廳廳長。

(二) 主要反動言行：

一、反對中央對檢察工作各項方針政策的規定。

自一九五五年以來，王立中長期懷疑中央關於檢察工作方針政策指示的正確性並且拒不貫徹執行。在他確知黨要整風的前夕，就協同劉惠之在今年四月黨組擴大會議上開始更露骨地、更猖狂地向黨進攻。

今年四月中央書記處指示檢察機關的任務主要是辦案，應抓住批捕、起訴、出庭公訴、審判監督、勞改監督幾個環節，並對幾個環節的工作作了具體的指示，王立中對這些指示都公然的採取了懷疑和抵觸的態度。

1. 中央負責同志一再指示：檢察機關的一般監督工作基本上不要做，但要作為武器保持起來，王立中卻反對中央這一指示，他說：“要不要一般監督工作是區別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檢察工作的標幟”，他認為“這是涉及我國檢察機關的性質問題，必須慎重對待”，並且要求領導上“從指導思想上和組織機

構上要有步驟穩步地解決許多問題”。

2. 中央指示：偵查監督工作從限制人身自由開始，通過批捕、起訴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王立中卻反對說：“偵查監督的範圍是否就那樣大呢？從偵查監督的實際情況看來，有不少是應監督的，尚未監督，不該監督而監督了的僅是個別的，因此我對中央指示偵查監督搞寬了的問題有懷疑。”

3. 中央指示：檢察院起訴的案件應全部出庭，否則就等於違法，王立中卻說：“有些案子比較簡單，如果都出庭，可能成為形式，我認為即使有少數這類的案件不出庭，那還應該算是全面出庭。”

4. 中央指示：檢察機關主要是辦案，勞改監督是一個重要環節，王立中卻說：“勞改監督不是各級檢察院普遍的任務，從總的趨勢看勞改犯是越改越少，而不是越改越多的，因此作為一九五七年工作安排把勞改監督作為重點是可以的，從長遠之計看是應該考慮的。”

此外王立中不僅在會議上發言反對中央指示，而且還在會後同劉惠之、李甫山二人到中山公園聚談，商議他們共同對院領導上鬥爭的決心，實際上是協商反對中央指示的意見，進行非組織活動。

二、誣蔑中央和高檢領導為“反對派”，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以遂行其把一般監督凌駕於黨和其他國家機關之上的野心。

他向幹部宣稱作一般監督的同志為“同行”，而且提出“同行要有共同의思想和語言”，說：“一般監督工作沒有支持，內外夾擊，同行苦悶。”他將中央負責同志和高檢領導說成是“人家”、是一般監督的“反對派”，認為“人家”不贊成一般監督也有理由，完全不贊成一般監督的“反對派”的意見也要研究。他又說：“一種新事物（按：系指一般監督）出來是香花，還是毒草，值得研究”，並且說：“一般監督是處在曲折的過程中，要經得起曲折的考驗，要有堅強的事業心。”在這裡王立中不僅

把自己置于中央和高檢领导的反对派的地位，而且还表明了他要坚持反党反领导的态度。

### 三、發表文章公开与中央指示相对抗。

今年一月十三日少奇同志关于檢察工作的指示，一月十五日在高檢作了傳達，其中指出：現在国家机关幹部違法不是主要傾向，宪法頒布后，国家机关幹部都是拥护宪法並積極执行法律的，就是有些違法也是不自覺的。因此檢察院的主要任务是办案，一般监督不是檢察院的工作重点。

王立中于一月二十九日却在光明日报上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的身份，發表了題为“做好一般监督工作有什么意义”的文章，其中極其片面地夸大了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員和合作社的所謂違法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並大肆宣揚当前开展一般监督工作对国家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公然与少奇同志的指示相違背。由于他这篇文章誣蔑了我們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結果被右派分子黃紹竑当作材料以攻击我地方政府，被香港反动报纸所登載，被台灣国民党制成傳單以飞机在河南等省散發。敌人这样地利用了王立中这篇文章来誣蔑我党和政府，而王立中在看到敌人散發的傳單和轉載他的文章的报纸后，不立即向組織檢討錯誤，却叫人到光明日报社探听有無关系，处之泰然。直到此次批判前始終無所醒悔。

### 四、对中央和高檢领导指示，採取兩面手法，陽奉陰違，严重的無組織無紀律。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張鼎丞同志指示王立中到北京兼任副檢察長，亲自掌握一般监督的試点，摸出經驗，以便在全国範圍內解决这个長期爭論的問題，他竟向人表示“無論如何不去”。張鼎丞同志为了摸清一般监督工作的情况，指定梁国斌同志帶領工作組到天津进行考查，考查的結果，在天津市檢察院原来認為是一般监督的二百三十三件案件中勉強算得一般监督的只有一件，完全証明了中央指示：一般监督作个武器保持起来，檢察院不要普



遍开展是正确的，但王立中却表示反感，認為不能以一个地方否定全国。張鼎丞同志为徹底摸清情况，便指定梁国斌同志再帶一个工作组（包括王立中）到山西省进行考查，結果也得出了同天津一样的結論。王立中当面表示一般监督工作不能搞了，但背后却又說“榆次不能搞，孝义是方向”（孝义县的檢察長是县委常委，分管一个区的工作，县委曾几次把他在领导这个区的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向县委作的报告通报全县，起了作用，这根本不是一般监督工作，而王立中竟說孝义是个方向。），充分表明了王立中是如何頑固地抗拒中央指示和对领导的兩面态度。王立中对中央和高檢领导的指示，凡不合他口味的就不認真向下傳達，也不研究执行。甚至欺上瞞下，“假傳聖旨”。如今年一月他向厅内同志歪曲少奇同志指示說：“一般监督肯定了，还要做”。今年七月王立中去江西参加會議时，張鼎丞同志曾指示他傳達中央書記处四月份的指示和中央負責同志的指示，他却把中央的指示加以篡改和歪曲。

王立中認為“高檢的領導人都是搞公安的，对檢察工作是外行，不懂法律”，因此他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拒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如广东省陽春县檢察院提出县人民委员会未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是違法的，李士英同志曾一再指示对于这种問題不要当作一般监督去搞，不能單純扣法律条文，要照顧实际情况，簡單地指責違法是不能解决实际問題的。但王立中頑固地反对李士英同志的指示，在一月二十九日的文章中和給领导整理的材料中几次加以引用，作为違法的典型案例。广州鐵路局使用基建經費違反国务院通知問題；因广州市委已在查处，譚政文同志批示不要办理，而王立中却自行批轉国务院秘書厅参考。說明了王立中的無組織無紀律是十分严重的。

五、庇护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邵穆熙，企圖否定高檢机关的肃反成績。

邵穆熙是一般监督厅書記員，解放前曾任过三青团区隊長，

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王立中認為他有“才”幹，毫無原則地加以重用信任，並多方庇护他，說一九五五年把他当作肃反对象是搞錯了，並認為一九五六年組織上未提他的級是原則上的錯誤。整風時王立中对邵穆熙的某些反动言論，加以支持，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邵穆熙应当划为右派分子，領導上也一再指点，王立中却迟迟不划邵穆熙为右派进行斗争。

此外，他对一九五五年机关肃反的成績表示怀疑，認為高檢当时逮捕的三个人是否正确，須要研究。（按：这三个人在历史上均有一定的反革命活动或罪惡，当时加以逮捕是完全正确的，一九五六年予以寬大釋放）。王立中身为斗争邵穆熙的直接領導人，院肃反小組和甄別定案小組成員、机关党委委員、党組委員，竟对一年前早已總結了的肃反工作表示怀疑，企圖否定高檢机关肃反成績，这完全是喪失立場的行为。

#### 六、在整風中点火煽風攻击領導。

王立中在平时經常向一些厅長級幹部散布流言蜚語，說“几年来高檢未拿出东西来，工作是听風，有些業務是別人挤出来的，（按：他認為全部批捕是公安挤出来的，全部起訴、出庭是法院挤出来的），院的集体領導不够，党組会民主不够，研究問題少……等”歪曲事实，破坏領導威信。在整風开始后，王立中則站在右派一边到处点火、攻击高檢領導和中央。今年五月十一日在厅整風小組會議上点火說：“領導上对工作沒有計劃，缺乏全面安排；檢察机关如何建設，領導上心中無數，下面思想混乱有些是从領導上来的”。並說“領導对中央指示貫徹不力，对試点目的指示不明确……等”，研究王立中的这些議論，和他八年来並未在檢察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業務建設方面提出过什么積極建議的情况来看，显然王立中不是帮助領導整風，而是在蓄意歪曲事实，大肆攻击領導。

王立中所說的“同行”、“人家”、“反对派”以及“一般監督工作沒有支持、內外夾击”……等一系列煽动反对高檢領導

和中央指示的話，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和七月二十日分別在北京丰台区試點會議上和江西省檢察院一般監督業務會議上說的。他的這種瘋狂的行為直到九月初張鼎丞同志指名要王立中進行檢討並表明了堅決鬥爭的態度以後，才開始收斂。

此外，王立中的鬧獨立性、鬧分散主義也是很突出的，他不但強調院各個廳的獨立，而且还認為各廳對下面有關部門也有垂直領導關係。如一九五五年討論機關公文處理辦法時，他堅持不同意“各廳擬發的重要指示、通報等先送辦公廳研究后再送檢察長簽發的規定”，並且與辦公廳比大小。

（三）王立中是經過長征的老幹部，在民主革命中確曾為人民作過一些工作，有其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可是在高檢幾年來，他把過去的功勞當作資本，以功臣自居，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他的極端惡劣的爭權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已發展到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公開地反抗黨、反抗中央、反抗領導，在同級面前蠻不講理驕橫跋扈的極端狂妄程度。而且，在工作中既不願接觸實際又不願研究政策，已經成了一個只坐辦公室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者。這就是他過不了社會主義關的基本根源。

根據以上事實，黨組討論決定將王立中劃為右派分子。並決定撤職、降級、降薪。（由九級降為十二級）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 最高人民檢察院整風領導小組對 右派分子劉汝械的處理結論

(一) 劉汝械，男，47歲，北京市昌平區大東流村人，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分學生，一九四〇年九月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六年七月到解放區，曾任縣教育科長、副縣長、縣委城工部副部長、師政治部聯絡科副科長等職，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二) 劉汝械對黨長期不滿，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對黨進行了一系列的攻擊。主要言行是：

一、反對中央和院領導對檢察工作的指示，攻擊檢察工作方針任務不明確。劉汝械對中央一九五七年一月和四月有關一般監督的指示，公開表示抗拒。他在整風大鳴大放時說：“中央指示作為一個組織原則，是無條件的服從，但只那樣幾句話是不能說服我的。”並質問說：“少奇同志指示一般監督不是重點，到底是什麼？”他對於院領導根據中央指示沒把一般監督放在中心，表示極端不滿。在鳴放會議上說：“如果偵查、一般監督是毒草就應剷除”，“不要把一般監督一脚踢開”。他還憤憤不滿的說：“我從五〇年後，沒有作過一件愉快的事。”“一般監督工作，死氣籠罩，死活不定。”“自己好象活着無意思”甚至認為高檢領導還不如右派頭子黃紹竑，說：“民主人士（黃紹竑）到北京市檢察院，一去就問一般監督工作怎樣。”

他誣蔑檢察機關幾年來的整個方針任務不明確、不穩定。誣蔑院領導“沒有如實將情況反映給中央，而是中央指示作什麼就作什麼？”“硬往下貫”。說：檢察工作是“冷、熱、單打一，作為國家領導機關不知禍害多大。”他質問領導說：“除了三大

監督外，偵查、一般監督工作放在什麼位置？是以八兩來比，是放在二兩上、四兩上呢？

在辯論“檢察員必須共產黨員擔任”是否宗派的問題時，他認為“過去黨是吃苦在前，但不能認為就有優先權”。以此反對黨員擔任檢察員規定。

二、歪曲和誇大事實，攻擊謾罵領導。他在整風會議上誣蔑檢察機關不關心群眾疾苦說：“平樂餓死一四〇〇余人不注意，這叫什麼工作，不關心群眾疾苦。”他誣蔑領導不懂業務。他反對梁副檢察長一九五六年到天津視察工作中，根據中央指示和實際情況提出一般監督工作可以基本不搞的正確意見。說：“梁副檢察長工作不深入、不踏實、不鑽研，去天津看了一下，就宣布一般監督死刑。”一九五七年二月他隨李副檢察長去山東檢查工作，領導上為了檢查勞改工作中存在的右傾情緒，具體了解勞改犯人的生活待遇。劉汝械就在整風會議上誣蔑說：“檢察機關保護勞改犯人，不保護農民。他誣蔑檢察院有“牆”和“溝”，說：“高檢院三年多來，階級嚴密，層次很清，檢察長連有的廳長還不認識，檢察員、書記員那是不認識的，人與人之間有一堵牆。”

三、劉汝械抗拒執行黨的決議，反對檢察工作的方針任務，反對院領導，不僅表現在整風鳴放當中而是由來已久的。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學習“八大”文件時就說：高檢領導是“牆頭蘆葦，不加考查，就是聽風。”又說：“反右傾反了下面，未反我們”。“檢察工作是前進不足，穩步有餘，總怕前進犯錯誤，而不在乎落後犯錯誤”。工作不應“興一個，滅一個。”他誣蔑院領導不遵守法制說：“數我們高檢法制不強，自己的組織法自己不執行，可隨便否認。”又說：“一般監督工作不作了，從農業合作化看，這五萬萬人（指農民）有沒有保障？”“不要一般監督是因噎廢食”“相當負責幹部可以胡說八道”。

他經常散布流言蜚語。說：“檢察工作沒有靈魂”他聽說一

九五六年春，毛主席曾提到檢察通訊員可以联系群众，后檢察院加强了檢察通訊員工作。他即在侯平栋同志面前誣蔑說：“中央放个屁也是香的。”他还誣蔑領導不懂業務說：“几个檢察長是作公安工作的，有些偏。”“張老报告光講社会主义改造，国际形势，解决不了業務問題。”一九五七年刘汝械看到报上登載粗粮有营养，鼓励大家多吃粗粮，代替細粮时，他即在幹部中謾罵：“胡說八道”，並說：“如果粗粮有营养，为什么領導幹部不吃粗粮。”

在实际工作中也与院領導的工作方針对立，一九五六年十月院領導指示总结研究一般监督工作，他到湖南省檢察院参加一般监督工作会议，却強調應該積極开展。整風开始他在政法幹校講課时还說：“我們常認為，地方国家机关所發布的決議、命令，都是經過党的审查或者上級机关批准，不会有錯。这种看法可以考虑”。

刘汝械抗拒执行党的決議也是有历史性的，一九五五年檢查支部工作时期，他就再三抗拒支部貫徹总支布署，阻撓會議进行，說他“精神沒寄托”，說支部和总支“是違背良心”，还誣蔑总支書記“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拿黨員开心”“总支拿大家开玩笑。”

对組織审查他的入党問題也極為不滿。他自称一九三五年入党，一九四〇年重新入党。一九五六年审幹查明一九四〇年以前並未入党。为此，刘汝械对組織很不滿，在幹部中散布“調查有問題”企圖顛倒黑白。

（三）刘汝械上述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被揭發后，开始很不老实，經過同志們多次批判，最后表示低头認罪，但檢討还不深刻。

根据以上事实，說明刘汝械思想上長期以来存在着資產階級極端个人主义，同党兩条心。个人慾望無法滿足，便肆意攻击党和領導。这次整風开始后，向党積極进行了攻击，因此，决定划

为右派分子。並决定撤职、降級、低薪（由十三級降至十六級）。

最高人民檢察院整風領導小組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白步洲党籍的决定

（一）白步洲，男，四十一岁，陝西清澗县人，貧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四年二月入党，历任县委委員、县委書記、县保安科長、县公安局長、專署保安处副处长、松江省公安处副处长（后改为厅，任副厅长）、贛西南区党委社会部長兼公安处长、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檢察署副檢察長、中央建筑工程部保衛局長、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三厅副厅长。

（二）主要反党反领导事实有：

整風运动开始，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白步洲在厅內煽風点火，攻击领导。

1、他在三厅一組，大鳴大放小組会上当右派分子攻击领导对某些負責幹部的一般問題不作处理时，白步洲立即插話支持說：“負責幹部中还有更严重的投敌叛变，有血債問題未作处理”。这样，使一組幹部确信领导是包庇高級幹部的，因此，以全組名义写了“领导幹部特殊嗎”的反党大字报。

2、支持右派分子企圖推翻机关党委会的活动。当右派分子李树芳等誣蔑丑化党委委員，企圖推翻党委委員时，白步洲說“要是整風以后再选举，有些人就选不上了”。

3、攻击、誣蔑院领导。他說“院的業務方針長期搖擺不定，跟着公安、法院跑”。說党組“集体领导未形成，民主空气



淡薄”。並煽動說“院整風計劃未明确提出反宗派主義，是不是沒有，……大家很好考慮”，“敢于提意見的就不是好幹部，處處給予不利”，“檢察員以上幹部有离心思想，都不願在高檢工作”。

(三) 白步洲長期存在着嚴重的資產階級名位觀念，他認為当了十年副廳長未得到提拔是組織上不重用他。因此对党不滿。整風運動開始，社會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攻時，白步洲積極煽動點火，攻擊党和領導，在廳內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使整個三廳在短時期內从党内到党外迅速形成了一股反党的逆流。白步洲上述反党言行被揭發批判后，虽承認了錯誤，但檢討不够深刻。已經党組決定划为右派分子，因此決定开除白步洲党籍。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監察部整風領導小組 关于右派分子陳達之的結論和处理決定

陳達之，男，三十四歲，山東肥城縣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學生（高中文化程度），一九三八年十月加入共產黨。曾任縣青救會主任，縣抗聯組織部長、主任，縣委組織部長、書記，前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監察專員等職。現任監察部研究室副主任（十二級）。王翰反黨集團骨幹，研究室反黨小集團頭目，極右分子。

陳達之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並攻擊黨的重要政策。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批判了黨內的右傾思想，他看后公開誣蔑說：“黨總是一時反右來個左，一時反左又來個右”。黨中央提出在其他方面也要反對右傾思想時，他說“即使農業合作化有右傾，其他方面也不一定有”。農業合作化

基本实现以后，他又攻击农业合作基金的筹集、改革耕作制度、推广良种、兴修水利等工作是盲目冒进，並诬蔑这是“来源于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一九五七年二月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毛主席說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有了改善，他污蔑是“安民布告”，毛主席說我們党内有些人代表地主、富农叫嚣农民生活沒有改善，他反对这种說法，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發布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他也加以反对，認為农民生活确实很苦。他到处散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沒有改善和粮食統購統銷留粮过少等謬論，並唆使右派分子舒新啓收集所謂农民生活沒有改善的材料，以便作为他向党进攻的根据。他还攻击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诬蔑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劃农民收入的估計数字是“沒有根据的”；認為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对犯錯誤干部的惩戒政策是“放寬了”，因而“縱容了干部的違法乱紀”。他把党领导的农村工作，看作漆黑一团，十分仇視党的基層幹部，对在工作中犯錯誤的干部主張严厉懲办。他反对中央对广西餓死人事件的处理，認為有关地、县委書記應該杀头或判刑。

陈达之反对党的鎮反和肃反运动。他說他在貴州当县委書記时，費了很大的勁还未完成上级交下来的鎮反任务，借以攻击当时的鎮反运动。他反对中央对肃清反革命採取群众路綫的方針，反对把肃反当作运动搞，反对中央为反右防“左”所規定的控制数。他还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为反革命分子胡風喊冤，認為仅憑报上所公布的那三批材料，不足以証明胡風是反革命分子，还惋惜地說：“胡風問題如果發生在現在，就不一定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並诬蔑監察部的肃反运动是“劳民伤財”。

陈达之攻击我們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反对党中央对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他認為人大常委会是假民主，民主人士是摆样子的。他說“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报告和决定，事先都經過党中央

和国务院的討論，然后才拿到人大常委会去通过”，只起“举手表决的作用”，不能起到“监督作用”。

陈达之反对“再論無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指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發生，是“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的提法，他歪曲事实，硬說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主要是拉科西、格罗集团的錯誤所致，並誣蔑党中央的提法是“为了宣傳上的需要”。

陈达之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开始时，和王翰反党集团及研究室的几个右派分子此唱彼和，一起向党进攻。他誣蔑監察机关的任务和作法向来不明确，历次全国監察工作会议提不出什么新問題，“一年否定一年”。攻击監察部的党组同志，有的“無能”、有的“苟且偷安”、有的“瞎叨叨”。誣蔑“錢瑛同志所以当选中央委員，是因为女同志在中央委員中要佔一定的比例”，吹嘘王翰有能力，分析問題深刻，处理問題果断”，意思是說王翰应当当选中央委員。他夸奖右派分子彭达“很有独特見解”，“能开展工作”，說“監察部如多几个彭达这样人，工作会有大轉变”。並散布流言蜚語，在党内制造分裂。攻击研究室的黨員在整風中向王翰提意見是“以宗派反宗派”，說“被提意見的人不一定是宗派，提意見的人不一定不是宗派”；並向彭达講監察部的整風不正常；他誣蔑研究室是“是非窩”；甚至造謠說：“錢瑛和王翰挤走了刘景范，錢瑛現在又想挤走王翰”；“王翰初来时处理問題大胆，在會議上有一套一套的意見，以后就不大講話了”，認為王翰受“压抑”，所以工作“消沉”。他和他的两个亲信編輯右派分子舒新啓、刘永形成反党小集团，通过“国家監察工作”，積極支持和散布王翰的反党主張和他們的反动观点。大鳴大放期間，他坚持要在刊物上登載右派的“点火”文章。当党组討論决定不准登时，他就气势汹汹地提出抗議，誣蔑党组是“怕揭自己的丑”。他又私自向国务院各部門的監察局的幹部發信，煽动他們積極揭露監察工作中的“矛盾”，用以反对

監察部的領導，並派舒新啓、劉永到幾個監察局去“點火”。

陳達之在反右派鬥爭開始時，還利用研究室黨支部書記、整風領導小組成員的職權，堅決支持和包庇右派分子劉永。他多次在研究室領導小組會和支部大會上為劉永辯護，阻止對劉永進行鬥爭，甚至以辭去黨支部書記的職務和退出研究室領導小組來要挾組織。

由於陳達之的地主階級立場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政治上思想上就與黨對立，一直發展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罪行極為嚴重。在反右派鬥爭中，他的態度是抗拒的，經過群眾的揭發和批判鬥爭後，被迫低頭認罪，願意悔過自新，但檢討不夠深刻，對右派分子王翰、彭達、舒新啓、劉永的反黨言行揭發的很少。根據上述情況，決定開除其黨籍，撤銷研究室副主任職務，留用察看，降低原有待遇。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整風領導小組 關於右派分子彭達的結論和處理決定

彭達、原名馬子誠、男、三十九歲。綏遠包頭人。家庭出身富農（土改時家庭定富農成份，自稱一九三八年參加工作時家庭是中農，待查）。本人成分舊軍官。初中肄業。曾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間，歷任偽綏遠省國民黨防共自衛團第三大隊八中隊的政訓員、第三大隊督導員、國民兵團第四團政訓主任、軍官團分隊長等職。一九三八年九月加入共產黨，一九四一年向敵自首變節，供出安北縣委組織部長安建國，安也叛變，致使安北縣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彭達自首後，由綏遠到延安，隱瞞了這一段罪惡歷史，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中共陝甘寧邊區三邊地委

整風時，才作交代（已由三邊地委作出自首變節的結論）。他擔任過陝甘寧邊區苟池鹽務局局長、三邊地委秘書、邊區政府建設廳秘書主任、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高級監察專員、第二廳副廳長等職務。現任監察部第二司副司長（十級）。

彭達是王翰反黨集團骨幹，二司反黨小集團頭目，極右分子，其主要反動言行如下：

### 一、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整風開始，彭達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應，在第二司整風學習討論會上明目張胆地發表了“社會主義制度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不要迷信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制度一切都好，只是這樣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帶來了官僚主義”等謬論，並對社會上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很表贊同，說“把許多根本性的問題都提出來了”。他認為社會上右派分子黃紹竑等攻擊我國法制和要求取消學校黨委制等言論，是“很有道理”、“值得研究”；認為別人不應該對右派分子葛佩琦要殺共產黨的言論表示憤慨；認為右派分子林希翎發表反動演說向黨進攻的情況“基本上是健康的”；甚至煽動幹部說：“我的姪女有個同學，主張不要共產黨的領導，過去有顧慮，現在大鳴大放就敢說敢放了。看來是思想活了！”。他對部內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言論也加以贊揚。

彭達極力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攻擊我國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他贊揚黃紹竑發表“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成為工作報告中的一種公式”的謬論，說：“總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到處亂用，就不對了，要具體分析”。他在平時也經常散布攻擊我國的計劃經濟制度，抹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績的言論。誣蔑我國完成和超額完成計劃的事實是虛假的，說：“計劃不準確，經常修改，每年要修改很多次，甚至年底十二月三十日還在修改計劃，結果就是百分之百的所謂

超額完成計劃”。他誣蔑黨領導經濟建設是“憑腦子一熱”、

“決定問題不是保守就是冒進”，並以雙輪雙鐮犁的積壓問題為借口在監察訓練班及冶金、紡織、一機等監察局的會議上，大肆攻擊中央和國務院有關各部，說：“廖魯言開始提的計劃就已經冒進了，中央還批評他保守，又加大了計劃”、“鐵道部就下令優先運輸，冶金部也通知優先供應鋼材，都是腦子一熱就搞起來了，結果任務沒完成，質量成問題，大量積壓”。他辱罵企業領導是“狗熊管企業”，是“靠運動吃飯”，誣蔑許多企業“今天是模範，明天是狗熊”。謾罵宣傳企業的成就是“不要臉，吹牛皮，報紙也給他們吹”，並強調這些都是“全國性的問題”。

彭達反對肅反運動。他反對在肅反運動中採取群眾路綫的作法，否定監察部的肅反成績，誣蔑二司的肅反是“人為地製造矛盾”。他公然表示自己要當“況鍾”，借以誣蔑部的五人小組是“過於執”。他還辱罵肅反積極分子“是沒有頭腦的”、“香屁、臭屁，聞也不聞”。並在肅反結束後，煽動肅反對象和某些群眾對肅反的不滿情緒，又在大鳴大放期間指使肅反對象在肅反問題上向党進攻。

## 二、反對馬列主義和黨的政治思想工作

彭達在一九五六年學習黨的“八大”文件時，即發表“三大改造完成以後，過渡時期就結束了”的謬論，企圖否定目前階級鬥爭的存在。他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反馬列主義的宣傳，誣蔑黨所一再強調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賣狗皮膏藥”。說什麼“不能靠政治吃飯”、“誰有業務能力，誰就領導”。他攻擊堅持政治思想領導的同志是“光靠政治吃飯”、“靠吃老本過日子，就會說幾句馬列主義”，咒罵他們“老本吃完了就完了”。他反對監察幹部學習馬列主義，反對領導上在幹部中進行馬列主義思想教育，並反對黨組確定的監察幹部加強理論政策學習的方針。他主管天津監察幹部訓練班，堅持不講政治課，甚至當部務會議作出加強

訓練班政治課的決定後，仍不執行。他經常以資產階級思想毒害幹部，在監察幹部中灌輸特權思想，製造監察機關和黨政領導的矛盾。到處鼓動監察幹部和黨政領導鬧對立，散布：“我們垂直以後，可以不受他們管了。廠長如果再翹尾巴，就把他們打下去”、“他們不好的話，就叫他們滾”、“你們只管做，我彭達今兒大，出了問題我担起來”等等，並表揚和黨政領導鬧對立的幹部“象小老虎一樣”。他經常在監察幹部中提倡欽差大臣的作風，說：“我們出去檢查工作，派頭要大些，要象監察幹部的樣子”。他要青年幹部獨立思考，說“自己要有主見，不一定要經常請示領導，又說：“只要積極工作，思想慢慢來，在工作中自然會改造的”，以此阻撓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開展。

### 三、一貫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

彭達目無組織，破壞黨紀的罪行極為嚴重。早在一九五三年，他曾反對中監委所規定的方針、任務、作法和中央批准的財經企業部門監察室組織通則，在幹部中煽動“革命”。受到批評後，仍堅持他的“基本論點是正確的”，繼續進行反對黨組的活動。他反對錢部長在歷次會議上強調監察工作的政治思想性和群眾路線，誣蔑政治思想性是空空洞洞的東西，諷刺黨的群眾路線“不能解決問題”。第六次全國監察工作會議批判了事先監督、垂直領導等問題，彭達不但不執行會議的決定，而且誣蔑監察部是盲目跟着中央跑，這次會議“不解決問題”，是“泄氣會”，到處煽動監察局的幹部反對六次會議的決議。

彭達一直反對在二司建立司務會議制度實行集體領導，說：“什麼司務會議，我才不理那一套”。從中監委時候起直到現在，他一貫對抗領導，公開攻擊他的直接領導人，甚至在工作中予以打擊。他誣蔑監察部的絕大多數領導人是不起作用的，第六次監察工作會議時，他指着主席台上的部長、副部長、部長助



理，对右派分子陈达之说：“你不要看他们象了不起的样子，那一个搞得出名堂来”。他对监察训练班和监察局的干部宣称：

“一级不如一级，监察部不如监察局，监察局不如监察室，谁领导谁值得考虑”，煽动监察干部“将监察部的军”。

彭达制造一套破坏民主集中制取消党的领导的谬论，宣传“谁的意見正确，谁就是领导”、“如果领导上不采纳你的意見时，你可以在下边酝酿，造成群众輿論，‘推动’领导”。他反对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在工矿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决定，认为实行这一决定，就是党委包办一切。

#### 四、誣蔑中央負責同志，攻击国务院各部門 和地方党政领导和老干部

彭达經常散布流言蜚語，破坏中央負責同志的威信。他誹謗在北戴河开会或休养的中央負責同志是“腐化墮落”，說“过去腐化思想是买房买地，發展資本主义，现在是享乐享乐，坐个小汽車，找个好地方休养，討个年輕老婆”；他辱罵北京城里高級幹部宿舍的紅門是“朱門酒肉臭”的“朱門”，認為和解放前国民党官僚的“朱門”没有什么区别；他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散布过不少幹部在搞机关生产‘小家务’中腐化墮落了，“小家务是朱总司令積極主張的”；一九五三年他檢查浙江衢州黃壇口水力發電工程时，揚言要处分譚震林等負責同志，态度極為狂妄；他誹謗周总理說：“周总理到鞍鋼去了一趟，說是解决了增产二十万吨鋼的問題，现在看来，不仅增产二十万吨落了空，而且原定的生产計劃也保不住”；他指着北京日报刊登的彭真同志参加体力劳动的照象說“是摆样子給人看”；他誣蔑李立三同志关于工業建設高潮問題的报告中提到沈陽机床某厂設備能力充分發揮，可提高生产一倍的估計是“腦子一熱說出来的”；他給監察訓練班學員講話时，公开誣蔑陈郁部長是“官僚

主义，不懂業務”；他借口双輪双鐮犁的积压問題，到处誹謗廖魯言同志說“早就感到廖魯言有問題，應該好好地吧廖魯言檢查一下”；他抵毀錢瑛部長在全国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發言“不敢向業務部門斗争”、“怕丢失选票”。他甚至在企業幹部中誹謗国务院各部部長和局長都是一些本位主义和自私自利的人，說：“口头上是国家国家，实际上是我家我家”，以挑起企業幹部对領導的不滿情緒。

彭达还到处辱罵老幹部是“万金油”、“甩袖子”、“停滯不前”。他煽动企業幹部反对老幹部，說实际上是“科員領導科長，科長領導处長，处長領導經理”。他攻击監察机关的老幹部不懂技术，不能作監察工作，企圖把老幹部排挤出監察机关。

#### 五、反对中央和党組关于監察工作基本問題的指示和决定， 積極参加王翰反党集团的反党宗派活动

几年来，彭达在監察工作的性質、任务、作法、体制、幹部培訓等方面，和王翰一道坚持一套与中央指示精神和党組决定相对立的主張。他一再宣揚“監察机关与被监督机关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監察机关从屬於誰，就不能监督誰”，“兒子不能监督老子”。坚持監察机关的体制要实行垂直領導，反对中央关于双重領導的决定。他一貫反对監察机关檢查案件事故、受理公民申訴控告以及管理懲戒工作，誣蔑案件事故檢查是“馬后砲”、“擦屁股”，公民控訴和人民来信所揭發的問題是“鷄毛蒜皮”，監察机关管理懲戒是“不务正業”。他極力反对中央关于監察机关应当有重点的抓住浮在表面上的重大問題进行事后檢查的指示，主張搞事先监督工作，坚持要檢查決議和国家計劃的制訂；主張監察机关要有“上方宝剑”，坚持要保留对財經企業部門行使停止支付权。实际上他是以監察机关作为他們反党集团的反党武器。

彭达还和王翰採取兩面三刀的手法，反对中央的指示和監察

部黨組的決定。如雙重領導問題，他在會議上表示同意，會後又和王翰一起進行陰謀活動，煽動監察幹部起來反對。

彭達一貫打擊領導，抬高自己。一方面把監察部黨組成員和司局的領導人說成是一無是處，另一方面大肆吹噓王翰的才能和他自己的所謂豐功偉績。他在工作中喜愛和重用一些有政治歷史問題的或者思想品質不好的人，培植他的親信，打擊那些堅決執行黨的指示而和他意見不合或向他錯誤言行作鬥爭的幹部，甚至想把他們排擠出去，以便於把二司全部控制起來，作為反黨的基地。

彭達在整風中的反黨活動更為猖狂。除公開散布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外，還和王翰一唱一和，在黨組擴大會上提出整風首先要解決監察機關的體制、任務、作法等問題，企圖轉移整風目標。他到處點火，散布對黨組的不滿情緒，煽動部內幹部和中央工業部門監察局的同志反對監察部，辱罵黨組成員是“死官僚主義”，是“得過且過，苟且偷安”，是“當官、拿錢、畫圈圈”，甚至謾罵監察部黨組是“紙老虎，一戳就破”，幻想利用整風的機會，實現王翰反黨集團的一套反黨陰謀。

彭達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他的反黨活動，是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階級根源和社會根源的。他出身於富農家庭，長期作過國民黨的政工人員，有着根深蒂固的剝削階級和反共的立場、觀點，混入黨內不久，又向敵自首變節，在敵人面前誣蔑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宣誓“願為三民主義而奮鬥”。因此，他一貫仇視黨、仇視領導，進行反黨活動。反右派鬥爭以來他在群眾的檢舉揭發下，終於暴露了資產階級右派的真實面目。

在四個月的說理鬥爭過程中，彭達開始氣餒囂張，頑抗狡賴，拒不交代問題。最後，在大量鐵的罪証面前，才承認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作了三次書面檢討，表示願原悔改。但他沒有主動交待問題，檢討也是避重就輕。因此，決定開除其黨籍，行政上撤銷二司副司長職務，監督勞動，生活上予以適當補助。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整風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 安汝濤的結論和处理决定

安汝濤，男，四十三岁，共产党员，山西省垣曲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鋒队，一九三七年参加抗日工作。历任第二战区战总会组织部幹事、察綏游击軍第一支队政治处主任、中共北岳区应县县委书记、中共冀晋区党委秘書長、解放軍六十六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副秘書長、天津市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政务院人民監察委员会副厅長等职，現任監察部第一司副司長（十級）。極右分子。

安汝濤是一个混入党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他不仅在这次整風运动期間向党进攻，而且在近十年的筆記中，記述了許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並屡次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分子。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 一、反对党中央，誣蔑苏联共产党，攻击領導幹部

大鳴大放期間，社会上右派分子誣蔑高饒事件是党内宗派斗争时，安汝濤即惡意地說：“击中了我們的要害”，並誣蔑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以党纪代替国法。一九五六年四月他看了“关于無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一文时，就攻击党中央不按党章办事，在筆記中写道：“党章这些条文都非常漂亮，但可惜就是一紙具文，沒有实行。”他还反对党的組織生活，在筆記中写道：“多开小組会嗎？这不是活动的办法，有时适得其反，令人感到厭煩；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太庸俗化了，也不好。”他認為

“应该是多采取不拘形式、不拘时间、不拘地点，个别接近与谈话的办法较好。”

安汝濤还诽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认为文件中的一些论点不全面，道理牵强，不足以服人。他不同意文件中对斯大林功过的分析，并攻击文件中“给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指出创造这种伟大业绩的道路的，是列宁”的这一论点是中央对列宁的新的个人崇拜。

安汝濤还敌视苏联共产党，诋毁苏共二十次大会对斯大林问题的批评是不按党章办事；苏共中央没有领导核心，领导不成熟。还诬蔑苏联对我国的无私援助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安汝濤咒骂革命同志和领导干部是“人面动物”，“人面东西”。他的反动言行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批判后，又在笔记中摘录鲁迅的话：“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借以发泄其仇恨。他诬蔑党的七级以上的干部生活腐化，非常脱离群众，并造谣说，有的高级干部“带着舞女到北戴河避暑，过着西尽人间富贵的豪华的可耻生活”。他骂老干部“将会重蹈（陷）李自成的复辙”。他攻击监察部的党组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向错误作斗争，“一切都看中央眼色行事”。丑化党组成员是“独善其身”，“庸庸碌碌”，“唯唯诺诺”。

## 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改革运动

安汝濤早在一九五二年即在笔记中写道：“专政机关办民主的事是不行的”。并诬蔑我国的选举是包办，造谣说：“北京西四区包办民选街区代表。北京如此，其他可想！”反右派斗争中他交代说，国务院总理人选中没有党外人士是“不合乎统战政策”。他诬蔑党在执政后“统治阶级味道已很重，对人民生活不太关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社会上非正常死亡现象很严重”，将新中国描绘成“最黑暗，最没有民主的社会”，“不把人当人的地方”。

安汝濤借法制問題攻擊我國歷次社會改革運動。誣蔑我國以政策代替法律，無法可守，有法也不守，甚至說國務院拿不出幹部懲戒條例就是“縱容了違法亂紀自由泛濫”，企圖以資產階級的所謂法制來限制革命運動。他還認為運動太多，令人厭煩，運動搞糟了，是“多為”的結果，幻想“無為而治”取消革命運動。

他反對“土地改革”。當他聽到他的地主家庭被鬥後，就寫信給村幹部，要村幹部對他的家庭“照顧”，並說：“要不是我們鬧革命，你怎能當了村長”！反右派鬥爭中，他交代說他沒有親眼見過地主家庭剝削、壓迫農民的具体事實，他一直懷疑文件、報紙、書籍上關於地主剝削、壓迫農民的報導是否真實。他不但認為地主階級“沒有什麼壓榨人民的血腥罪惡”，反而認為他們對革命是有“功”的。他以自己為例，說他能“讀書成人”，為革命作一點事，是地主家庭的“功勞”。他曾在一九四八年稱贊右派分子費孝通為地主階級謀出路的“鄉土工業”一文，直到反右派鬥爭時，還說該文有“思想性”。

他反對“三反”“五反”。在運動中積極包庇貪污犯；對當時天津處理不法資本家偷工減料詐騙國家財產的軍用雨衣案，深為不滿，說：“此事首先打在工商業者頭上，深感掃興”；還企圖利用付檢察長的職位，將逮捕犯罪分子的權力，抓在他的手裡，來限制運動的進展，當他的陰謀不能得逞時，就攻擊黨不重視檢察工作，說：“檢察署不起作用”。反右派鬥爭開始後，他交代說：運動中“違法亂紀嚴重……覺得革命勝利了，生命無保證”，對右派分子嚴文杰“人人自危”的反動言論深表同感。

他反對“肅反”。在大鳴大放時，他替胡風喊冤，說逮捕的根據可能不充分，到目前還沒有公開宣判，是不依法辦事，並惡毒地把此事與美國當局逮捕美國共產黨領袖不公開宣判來作比。他還誣蔑“鎮反”冤枉了好人，以反問的語氣在筆記中寫道：“大捉特捉，不冤枉一個好人？”。

他还反对农业合作化，深恨合作化“不能保证私人利益”。一九五七年春节，他在回家印象記中写道：“丰收饿死人，言之痛心。共产党制死人，挤得干干的，一点活动的办法也没有。棉花盛开不收，八月十五打頂。麦子光割不打。党团员在生产中不起积极模范作用”。經我們派人調查，这些完全是捏造和歪曲。

安汝濤認為上述各种运动以及历史上的“防奸”、“反特”，“都曾發生过許多次逼供信”，“假的很多”“死人数目很大”。認為这些运动都是播下的“惡种”，說“惡种必有惡果”，共产党是要“自食惡果”的。

### 三、包庇反革命分子、保护资本家，冤枉好人

一九四六年，安汝濤在冀晋区党委任秘書長时，听到他父亲（官僚惡霸地主，曾勾結敌人向农民反攻倒算）被人民政府拘捕后，就利用职权，拍發電报，要当地党委“照顧”他父亲（后因病保釋回家死去）。同年，他的給敌人作情报工作的姐姐被人民政府槍决后，他認為死的“很可憐”，曾去信向村幹部查問此事，回家乡时，还一再找村幹部当面查問死因与責任。一直到反右派斗争时，还惡毒地辱罵我們，說：“我姐姐是被‘土匪’打死的”。

一九五二年，安汝濤任天津市人民檢察署付檢察長时，曾利用职权，包庇叛党投敌、当过汉奸、特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賀金峰（安的連襟）。賀在天津解放后，通过安妻常征的关系，混入天津市外貿局工作。“三反”运动中，賀因拒不交代历史罪惡与貪污問題被政府逮捕后，安汝濤立即找市節約檢查委员会負責人为賀說情，並讓賀妻常毅（叛变投敌分子）到檢察署告狀。安以檢察署名义，要法院釋放賀金峰，並追究所謂錯捕的責任。賀出獄后，外貿局不同意釋放，又报請市節約檢查委员会批准，再次將賀逮捕。这时，安再次为賀說情，复以檢察署名义，要求釋放賀



金峰。最后，竟公然与市党政领导对抗，亲自草拟电报，拟直接报请最高人民檢察署处理，經市領導上發覺后制止。

一九五一年整風审幹时，安汝濤还包庇混入天津市人民檢察署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李鴻举（右派分子）。李曾任国民党少校軍官，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員，参加过軍統外圍組織“方向社”。在审查时，安汝濤也承認李“已構成反革命”，但因怕伤了李的感情，沒讓群众追問和斗争。

他在处理大陆銀行董事長馮家遇（軍閥馮国璋的兒子）欺压房客的案件中，不但不保护房客的合法利益，反認為房客違法，提起了公訴，致造成錯判四人一年徒刑的冤獄。更荒唐的是該案中誤將房客金守全曾任“伪車長”的职务，写在其弟金守琨名下，並將“伪車長”誤写成“伪軍長”。安汝濤就極不負責地划上同意。結果，这个20余岁的青年学生，無辜的被当作“伪軍長”的身份提起公訴，判了罪。

一九五三年，安汝濤到河南檢查汪川案件时，假借中央負責同志的名义，不尊重省委的意見去調查汪川的政治历史与案情，而偏听偏信，主觀断定汪川是受打击陷害，認為河南省委等有宗派主义。結果未弄清真象，錯誤地处分了一些好黨員、好幹部，冤獄了楊鹿同志，放縱了反革命分子汪川。

安汝濤出身于地主家庭，長期接受資產階級的教育，反动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在民族抗日高潮中，他虽然卷入了革命队伍，但未改变反动立場。当革命触犯了他本階級的利益，斗争了他的家庭，鎮压了他的親屬时，他就更加仇恨党和人民，終於墮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

安汝濤在他的反动言行受到批判时，狡賴頑抗，誣蔑群众对他的說理斗争是“公审会”，是“逼供信”，宣称自己是“硬骨头”，不怕斗。誣蔑主席关于十大关系报告中的一些論点也屬於右派言論，为自己辯护。經過多次斗争之后，他的态度有所轉变，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写了七次書面檢討，交代了一些問

題，檢查了思想。但对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仍进行抵賴。最后，在大量事实和确鑿証据面前，才低头認罪。

根据上述情况决定开除其党籍，行政上撤銷原有职务，监督劳动，生活上給予适当补助。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

## 中共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支部 关于开除鮑廷干党籍的决定

鮑廷干，男，四十二岁，富农家庭出身，学生成份，大学文化程度，一九三五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过縣長、專署科長、魯西日报社編輯、辽西省法院付院長、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行政処長等职务。原任吉林省高級法院院長，党組書記（已撤銷）。曾于一九四二年受过撤职处分。

在反右派斗争中揭發查实：鮑廷干几年来在工作中，大肆散布“司法独立”的謬論，公开的反对党的领导，極力主張把审判工作置于党委领导之外，对一些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不向省委請示，擅自处理，对某些抗拒党委领导的法院院長，積極給予鼓励和支持，歪曲我国和苏联的無产階級專政的性質，讚揚帝国主义專政手段，傳播階級斗争熄灭論，削弱公安、司法机关的專政作用，鼓吹保护犯罪分子；竭力攻击社会主义法制，責备我国“無法可依”，“有法不依”；把党领导的司法改革和鎮压反革命运动宣染得漆黑一团；在工作中宣揚資產階級政治法律制度，公开的号召律师要忠誠的为罪犯服务，和司法机关进行“政治斗争”；在审判工作中，推行“有利被告”，“無罪推定”和“上訴、申訴必減刑”等謬論，为罪犯开脫罪責，以致寬容、錯放、漏掉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

此外，在一九五七年八月省委傳達毛主席關於“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勢”的指示的同時，對省法院的嚴重右傾提出批評以後，鮑廷干即以黨組書記的身分，連續主持召開四次黨組會議和一次整風領導小組會議，提出一系列抵制省委批評的反黨主張，指定專人蒐集反批評的“資料”，並親自找李砥平書記摸省委的“底”，在法院幹部中大肆散布反黨言論，煽動幹部對省委的批評不滿，積極主動地、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反黨活動。

根據以上事實，支部於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下午召開了支部大會，對鮑廷干的黨籍處分問題進行了討論，全體黨員一致認為：鮑廷干出身於舊軍官家庭，雖參加革命20多年，受到黨的長期教育，但其資產階級思想觀點未得到根本改造，在和平環境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作風有了發展，特別是近一、二年已發展到嚴重的程度，反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宣揚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為舊法人員招魂，攻擊黨領導的司法改革運動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錯放了許多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他的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會腐蝕了許多司法幹部；給黨的事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鮑廷干已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幾個月來，雖初步的認識了一些錯誤，但仍很不深刻。參加大會的三十二名正式黨員一致通過決定開除鮑廷干的黨籍（本人表示同意）。

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

## 中共辽宁省监察厅总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極右分子張靜超党籍的决定

張靜超，男，四十六岁，小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辽宁省鉄嶺县人。一九三三年九月参加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入党。原任辽宁省监察厅长，党组書記。

張靜超是辽宁省监察厅的右派反党集团的首領。他的反动言行主要的是：

反对肃反运动。張靜超在肃反运动中为监察厅五人小組成員，肃反开始时，他就散布：“监察厅党团员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份純潔”。确定滕劍为肃反斗争对象后，又再三強調：“滕劍自杀了怎么办？”这种右傾思想受到批評后，就非常不滿，並运动結束时再算賬”。張靜超对肃反積極且說：“等分子王生天同志进行威胁打击說：“肃反悞了業務，你要負責任！”，“你还要当肃反專家嗎？”企圖阻撓肃反斗争。肃反运动結束后，張靜超到处煽風点火，糾合与他观点相同和对党不滿的方一臣、王景山、姜浩云等人攻击机关的肃反运动。在肃反中，对坏分子滕劍的結論和处理意見，張在會議上虽也表示同意，但暗地里却經常詢問方一臣、王景山对滕劍的处理結論有什么意見？当王景山表示不同意組織上对滕劍的結論后，張当即支持說：“你有意見可以提！”張靜超同意方一臣在党组扩大会上污蔑机关肃反工作是“执行政策有問題，作法也有問題，开始鬧个烏煙瘴气。对滕劍的問題到現在我还有不同意見”，並且支持方一臣說：“這個問題要解决，实事求是，搞錯了就糾正”。当省委指示肃反复查后，張靜超又得意地向幹部散布說：“肃反时有人批評我們右傾，現在看，还是穩当点好”。並企圖撤銷原五人小組，建立“平

反”組織。繼而三番五次地指示齊康鼓動壞分子滕劍翻案。整風開始后又親自找滕劍談話，並幫助滕劍尋找翻案“理由”，指點滕寫翻案材料送交省委，再三地叮囑說：“不要顧慮，要相信黨，材料（指申訴）還是要寫一下，寫出來抽時間送去”。在張的積極鼓動下，滕劍終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正当社會上右派分子向黨大舉進攻時，向省委五人小組提出了翻案申訴。（反右派鬥爭開始後，滕感自己翻案理虧，又撤銷了他的“申訴”材料。）

破壞反右派鬥爭，包庇右派分子。張靜超在反右派鬥爭中，把持廳整風領導小組，利用職權，違抗上級指示，改變整風領導小組成員，排擠黨總支書記對整風運動的具體領導。竭力散布：

“監察廳沒有右派，倒有幾個‘左’派”，“雖然有些右派言論，但和社會上的右派言論性質不同”等右傾思想，以麻痹和渙散群眾的鬥志。對總支動員黨員克服右傾思想，積極進行反右派鬥爭，也橫加阻撓。為右派分子王景山、黃憲德、劉繼民等攻擊肅反、誣蔑領導幹部的反動謬論辯護，說是“內部問題，偏激情緒”。還大肆散布：“王景山是工農出身，工作好。他的鳴放還不是章、羅右派分子所影響的”，“黃憲德是農民出身，沒有啥。黃憲德、姜浩云都不屬於右派言論”，極力反對將王景山、黃憲德、劉繼民等人定為右派分子，極力包庇以他為首的反黨小集團的右派分子過關。

攻擊農業合作化運動，否定農業合作化的巨大成績與一九五六年的農業大豐收。造謠說：“毛主席對糧食增產也有懷疑”。把報紙上刊登的遼寧辦社的巨大成績說成是“吹牛”。指示幹部專門調查農業合作化的“毛病”。在地、縣委書記會議上，省委總結了遼寧省一九五六年農業合作化的巨大成績和農業大豐收，批判了農村中出現的一股“冷風”，但是會後第三天張靜超即指示幹部去錦縣、鳳城兩縣調查一九五六年的產量是否實在，有無“吹牛”，污蔑農業增產措施是“勞民傷財，怨言載道，主觀主義害死人”，“盲目開水田，打井大部是廢品，旱植播變成了

‘早脖子’”，向監察幹部大肆散布其反動觀點。

張靜超不僅誣蔑農業合作化，而且还反對遼寧省一九五六年所出現的工業高潮，他向幹部無端地散布說：“中央沒有這個指示（指工業高潮），是我們省里自己搞的”，並指示幹部下去了解“圍繞工業高潮造成了一些什么惡果？”

扭轉監察機關的政治方向，把監察廳作為他的獨立王國和反黨工具。張對檢查工作，主張專門尋找領導上的毛病，搞所謂“政策”性的問題，用以攻擊領導，對檢查處理案件，主張單純的“揭發”，“問題越大越好”，採取“算大賬”和“整”的辦法。級指示、決定拒不執行，利用監察機關的職權，反對省人委關於對“遼河分洪的決定（這個決定是經國務院批准的）”說“分洪是錯誤的，有很多人口、農田受害，比廣西事件還嚴重。我們要反對這一決定”。對省委政法部傳達貫徹中央關於“穩定提高”的幹部工作方針，也拒不執行，說“我們有我們的工作安排”。他極力反對黨對監察機關的領導，誣蔑省委政法部是“以黨代政”，向幹部散布說：“監察部門幾年來，老是強調黨的領導，黨內省長能領導，黨外省長就領導不了！”並狂妄地說：“黨委沒有權力審查我們的工作計劃”，力圖把監察部門置於黨和政府之上。

從張靜超一系列的反動言行看，其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社會、歷史和思想根源的。早在延安受黨的審查和未當選“七大”代表時，即對黨表示不滿，寫信質問中央負責同志。土改時，誣蔑黨對地主鬥爭“過火了”，“三反”時誣蔑沈陽市的“三反”運動有問題，他在沈陽市農委工作時，不執行市委指示，飛揚跋扈，鬧獨立王國，進行反黨活動。他出身於封建地主家庭，在舊軍隊當過軍官，存有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雖經黨的長期培養教育，但是並沒有得到改造，由於個人主義不能滿足，而長期對黨不滿，和黨离心离德，堅持其反動階級立場。以致最後走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

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對他的反動言行雖然經過大小會的揭

發和批判，但是張靜超仍然狡猾抵賴，並誣蔑組織上對他的結論材料是“捏造”，繼續與黨對抗，毫無悔改之意。

根據上述事實，張靜超系極右分子。經支部大會討論總支委員會研究，一致通過（本人除外）將極右分子張靜超開除黨籍。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 中共遼寧省監察廳總支委員會 關於開除極右分子方一臣黨籍的決定

方一臣，男，三十六歲，山東省沂源縣人，貧農家庭出身，學生成份，一九三九年四月入伍，同年九月入黨，歷任縣大隊文書、連指導員、區長、縣科長，遼東省監委處長、副秘書長、原任遼寧省監察廳副廳長、黨組成員。方一臣在一九四六年曾被敵人俘虜，被監禁在敵人的集中營。

方一臣主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是：

### （一）反對肅反

（1）肅反初期，因撤銷其五人小組成員和審查其愛人（姜浩云）而對黨不滿，進而蓄意攻擊肅反。肅反初期方系監察廳五人小組成員兼肅反辦公室主任，在其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支配下，極力散布“監察廳無反可肅”，說，“廳里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黨員，都是當地人，經過各項政治運動考驗，不會有反革命分子。”因為他存在着嚴重的右傾思想和本身有政治歷史問題，撤銷了他領導肅反的職務。於是他更加對黨不滿。說：“肅反究竟誰對誰不對用歷史來作結論”，其妻姜浩云（右派分子）是自首分子，因受組織審查對黨不滿，肅反運動中表現不好而被批判，方一臣對這事也懷恨在心，說：“打狗還得看主人的臉面呢！”以後為了達到他所謂“算肅反的賬”、“爭一口氣”的反動目

的，便煽風点火，極力歪曲事实制造謬論，丑化和攻击領導肅反的同志，用以反对肅反。

(2) 反对对坏分子滕劍的斗争，誣蔑确定滕劍为斗争对象是：“矮子里拔將軍”，並鼓动坏分子翻案。方一臣为了达到他反对肅反的目的，寻找根据，在斗争和处理滕劍案件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法活动，他和右派分子張靜超、王景山、刘緒城等人互相串通，方說：“滕劍不够反革命，投敌叛变也值得考虑”，並誣蔑領導肅反的負責同志“不实事求是”“有个人主义”“滕定为坏分子是郑克昌和王生天同志再三坚持的結果，否則坏分子也不够”，在方的策划下，早在肅反期間，刘緒城、王景山就鼓动过滕劍翻案，在定案后，方又亲自找滕談話，並制造謠言給滕打气說：“你的問題你要沉住气，我估計頂大是个坏分子（方認為是屬於百分之九十几好人之內）”，“肅反难免出偏差”，“有意見可以向中央申訴”等等。后来在方、張的煽动下，滕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向省委五人小組提出了翻案申訴書。

(3) 对机关肅反进行了一系列的誣蔑，並丑化肅反領導，策划反党分子向党进攻。厅內肅反期間，在幹部分类排队时，只确定一名肅反斗争对象（即滕劍），但方一臣却造謠說：“肅反面寬了”，“有一点政治历史問題的人，都当了肅反对象”，無中生有的捏造說“三类加一起打击面百分之四十以上”。在思想建設阶段，我厅正确的貫徹了省委的指示，收到了很大的成績。在思想建設当时，方向同志們散布說：“我們机关不象別的机关，思想建設不必单独搞，可以結合党日进行”企圖取消思想建設。思想建設以后又在群众中散布說：“处、科長以上幹部，除搞肅反的就是被斗争批判的”面寬了，对重点批判的几个人，他說：“不必要过分了”，特別是对王景山、姜浩云的批判，方採取了對抗的态度說：“既然斗了就要作結論，組織上应作出斗錯了的結論”。自肅反以来方一臣与王景山、姜浩云等人經常串通在一起丑化、謾罵机关領導肅反的同志，誣蔑領導同志“不实事求是”



是，有个人主义”。当王景山、姜浩云謾罵領導肅反的同志時，方一臣還從中挑撥，並支持鼓勵王、姜到省委去誣告。方還散布“肅反耽誤了業務”，“肅反花了不少冤枉錢”。

(4) 到處煽風点火，爭取同情，借黨整風時機，糾合反黨分子，攻擊肅反。肅反以後，方一臣向機關中的一些肅反積極分子散布說：“機關肅反存在嚴重問題”，“膝劍的結論不切合實際，思想建設有錯誤”。當黨提出整風，方認為算肅反賬的時機已到，即到處煽風点火，向郭永平（工業處處長，肅反時被批評過）煽動說：“整風了，你有意見就提嗎！”郭說：我對肅反沒有意見，又沒有把我當反革命斗。方說：“你別太天真了！”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張靜超召開“解決”肅反問題的黨組擴大會議（把鄭克昌、王生天同志排斥在會議之外），會上方系統的攻擊了監察廳的肅反運動，他說：“監察廳的肅反確實違反了方針、政策，作法也有問題，鬧了個烏煙瘴氣”等。特別是在黨中央發布了整風指示以後，方、張便一呼一應，極力策劃向党進攻。在制定整風計劃時，方找整風辦公室的齊康同志談，除了系統的攻擊肅反以外，並指令齊康同志說：“我廳最主要問題是肅反和肅反遺留問題，這次整風的主要內容，應當解決對肅反的一些意見”。企圖借整風之機向党進攻。在鳴放時方鼓勵王景山“有啥說啥，對領導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王在鳴放會上用方供給他的反黨材料，集中的對肅反進行了系統的污蔑，在鳴放會上叛變分子黃憲德（原肅反辦公室成員）和王景山、姜浩云一唱一合攻擊肅反，當同志們對黃的反動言行提出批評時，方一臣就找黃談話鼓勵他說：“你為人公正、直爽，敢大胆提意見，堅持原則”等。並又向黃散布了有關機關肅反問題的一系列謬論。如說：“咱們機關肅反問題我也有很多意見，幾個處長都斗了，是違反方針政策”等等。

(二) 破壞反右派鬥爭。

(1) 散布“黨內不會有右派分子”，以保護他們的伙伴

过关。当整風轉入反右派斗争以后，方見勢不好，就極力和張靜超把持整風領導小組，保护他們反党伙伴过关，方在領導小組会散布說：“党内不会有右派分子，鳴放提的意見，絕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的情緒偏激，有的暴露了个人主义、平均主义，但我們厅内党团员多，現在还没有什么右派言論，也沒有右派分子；不是公开罵党的就不是反党；虽然有的和右派的言論相同，甚至有过之無不及，但思想本質不反党，也不能划为右派”等謬論，企圖轉移群众視線，当省人委領導小組与省委負責同志批評了監察厅領導右傾时，方竟公然反对，狂妄的說：“讓事实来証明，我們机关有沒有右派言論和右派分子吧！”並向整風办公室的同志說：“党委袁書記偏听偏信王生天的話，你們給党委提个意見，我們搞的不好，叫党委派人来搞吧！”公开抗拒組織上的批評。

（2）利用职权，千方百計的反对追查右派的反动言行。当总支副書記王生天（領導小組成員）提出學習人民日报社論“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等文件，应联系追查王景山、姜浩云等人的反党言行时，方一臣在領導小組会上向王生天同志大發雷霆說：“学这个文件联系檢查实际，想把对肃反提意見的人压下去是怎的！”並惡毒的污蔑說“是抓住几个对肃反提意見的人，企圖逃避整改”。

方在領導小組会上也一再为右派分子王景山辯护（王景山在大鳴大放期間講了“沒有反革命非要弄成反革命不可”，“肃反造成了溝、牆，溝很寬，牆很厚”，污蔑“思想建設是思想破坏”等反动的言論）。方說：“王景山提出這些意見，虽然提的有些过分，但事实存在，不是借鳴放之機向党进攻”，他和張靜超一致反对划王景山为右派分子，同时也不同意說这些是右派言論。当群众貼大字报要王景山出来答辯时，方当着办公室的同志發火說：“如果同意他們貼這張大字报，那我也写！”極力予以压制。

(3) 向右派分子遞風報信，指點其蒙混過關。一九五七年八月間，右派分子王景山由鄉下回來，看了大字報以後，心裡發慌，方一臣就告訴王說：“你的發言，領導小組中只王生天一個人堅持說是右派言論，研究了好幾次，沒通過，反正他一個人說了不算！”又說：“你的發言，有些說法不太恰當，我和張廳長很擔心……錯了就檢討檢討，反正搞不上右派”。直到九月十二日省人委整風領導小組決定撤銷張靜超的監察廳領導小組長及成員的職務，監察廳領導小組確定王景山為右派分子上報時，方仍拒絕同意。在劃劉繼民為右派分子過程中方深怕反擊了右派，提高了群眾的識別能力，把他們揪出來，所以也一再為劉辯解。

(三) 讚揚、支持污蔑農業合作化，否定農業生產成績的謬論，否定監察工作成績。

右派分子王景山在一九五六年一月至十月的農業監察工作總結中造謠說：“我省農業生產表面上看是獲得了豐收，但豐收裡面還埋藏着嚴重問題，在秋收分配中才原形畢露，有很多社不能增加收入；強迫農民大力打井，勞民傷財；盲目推廣雙株苞米，在全省範圍造成減產”和“天沒下災，地沒長災，政府給人民造災”。方一臣對這些反動言論完全同意，批准打印，以廳名義上報國家監察部。方一臣由部開會回廳後，向辦公室的同志們讚揚說：“農村處總結寫的很好”“有內容”。右派分子張靜超攻擊一九五六年遼寧省的農業生產成績，說一九五六年度征購糧任務沒完成的原因是“夸大農業生產成績，糧食產量不實”，在給省人民委員會的報告中叫囂“重新審查一九五六年糧食產量”，方一臣對張的這種謬論也完全同意，於一九五七年七月和張共同簽發了這個報告。

此外，方一臣在總結一九五六年度監察廳的工作時，歪曲事實，向各處負責同志散布：“商業監察抓的零碎，沒抓住要害；農業監察淨跟農業季節跑；糧食監察淨跟業務部門跑”。

方一臣之所以墮落成為右派分子，並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

思想根源与历史根源的。方虽早年参加革命，但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很严重。长期以来一贯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贪图享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乱搞女人、讲排场，並有过几次贪污行为（当副厅长長期間还贪污旅差費）。当被提拔以后又得意忘形，驕傲自滿，自以为是。肃反运动涉及本身問題时，就起来与組織对抗，站在坏分子、阶级異己分子的反动立場上，百般挑剔肃反运动的“毛病”，長期坚持反动立場，狂妄的說：“讓历史作結論”、“爭一口气”、要算肃反的賬，到党提出整風的前后，就更加囂張，到处拉攏，到处寻找机会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完全变为资产阶级在我們党內的代言人。方一臣所以墮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是他的一系列的反党思想行为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二十六日，先后开了六次大会，十九次小組会对他进行說理斗争，在开始的六次交代中，还一直为他的反党活动作辯护，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曾一度表示低头認罪，但最后又全部推翻，态度極为惡劣，破坏机关制度，長期不請假也不到办公室来，不参加机关劳动，借机关購買公債之机，繼續放毒，攻击机关的反右派斗争。直到反右派斗争以后，仍無悔改表現。

上述事实充分說明了方一臣是混在党內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分子，是资产阶级在我們党內的代言人，是一个無悔改之意的極右分子。

經支部大会討論和总支委員會研究一致通过（本人除外）开除極右分子方一臣的党籍，以純潔党的組織，增强党的战斗力。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 中共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党组

## 关于右派分子郑北辰的处理結論

郑北辰，男，四十七岁，四川蒼溪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三年入伍（一九三八年五月重新入党），現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檢察長。

### （一）个人主要经历和政治历史情况

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九年在紅四方面軍任書記、教員、审訊、偵查、保衛等工作。抗大校幹事、科長。十三軍分区政治部主任、軍区后勤部政委。張家口軍管会政治委員、东北呼倫貝尔保安司令。地工委書記、公安局長、十五兵团保衛部長等职。

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四年任广州公安局秘書長、广州市檢察署副檢察長。

一九五五年任广东省檢察院副檢察長。

一九三二年因西路軍失敗曾被俘失掉組織关系。經抗大二分校党委会审查，認為被俘期間無問題。

### （二）主要反动言行

#### 一、大肆攻击省委

郑在高級党校学习时，乘“鳴放”之机，从各方面惡毒攻击省委，說省委“領導上求形式，不踏实，不实在，有表功思想，功越高越好，成績越大越好”。並污蔑省委的工作成績是“上面主觀确定一个数字，要下边承認，喜欢高的，不喜欢低的，下面不求实际，就吊打逼死人”而得来的。他攻击省委在領導粮食生产上所取得的成績，說：“下面假报数字，上面就說增产”。污

茂省委的幹部政策是“工作積極的犯錯誤，消極的都提拔，提意見的吃不開”。還說：“省委不僅不改正錯誤，而且是有意掩蓋錯誤，如粵西茂名龍首鄉，因災餓死不少人，還說不缺糧”。他認為省委“老談地方、外來，是有宗派主義情緒”，“這些都是宗派主義的表現，都是形而上學的，放棄了原則，沒有堅持黨的原則”。他說對“這些問題不能含糊諒解了，應算算賬”。還污蔑說：“省委整風是否能改？中央光明，有的地方照不到，有陰暗的角落”，並叫囂說：“中央應該管”，“中央組織部應主持公道”。

## 二、惡毒攻擊鎮壓反革命運動

在“鳴放”期間他說：“社會鎮壓反革命中，有很多不踏实的地方，表現在數字上有不少主觀要求，下面找不到就扣一個新滋長的反革命的帽子。”污蔑公安人員“有抓人比賽的現象，抓不到張三，就抓一個王五”，還說：“數字追加，多抓人這是大問題，鎮反是越鎮越少，為什麼越鎮越多”，這都是“公安局報功，鄒瑜同志限期要抓多少人”的結果，還說：“省委不應該讓鄒瑜搞鎮反，鄒年青冒失，嘴上沒毛辦事不牢，以致造成錯誤，省委要負責、政法部要負責。”

## 三、一貫反抗黨對檢察機關的領導

他搞檢察工作以來，一貫反抗黨的領導，早在1953年他就想見毛主席告各級黨委不重視檢察工作，並製造不少反黨謬論，說：“黨委不懂業務”，“黨委不按法律辦事”，“黨委不解決問題”，並對幹部說：“不要對黨委太老實，黨委說什麼就做什么”。他極力強調“垂直領導”，罵市檢察院“你是省檢察院領導的，還是市委領導的？”“你是聽省檢察院的，還是聽市委的？”並說：“法律是中央制定的，服從法律就是服從黨委，執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指示就是執行中央的指示”。他在廣州市檢察院時污蔑“市委對問題看法有偏向”，說：“市委這樣解決問題的观点和原則今後檢察機關如何進行工作”。一九五六年五月

省檢察會議時，拒不執行省委、政法部文部長對偵查工作的指示，堅持把偵查工作列為重點，說：“文部長不懂業務”。並在八月全省偵查工作會議上謾罵省委對偵查工作的指示是“錯誤的，片面的，嚴重右傾保守的具體表現，是違反憲法、組織法的”。

#### 四、企圖篡改檢察機關的性質

他極力強調搞一般監督，說“市檢察院是搞一般監督起家的”，將專政矛頭指向我內部，對幹部思想作風上的毛病，堅持要逮捕，市委不同意，則說：“市委包庇犯罪”，強調監督公安、法院，說：“公安部門處處都是左的，天天講鎮壓懲辦，不講寬大，不講法律”，破壞公安、法院的威信，把不講政策和粗暴的事都叫做“公安觀點”。早在一九五一年市法院辦錯一案，鄭即召集機關代表、報社幾十人的會議要法院院長在会上檢討，並稱：“檢察院就是監督法院、公安的。”在鎮反時他拒不執行中央和省委要成立聯合辦公室的指示，說：“成立聯合辦公室是拉倒車，不合法，搞亂了檢察院的組織”，並把檢察幹部搞內部肅反說成是：“不務正業”。他反對黨委委員兼任檢察長，認為“兼職是人家的，專職才是我們的”。

#### （三）鬥爭中的態度

態度一般還較好，基本上交代和承認了反黨言行。

#### （四）一貫表現

鄭一貫居功驕傲，狂妄自大，擺老資格，要名要利，對黨不滿，抱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反動思想，在工作中實行家長制領導，隨便開支公款，謾罵幹部，引起群眾極大憤恨，當他離職學習去，群眾高興的說：“這可解放了”。

#### （五）結論與處理意見

鄭在“鳴放”期間，惡毒的攻擊省委，攻擊鎮反運動，並一

貫有反党言行，情节严重恶劣，应划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較低工作。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 中共广东省人民檢察院党組 关于右派分子盧偉良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

盧偉良，男，四十九岁，广东梅县人，矿工出身，矿工成份，一九二九年一月入伍，同时入党，現任广东省檢察院副檢察長。

### (一) 个人主要經歷和政治历史情况

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九年曾任梅县共青团書記、大埔中央交通站站長、紅軍总司令部二局參謀、国家保衛局保衛团參謀長、抗大教导师、东江縱队大隊長、政委、支隊長、渤海軍区參謀处長等职。

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三年任兴梅县專署專員、华南公路指揮部幹部部副部長。

一九五四年任广东省檢察院副檢察長。

一九五七年因搞不正当的兩性关系，曾受警告处分。

### (二) 主要反动言行

一、一贯抗拒党对檢察机关的领导，不执行党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五月全省檢察會議上，省委政法部文部長曾指示不要強調搞偵查工作，但盧坚持把偵查工作列为重点，並与郑北辰副檢察長向分院檢察長布置不要执行文部長的指示。省委批示省



檢的會議情況報告時，又一次明確不要把偵查工作列為中心，各地黨委要檢察機關執行省委指示時，盧說：“堅持原則，開展鬥爭。”

一九五七年二月省委政法部寇部長在公安、檢察會議上作關於在政法部門反對縮手縮腳的報告時，盧又極力反對說：“寇部長的報告值得研究”，“可以不傳達”。並搜集材料來証實檢察機關沒有傾。

一九五七年八月省檢察院要求省委通報合浦地區幹部違法亂紀情況，省委批評省檢察院並責成省檢察院檢查合浦分院的右傾，但盧却要分院搜集新的材料，以抗拒省委。

盧一貫製造反黨謬論說“黨的決定政法部門不一定執行，政法系統可以獨立活動。”“檢察機關上下級關係是父子關係。”還說：“在黨委和上級檢察機關意見不一致時，下級檢察院按法律不能違背上級檢察機關在法律上作出的決定，否則就是違法。”他極力反對黨委抽檢察幹部搞中心工作，要下面對黨委說：“你就說是省院決定的，不能去。”

## 二、為右派分子向黨進攻提供材料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黃紹竑來廣東“視察”時，盧不執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向黃提供“公安呈捕的犯人，只批准百分之五十幾”的材料，使黃得以大肆攻擊肅反、鎮反運動，當上級追查時，盧還抵賴說：“彙報的材料是事先經省委批准的。”並說：“不了解黃紹竑是壞人。”

## 三、攻擊肅反、鎮反、土改運動

去年討論北海肅反案件時說：“肅反、鎮反的檢查，錯了那麼多案件，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主要的，還是問題。”並向一些民主人士、走私犯等洩漏我肅反時捕人、管制自殺的情況。

他一貫對土改不滿，說：“興梅土改是有問題的，搞錯了許多華僑。”並捏造說：“中央派廖承志同志來檢查，批評了陶鑄，陶受批評後病了。”他還經常說：“難道興梅沒有搞錯嗎？”

兴梅土改就是有偏差，我当專員难道不知道。”

#### 四、一貫包庇支持坏分子进行翻案

盧支持三进三出、二次自首，受撤职处分的盧偉光翻案，亲自帶盧偉光去找县委書記，說对盧偉光的处分太重，在盧的支持下，盧偉光串連了曾受过处分的郭文杰等五人，以盧的招牌，乘机翻案，在大放大鳴期間組成反党集团，猖狂向党进攻。盧还鼓动梅县对党不滿的梅县教員李發英向省委申訴，一貫包庇極右分子張平等。

#### 五、腐化墮落，違法乱紀

盧經常与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来往，在家中开舞会、唱黄色音乐、跳牛仔舞，群众在他門口写“花天酒地大閨人”。一貫搞不正当的兩性关系，在兴梅、广州兩地被他污辱的妇女，已知的就有五、六人。並与有杀夫之仇的，有特务嫌疑的反动会道門头子乱搞兩性关系。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兩次去梅县檢查工作时都强迫与梅县一女幹部接吻、擁抱。

勾結走私犯，进行販私活动，推銷脏物，接受脏物。据盧承認接受脏物有魚肝丸、肝精針、賀尔蒙針、鋼笔等等。

#### (三) 斗争中的表現

交代問題不老实，态度恶劣，並与走私犯訂立攻守同盟。

#### (四) 結論和处理意見

根据上述反动言行，应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分配到下面去劳动鍛鍊。

广东省委决定：省委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九十七次常委会議討論了中共广东省人民檢察院党组关于右派分子盧偉良的处理結論，决定划盧偉良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

# 中共广东省民政厅分党组 关于右派分子关山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

## 一、关山簡历

关山,男,48岁,广东开平县人,貧农家庭出身,本人店員成分。現任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分党组書記(在反右派斗争时已撤銷),中共广东省第一屆党代表、省政协常委、广东省轉業建設委员会副主任。关山一九二六年参加工作,一九二七年入党。历任:馬共海总書記,总工会委員長,地党書記,县委書記,巡視員,特派員,兩广縱队直屬政治部主任,东縱队党委委員,后勤部政委,粵中地委副書記,江門市委書記,市長,华南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处长,副秘書長等职。

曾兩次失掉党的关系;兩次被捕;兩次被扣查。一九三六年重新入党。

## 二、主要反动言行

### 1. 攻击党中央和省委领导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关山在全厅幹部大会上說:“抗美援朝时毛主席發帝国主义的政治脾气,反胡風学习时又發胡風集团的政治脾气,現在又發章罗联盟的政治脾气了。”並辱罵过七个省委書記,說:“省委……主观主义,不了解情况,对問題处理有些偏,对右的处分多,左的处分少,有时也輕于許愿”;又罵林李明同志:“你就过濶咯,从副部长而部長而副書記,难为被搞錯

的人苦，斯大林还有三七分，陶鑄同志……也不能沒有錯，你就連他放个屁都說是香的”；还罵过区夢覺書記是“靠运动起家”；罵王德同志是“喜則加諸膝，怒則投諸淵”。

## 2. 反对無产階級專政，否定肃反成績，鼓励翻案

他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省选举工作座談会上代表省入委黨組作总结發言时說：“無产階級專政本身也帶來陰暗的一面，專政多了，造成主觀主义、官僚主义……”。

他說：“肃反运动面震动太大，群众一压，肃反对象乱講十五分鐘，我們查几个省，几个月時間也搞不清。”“沙塵滾滾，杀錯良民”，並叫釋放的肃反对象“感到那里痛就叫，我們替你敷药。”又污蔑肃反运动为“釀苦酒”，說：“苦酒是我們釀的，应由我們来喝干”，積極的鼓励他們說：“你們有意見就提，拍桌子罵娘都可以，因为过去我們拍得你們多了，罵得多了，現在拍回来也是應該的”，“过去我們對你們狂風暴風，現在要你們来个和風細雨，这是多么不合人情的。”致使肃反对象瘋狂进行反攻翻案，公开威迫組織承認肃反搞錯了他們，要在報紙上公开承認錯誤，賠償損失。

## 3. 攻击历次运动

他污蔑“历次运动是一个接一个，积累着不少遺留問題沒有解决”。当黨总支副書記向他會報黨委召开清案工作會議精神后，他說：“成万錯案，还說成績是主要的，我不同意黨委的意見，有錯誤也不承認，还向積極分子打气”。並多次在幹部大会上說：“你們被关山冤枉，关山也被人冤枉，三反时关山被人整到契弟咁头”。

## 4. 積極参加反党活动，積極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階級異己分子申冤辯护

一九五六年底積極参加吳有恒等人的非法活动，联名上書給省委，为郑鼎諾等人呼冤翻案。郑鼎諾出獄后，关指使其向有关方面搜集材料，写报告申訴，並批准給予医药費補助和定期定量补

助。还积极支持廖宣、文植漢等七人密謀上訴，翻花县土改整队和松仔嶺及江門事件的案。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罗醒、陈柏麟多方进行庇护和照顧。

### 5. 刻骨仇恨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他罵龙世雄同志說：“你簡直是踏着別人的屍体前进”；罵关立是“投机”“品質惡劣”；在全厅大会上污蔑肃反运动的积极分子是“打手”、“乘机駁乱”、“拿着一塊骨头就張牙舞爪”、“靠运动起家”、“靠左傾起家”；罵檢查肃反工作的張杰同志是“割耳朵邀功”；当面指罵李丽南同志“人事科幹部象特务作風，难怪人家說你們人事部門、組織部門是特务机关”。

### 6. 攻击整風运动，到处点火，鼓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

他在“春風吹到玉門关”的大字报中提出“要用十二級台風把党改造好”，又在“半边与一輪”提出要扩大鳴放范围：“从鬍子、眉毛到道德品質，从鷄蛋、柑子到政策方針；从老婆孩子到社会制度；从……到。”又說：鳴放要專講“坏的”。

在鳴放期間，擅自組織一肃反对象和不满分子为主体的牆报編委会，提出写稿“要尖銳，要针对黨員負責幹部的編輯方針，”控制牆报，作为反党基地。

在鳴放期間，关山在全厅幹部大会、民主人士座談会、肃反善后工作座談会上多次說：“本厅主要矛盾是三反、肃反、串干等遺留問題”，要紧急集合，脫了衣服的，光着脚的，沒有抽好褲子的都迅速跑出来。“你們不要怕，有痛就叫，有屁就放，可以提出申訴”。而且当右派集团首領余倫有把向党进攻計劃長篇連載告訴关时，他說：“好！你們写吧！”你們写稿多，有功劳，不用顧慮，有問題来找我，我負責。”並积极掩护右派分子过关。

## 三、斗争中的态度

自从他的問題被揭發后，态度極端恶劣，公开恐吓和压制檢舉材料的同志，在小組斗争中，頑固抵賴，拒不交代，經数十次大小会反复斗争批駁后，有了些交代，但仍避重就輕，不低头認罪，企圖蒙混过关。

#### 四、一貫表現

关山在参加革命前，深受資產階級影响，参加革命后有極端严重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对党对領導不滿。任組織科長时他把党的幹部分成“寵臣、近臣、远臣、打入冷宮”，搞过“橫秋社”小組組織活动，分裂瓦解党的組織；东縱北撤时，說珠江縱队是沒有父母的，在群众中大罵王作堯副司令，並蓄意把王副司令推下大海（未遂），在粵中工作时有極其濃厚的地方主义，反对中央依靠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方針，包庇支持階級異己分子。因“江門事件”受党内警告处分。

#### 五、結論和处理意見

据上述事实，情节特別严重，态度恶劣，应划为極右分子，本应实行劳动教养，但照顧其本人身体和家庭情况，給予从寬处理：开除党籍，撤銷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降职、降級、降薪，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广东省委决定：广东省委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九十七次常委会議討論，决定：划关山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实行监督劳动。

中央批示：同意划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实行监督劳动。

## 中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支部关于 开除右派分子鄔家箴党籍的決議

鄔家箴，男，三十九岁，浙江宁波人，高級職員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分，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新四軍教导队医务所指导员，軍法处科員，二支队特派室股長，苏北行署公安局科長，县公安局長，杭州市軍管会公安部处長、省公安厅处長、温州專署公安处長，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党組副書記等职。

反右派斗争中揭發的大量事实証明：鄔家箴在担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党組副書記期間，为了卑鄙的个人野心，利用职权，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党的領導、反对人民民主專政、反对民主集中制，篡改人民法院性質的罪惡活动，已經完全墮落成爲資產階級在党內的代理人。

(一) 反对党对审判工作的領導。他借口“审判独立”，主張“党主要是政治思想和方針政策領導”，反对党委审批重大案件。他認为“党委批案在法律上說是不合法的”，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包办代替”法院的工作，是“党委犯了事务主义”，“不能發揮法院、审判人員的積極性和工作責任心”。有意歪曲党的集体領導和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原則，說省委审批省法院党組的案件是“个人否定集体”，“名义上代表省委，实际上还是个人，与‘八大’精神不符”。並借口反对由公安部門負責入审批案件，反对省委領導。他还誣蔑省委不懂法律，“法制观念不强”，認为我們的法制規定上，已有很多防止錯案的措施了，党委在監督上可以通过檢察院来实行，無須再审批案件，在实际工作中，对抗省委指示，陽奉陰違，拒絕执行，利用法律程序方便蓄意篡改省委指示，並散布流言蜚語，佈置收集材料，攻击省委領

導同志。同時，他與右派分子劉更生互相吹捧，打擊、排擠院長，說院長“不懂業務，不解決問題，幹不了，抓小不抓大，很使我們失望。”甚至逼問院長“你什麼時候走呀？”一方面又成天叫“黨組分工不明確，職責不清，自己無權”，“吳院長來了工作反而難辦”，以致消極怠工，刁難院長，企圖擠、逼院長“下台”，他好取而代之。

（二）以資產階級法律觀點企圖對人民法院實行“革命”，反對在法院審判工作中實行民主集中制。說什麼法院“特殊”，有“兩套組織”、“審判委員會和合議庭是審判組織，院、庭長是行政職務，對合議庭不是領導關係，僅是指導關係”；批案“不合法”，“不符合集體領導原則”，“是多數服從少數”，“個人否定集體”。說院、庭長不批案“可以進一步發揮幹部工作的獨立性和創造性，保證判處及時”。硬說一九五五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制訂的“有關審判工作職權範圍劃分的若干規定”已經不適用了，指使右派分子劉更生制訂了一個公開反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新規定，正式提出院、庭長對合議庭不是領導關係，不能審批合議庭的案件，以“兩級制代替四級制”。取消院、庭長對合議庭的領導。這個規定遭到審判委員會多數委員反對，在沒有被通過以前，他就擅自以副院長身分，到處吹噓這是“革命措施”，“最大的先進經驗”，“有十大好處”，積極推行。

此外，鄔家箴還積極散布和販賣“有利被告論”，“無罪推定論”，“直接證據論”等舊法觀點，千方百計地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開脫罪責，甚至提出“寧可錯放”的口號，形成一個系統的包庇、縱容敵人的“理論”，對全省審判工作流毒極深。

（三）攻擊肅反運動，極力誇大肅反運動的個別缺點和錯誤，否定肅反成績。誣蔑肅反運動是“杀气騰騰，以殺為快，有捕必判，盲目長判”。對黨委統一領導、公安、檢察、法院三者



組織聯合辦公室一致對敵說是“不合法”。“一九五五年反右傾實際上起到強迫命令的作用”，搞控制數字、上調勞改犯是“造成錯案的原因”。說“肅反運動的缺點和錯誤是嚴重的”，錯案佔百分之二十。因此他在清案查錯中，只查錯，不查漏，下邊檢查缺點錯誤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就指責是不深不透，還叫囂“一九五五年肅反錯誤摸不到底”，說省委對查案“勁頭不大”，說什麼“肅反案件搞到這種質量，不檢查還行嗎？”他還誣蔑機關肅反“副作用”和“消極因素”很大，“佔法院百分之三十”，“法院工作被動是從肅反來的”。並指責肅反幹部“不務正業”，乘黨組書記不在家的時機，在黨組會上逼令肅反幹部檢討。

（四）在大鳴大放期間，與社會上右派分子里應外合，向党進攻。在龍泉拆塔事件上與右派分子宋雲彬遙相呼應，積極主張法辦拆塔人員，並以刑法草案為炮彈，配合右派分子向党進攻。吹噓右派分子黃紹竑是“進步的”，“懂法的”，並說：“向省委反映法制建設還不如向黃紹竑反映解決問題”，黃紹竑猖狂向党進攻，他說：“黃紹竑的意見都是事實”。

鄔家箴出身是非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後，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覺性，一直保持着資產階級的思想、觀點，處處頑強地表現自己，力圖按照自己的面貌來改造黨。在工作上一貫表現驕傲自大，抗拒領導，自作聰明，標新立異。思想上享樂腐化，斤斤計較個人得失，要地位、要待遇、要物質享受。當他因政治歷史問題被審查時，就表現與黨離心離德。這些都是他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支部大會認為：鄔家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確已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中共浙江省委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確定其為右派分子和撤銷他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的嚴正措施是完全正確的。為了純潔黨的隊伍，支部大會建議開除右派分子鄔家箴黨籍。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 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檢察院整風 領導小組关于右派分子林芳的結論意見

林芳，男，三十七岁，共产党员（一九三八年入党）广西鹿寨人，家庭是地主，本人是学生，汉族，现任广西僮族自治区檢察院副檢察長，党組成員，極右分子。

## 一、一貫表現

参加革命后曾因替別人写假証明材料，自己伪造学历，隐瞒成份，有托匪嫌疑，于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風时被扣押，一九四五年八月甄别后釋放，已查清並非托匪。

一貫驕傲自滿，不擇手段的打击別人，抬高自己，挑撥是非。南下以后，个人主义更为發展，到处瞧不起領導，排斥工农幹部。

土改后，对地主家庭生活困难表示不滿說：“我們在天堂，家在地獄”。

## 二、主要反党言行

（1）攻击党委不懂法制，反对党对檢察工作的領導，陰謀篡改檢察机关的政治方向。他說：“党在司法工作中是宗派主义”。歪曲党委处理案件时“对幹部寬，对群众严，对大幹部寬，对小幹部严”。認為处理案件中必要的撫恤措施是“资产階級观点，拿錢来买命，和国民党一样”。攻击省委“不重視檢察工作，不懂法制”。誣蔑說：“省委某書記不懂法律，对檢察工作有成見”。說政法部門配合中心工作处理案件是“沒有心肝”。認為“幹部的违法乱紀主要是党委的責任”。提出对党委獨立的

主張：“檢察院办案自审自批，不須經党委批准，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並常煽动鼓励下級檢察幹部对抗党委，提出不替党委做“擋箭牌”，“丟掉烏紗帽”，企圖把檢察工作駕凌党組織之上。

(2) 組織反党小集团，是小集团的首領，进行宗派活动，陰謀篡夺檢察院的領導权。整風开始，与他長期培植的反党分子汪說汉、刘荣璋，借“向科学进军小組”名义組成小集团，召开黑会，以統一反党反領導的思想認識，暗示、引导他們向党进攻。鳴放中，支持同情汪、刘的右派言行与無理要求。助長了汪、刘的气焰。企圖造成混乱，以便夺取檢察院的領導权。反右开始，为汪、刘辯护，說“他們不是右派，不要整人家”。

(3) 大肆丑化、攻击領導，破坏团結，排斥工农幹部。林芳一到省檢察院，就对工农出身的老幹部盧檢察長極尽誣蔑、丑化之能事，說盧、徐二位檢察長“水平低，能力差”，“集中不起来”。說盧檢察長服从党委决定是“跟着党委屁股跑，不坚持原則，胆小、保守”，“不执行法律，怕公安”。公开誣蔑省檢察院的領導是“吃飯、睡覺的”，是“膿包、瘡疤”。还經常丑化省院其他处长以上的工农老幹部。吹嘘其爪牙右派分子汪說汉、刘荣璋是“高才”、“專家”。

(4) 公开散布不滿省委对某些案件的处理，並歪曲事实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彙報。帶头反对政法党組的决定。不执行院党組會議決議。攻击党的幹部政策說：“省委提拔幹部，就是光照顧資格，文化低的得提拔，文化高的得不到提拔”。

### 三、斗争后的态度

經多次斗争批判后，檢討較好，表示低头認罪，願意悔改。

### 四、处理意見

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原有待遇，由十一級降为十五級。

## 附：林芳簡历

林芳參加革命前讀書，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一九三八年四月入抗大學習，曾任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宣傳隊宣傳員、分隊長、幹事、陝甘寧聯防軍直屬政治部教育幹事，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被押，甄別後任宣傳隊教員，一九四五年去東北任阜新市政府教育科長、庫倫旗委宣傳幹事、通遼縣委秘書、宣傳部長、組織部長、南下後任縣委書記、地委秘書長、公安處長，公安局長，一九五五年四月任廣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 右派分子李子萱的反黨言行 及中共湖南省委對他的處理決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李子萱，男，四十五歲，河北省威縣人，中農家庭出身，本人數員成分，初中畢業，一九三九年七月參加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入黨，現任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右派分子。

### 一、主要反動言行

1、抗拒黨委對法院工作的領導，反對審判工作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他說：“大家看領導風色處理案件，我看省委的，審判員看我的”。一九五五年省委提出檢查右傾時；他給政法黨組寫信“要政策、要標準、要方向、要道路”。一九五七年一月在會議上說：“黨委對法院只能進行政治思想和政策方針的領導，不要審批案件”。他對政法黨組研究決定的案件不說明黨組意見，只以個人名義向最高法院請示，黨組批評他時還說：“反正是為

了工作，撤职就撤职，开除党籍就开除党籍”，責令他檢討时就說：“这是給別人扫尾巴”一九五七年春省委批評“四查”以来的右傾时他反击說：“右傾我是沒有的，我看領導要特別防止左，头腦要清醒”。他竟把以往所办不当的案件归咎于“党委強調保衛中心，不注意政策”。

2、反对肃反和鎮反运动。省直屬机关內部肃反案件一、二审都由他掌握，經檢察院起訴二百零四件一审只判了一百零九件，被他頂回九十五件，佔百分之四十六；判了刑的又通过上訴和申訴減刑或免刑百分之二十；他竟說：“判刑的案犯判得都很勉强”。鎮反开始时他說：“人捕多了”、“杀人沒有标准”，为反革命分子开脫罪責，省委要他檢查一下，他說：“要杀的話只有把無期徒刑的提級”。一九五六年他帶領工作組去慈利县檢查工作以况鐘自居，把一百六十一名未決案件确定無罪釋放的十五名，教育釋放的七十名，釋放的合計佔百分之五十二以上，确定主要事实不清不能判的百分之五十，只剩下二十六名能判刑的，仅佔百分之十六点一。对漏掉的和輕判的却一字不提。因此常德地区把右傾叫做李子萱路綫。他对幹部說：“下乡时要把糾錯作为主要任务”。

3、篡改人民法院的职能，打着批判主觀主义的幌子貫徹“有利被告”和“無罪推定”的謬論。他說：“主觀主义表現，是只听被告不利的一面”；“無罪推定我們作得不够，这往往产生主觀主义；过去只要是伪人員就主觀肯定要犯罪，就是經驗主义和教条主义”。他修正办案过程中的階級分析的方法，他說：“革命与反革命是环境所造成的”；“五六年前的血債不能按反革命看待”；“奉令杀人不算血債、不是亲手杀人不算血債”；“反动会道門头子有些是基于迷信，按历史罪惡判刑沒有根据”，“职务上的犯罪不宜判刑”；“一貫違法不应判刑”；“对罪大惡極的罪犯、年青的不杀、年老的不杀、有子女参加革命和讀書的不杀”；对乘机写反动标語的說是：“見景生情”、

“要判刑是显得我們胸怀狹隘”；对以偷窃为生、屡教不改的慣窃犯說：“偷窃数字不突出，判重了群众不同情”；犯人逃跑說是“公安机关管教不严”，等等的錯誤謬論。

4、打击工农幹部、培养亲信，把个人置于党之上，制造独立王国。他在長沙市法院任院長时，打击过副院長戴天祿同志，調省法院后打击第二副院長寻先仰同志，諷刺刑庭庭長韓曉瑞同志說：“爬在桌子上怪可憐的”。但对政治历史复杂、思想品質惡劣的坏人尽力重用，他在常德中級法院时，重用叛党分子李兴周和曾任过伪北平法院刑庭庭長的林衡。当他来長沙市法院时又从常德調来李兴周分配其任民庭副庭長，並几次去函常德調林衡終未得逞。当他調省法院后，曾数次要求組織从長沙市調李兴周亦未得逞，他在長沙市法院，三年之久未参加过一次党的組織生活会。並欺騙說：“在市委有特別小組”。每在交党費时也得再三催促，甚至还說：“你們向我討債呀！”“党費也漲了价，拿去，我这个月少花七角”。調省法院后，擅自修改省院党組对調动幹部的决定，在过党的組織生活时，借故請假而去打扑克、看电影。

## 二、斗争中的态度

其罪惡事实，是群众一步一步的揭發的，自己交代不够主动，在事实面前已低头認罪，但对罪行性質的严重性認識不足，尙表示願意悔改。

## 三、处理結果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經省委討論决定：开除党籍，撤銷一切职务即：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十二級降至十六級。

##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薛一平的党籍的决定

右派分子薛一平原系本校普通班第3支部學員。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第3支部的同志們揭發了薛一平很多極為严重的錯誤，經過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校學員的批判、討論，業已徹底揭露薛一平的右派面目。第3支部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薛一平的錯誤性質，已于支部大会上通过决定將他划为右派分子並开除出党。党委会經過严肃慎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3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請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四川省委的意見，得到了四川省委的贊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员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

##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三支部关于 右派分子薛一平的政治結論

### 一、簡历

薛一平，男，43岁。富农兼商人家庭出身，本人小学教員成份。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历任牺盟会县特派員，县长，行署付秘書長等职务。来校前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付秘書長和省人民委员会直屬机关党委会書記。現为本支部學員。

## 二、薛一平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主要事实

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並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和右派分子共鳴。問題暴露后，他又玩弄权术，竭力掩盖。茲將其主要問題分述如下：

（一）攻击肃反和三反运动，否定运动的偉大成就，反对肃反的群众运动的形式。他說肃反和历次运动一样，也是准备不足，幹部被迫上馬，左右搖擺。他在四川省曾領導六个高等学校的肃反运动，但他看不到运动的成就，而認為：“成績虽有，缺点更多。”他說：“四川是胡風的老窩子，上級督促很紧，費了很大的勁，只搞出一兩個（指省直屬机关）”；又說“在四川大学一个現行反革命都沒有搞出来，就在运动当中还貼反动标語呢！”。“現行反革命能不能在运动中搞出来？我發生怀疑。”他在檢查时說：“我認為象审幹一样进行肃反。”

他同情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攻击，右派認為：“肃反採取运动形式，斗錯了許多人，是違反宪法的。”他附和說：“如对政治嫌疑很大的人，叫他們集中反省，人家攻击我們，如何反駁呢？不是反革命，斗錯了，如何解釋呢？”他还認為中央提出的肃反5%左右的控制数缺乏根据。他說：“5%是那兒来的，如果不說清楚，我也是不服的。”他同情清华大学右派分子罗蘭为胡風反革命案件申辯並向党惡毒攻击的大字报，他認為該大字报有道理；認為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風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在法律上可能說不服人”；他認為不公审胡風違反“法制”精神。他和別人爭辯說：“是否合乎法制呢？你能駁倒人家嗎？”当彭真同志明确指出不能公审胡風的理由后，他还同意右派主張公审胡風的陰謀。他說：“我同意公审胡風，为什么不能公审呢？是不是公安部还有其他材料呢？”

他对“三反”运动也进行了攻击，他多次說：“过去自己在运动中積極敏感，幹勁也大，自“三反”以后，对运动胆子小了，”



“一搞运动就考虑后果。”从此他对历次运动的急風暴雨“很有意見”。他在檢查中也說：“成績虽然是基本的，但是很抽象；而問題却很深刻，定案和原来材料出入很大，甚至公审完了，貪污案还有虛假現象。”实际上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群众性的大規模的階級斗争抱否定的态度。

(二) 他否定农業合作化的越优性。他看到他家乡的合作社后說：“合作化后，看不出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生活苦，沒有零錢化。”他認為：“合作化发展太快。”为此还对山西省委的工作有意見。

他否定山区农業合作化道路。他說：“山区人口稀少，住地分散，合作化了，沒啥好处。”当別人反对他这一錯誤論調的时候，他还說“四川許多同志都有这个意見”来为自己的謬論辯护。

(三) 和社会上右派共鳴，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同情極右分子。薛一平除上述在肃反問題上附和右派外，他还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和右派共鳴。他同情右派分子提出的教授治校的反动主張，認為應該考虑。右派要求公开人事档案，他認為：“抽出秘密部分可以公开。”右派分子李康年提出定息20年的主張，並發表文章狡辯，他都認為：“滿有道理”，“不好駁倒”。他还說：“現在思想應該轉變哪，要考虑人家的意見。”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他担任支委，不但不積極領導斗争，反而对本支部的極右分子王譚表同情，多方迁就姑息，甚至在全校大会斗争之后，他仍然認為王譚問題是思想問題，不是反党反中央的活动。

(四) 攻击党中央的正确領導，歪曲党的生活。他怀疑党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領導的正确性，並攻击說：“历次运动都是准备不足，幹部被迫上馬，往往左右搖摆，先右后左再糾偏，鬧出片面性。”他誣蔑說：“历次运动先右后左成了規律，不可避免”，其原因乃是来自“矯枉必須过正。”

听了刘子久、宋劭文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設情况的报告后，

他攻击說：“几个报告听了都很洩气，怎么都下不了台，你們是怎样幹的！”又說：“去年工資改革中央說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認为这是套公式，”“毛病多就不应当說基本上是对的，希望中央不要套公式！”。

根据四川省委揭發的材料，他过去曾污蔑晉綏整風“乱糟糟的，还不是整了些好人”，他这次又攻击整風整下不整上，对党中央决定提前整風非常抵触。他認为：“这次整風和历次运动一样，又是突然来，思想上沒准备。他对校党委發下的“整風學習討論問題参考資料”第一号（學員在鳴放期間的錯誤言論彙集）非常不滿，認为是“断章取义”“有片面性”；但他却对“有些錯誤的責任是中央的”，“下边問題和上边分不开”，“上边失之毫厘，下边差之千里”等各种謬論，感觉有道理。他把“三害”和中央联系起来，認为：“应该層層檢討，否則三害那一个也解决不了。”他並表示：“有点不相信中央能整。”他对薄一波同志批判基本建設工作中的大少爷作風很抵触；他說：“大少爷作風是那里来的？我就不服气”，“下边的东西是上边批的……好象遇事都說下边，下边有什么办法！”当他看了人民日报攻击某負責幹部領了八百元福利費，和別人談起北京高幹生活補助、住房和小公館等問題时，他惡毒地攻击說：“一切来自北京”。

他还污蔑党的高級幹部都有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上下級是互不信任的。他說：“不要認为我們高級幹部思想上就沒有問題，說老实话，誰敢說沒有一点个人打算，个人計較呢？提意見不联系到自己，什么話都好說，一联系到自己，就不那么好說了，尤其是对自己有直接关系的頂头上司。”他还誣蔑省委書記們对中央的关系，他說：“省書幹部（对中央）就沒有一点意見嗎？人家是想的开，压得住，我們就冒”。

他認为党内可以玩弄“策略”，当別人不同意，指出这是錯誤的时候，他还坚持說：“我認为同志間是可以搞‘策略’

的。”他不仅主張在党内玩弄权术，而且他实际上已經用来对付党和同志。

(五) 他为了掩盖罪行，逃避斗争，在同志間玩弄权术。在运动中他对领导小组和支部委員不断在背后散布流言蜚語，破坏领导威信，借以抬高自己，模糊別人对他的問題的注意。当領導上發現他的問題，讓他檢查时，他不但不交代，反而利用职务，施展資產階級权术，进行拉攏和挑撥，甚至洩露党(支部委員會)的机密，对运动起了破坏作用。如他發現黃霖同志向領導上揭發他的問題时，他竟对黃霖同志歪曲的說：“我在支委会上提議划你为左派，刘晏春同志(付支書)不同意，說：‘他的問題你知道吗？’我对他說：‘人家对你还有意見哩！’”支委会的这些内容是絕密的，但薛为了向該同志討好，竟施展拉攏手段，洩露党的机密、企圖使該同志不揭發他的問題。当組里批判組長楊宏猷右傾思想时，他还以支委身份对組長进行拉攏，他說：“你放心，我不能坏良心哪！咱們小組的几个同志的水平，你也知道呀”。后来組長对他进行批判的时候，他竟質問組長：“我整你的时候就不这样整法呀！这次我可得了个教訓！”

### 三、薛一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

薛一平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他出身于富农兼商人家庭，長时期受資產階級教育，参加过本地地主富农集团間的宗派爭斗，並深受商人意識的薰染。他是在抗日高潮时期入党的，入党时並沒有具备共产主义觉悟，入党后他又一貫驕傲自滿，拒絕党的教育，原来剝削階級本質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因此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他便对我党領導的大規模群众性的階級斗争，逐步由怀疑轉变为反对态度，但是，由于他竭力追求个人名誉地位，所以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态度，在平常是不肯公然暴露的，如他說：“我們要小心，不能犯錯誤，如果犯錯誤被撤职了，孩子老婆怎么办呢？”当校党委动员大鳴大放时，

他對別人說：“咱們都是老油子了，誰還肯提什麼意見呢？”可是當資產階級右派向党猖狂進攻期間，他認為形勢發生了變化，於是他就發表了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向党進攻，暴露了他的資產階級反動本質的原形。

#### 四、檢查態度

當支部對他展開批判鬥爭後，他的態度很不老實，企圖避重就輕，甚至還想把問題推到別人身上，誣蔑批評他的人借機報復；最後經過支部幾次嚴肅批判，他才表示願低頭認罪，承認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並表示願意重新作人。但是檢查的還不深刻。

#### 五、結論

薛一平在資產階級右派向党進攻期間，發表了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攻擊黨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的偉大成就；否定農業合作化優越性，反對山區農業合作化道路，攻擊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歪曲黨的生活，並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和右派共鳴。他的問題暴露後，不但不主動交代，反而玩弄權術，掩蓋罪行，逃避鬥爭，企圖繼續隱蔽下去。根據上述事實，完全證明了薛一平是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立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黨內右派分子。為了純潔與鞏固黨的組織，經支部大會討論通過開除薛一平黨籍。

註：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經支部大會討論，共出席26人，全體一致同意上述結論及開除黨籍的決定。

## 中共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厅支部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志坚党籍的决定

王志坚，男，三十七岁，山西省灵邱县人，家庭成分中农，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九年入党，現任山西省司法厅副厅长、党組成員、党支部書記。

###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和右派分子王文光互相呼应向党进攻。說：“王文光的言論就是对，民主人士就是有职無权。”並且举例說：“支应遜在省法院当院長时还不是这样嗎？重大問題还不是刘秀峰副院長作主嗎？即便党内文件不叫人家看，行政文件为什么也不給人家看呢？”同时，还一再訓斥批判王文光反动言論的同志是“左”傾。

在机关反右派斗争中，对丁仰軒、齐力任等右派分子，不但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反而同情袒护，甚至說齐力任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並且在群众反右派斗争中，威胁积极分子說：“你們积极斗争是为了什么？莫非还嫌机关内的右派分子少嗎？”同时，在群众中散布消极情緒，說：“反右派要注意面”，“小魚翻不起大浪”等等，阻撓反右派斗争的进行。

二、借作机关整風动员报告的机会，向党大肆进攻。誣蔑党是个“大宗派”，並且大声疾呼地煽动群众向党、向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开炮进攻”。（虽然也說到向三个坏主义进攻，但只是輕描淡写地提了一下，而进攻的鋒芒則是对准领导的。）同时，他公然散布“肃反斗争已經胜利結束”的“無敌論”的論調。他还否定一九五五年社会鎮反和机关肃反的偉大成績，誣蔑鎮反和肃反是“往往在人民头上划原子彈”，“破坏了他們建設

社会主义的積極性”。

三、散布流言蜚語，破坏領導威信，並且借整風的机会，在机关群众中心怀惡意地煽風点火，企圖利用群众斗争黃石山同志，把領導搞臭搞垮。此外，还無中生有地捏造事实，挑撥破坏省政法各机关領導之間的團結。

四、歧視、辱罵、打击和排斥工农幹部。但是对有文化、能写材料的人，不管政治情况如何，却都認為是好幹部。

五、对机关党組織的決議陽奉陰違。机关党組决定批判疑似右派分子刘殿墀、中右分子石建中，他会上表示同意，会后在群众中却又說不該批判。对省委和省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也是很尊重的。如去年召开全省律师工作會議时，他不請示省委，竟擅自决定召开。

## 二、斗争中的态度

他的問題被揭露以后，态度極其惡劣，始終是百般狡賴，死硬頑抗，不低头認罪。开始假檢討，妄圖蒙混过关。被群众揭穿后，拒絕檢查，进行反攻，歪曲事实，强詞夺理，說他根本没有反党行为。硬說說王文光的言論对是为了引誘鳴放、釣大魚；並且歪曲說“往往在人民头上划原子彈”是毛主席說的，“共产党是个大宗派”是省委王謙書記說的，散布流言蜚語攻击厅的領導的話是听厅里某些同志說的。他还謾罵批判他的領導同志不公平，是木匠斧子一刀砍；污蔑領導开会批判他是“搞鬼計”；謾罵揭發他問題的同志是品質不良，是“看权势看風勢”。並且还穷兇極惡地声言：“你們真要想把我打成右派，我看还有点困难。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屈，身可杀，心不可死。把我說成反革命也不过是人头落地而已。我什么都不怕，我把善后事宜都准备好了……”等等。表示坚决和党頑抗到底。

根据上述事实，支部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 中共福建省委整風學習班晉江支部委員會 关于極右派分子許集美的結論

許集美，男，三十五歲，晉江縣橋頭鄉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成份學生，一九三九年入黨，一九四一年經黨批准參加國民黨、三青团，地下時期任過黨內支部書記、區特派員、晉惠仙區工委書記、泉州中心縣委書記，解放後任晉江縣長、泉州市長、晉江地委秘書長、統戰部長、宣傳部長等職，現任專員，參加地委常委。其父系前清秀才，是安海一帶封建上層人物的代表地方實力派。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反右派、幹部地方化等重大政治問題上，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在黃國璋、林汝楠、集美們、王一平反黨集團指使下，晉江地區以許集美為首與鄭種植、朱義斌結成反黨集團，乘鳴放之機，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掀起反南下幹部的反黨風潮，阻撓破壞反右鬥爭、包庇右派，利用幹部地方化，積極安排老部下，並以老區作為反黨政治資本，企圖擠走南下幹部，建立獨立王國。

一、在反南下反黨風潮中，有計劃有目的的支持、指使右派在“反南下幹部宗派主義”問題上和右派一齊向黨進攻。鳴放前地委責成他同叛徒陳石和一貫反領導、放鳴前在街上公開毆打肅反幹部的反革命分子鄧傳青談話，許與陳、鄧談後，懷疑組織在肅反期間對他們的正確處理，向他們表示同情說：“我以前不了解，可以看看材料幫助你們解決。”使這兩個反革命分子更瘋狂地攻擊肅反政策。當鄧傳青在大鳴大放會上放出“南下幹部把持局面，本地幹部適當分贓”的反動謬論後，鄧征求許的意見時，許對他說：“有獨特見解，很好，可準備材料再放”。反右鬥爭後，許

还对傅维葵等称赞邓传青有“正义感”。地專机关反党統帥林祖慰放出“張桂如用人唯亲”的毒箭，許也認為“最有力最突出”，往后又耍林祖慰拿出对宗派主义的看法，結合林真的放出“南下幹部組織壟斷，而經濟上也进行壟斷，組織壟斷加宗派主义产生可怕的消極力量”等反党謬論。反右派中林受到批判，許又向林說：

“宗派主义是有的，讓人家批判吧！”泉州市双皮老虎石富海在鳴放会上攻击三反肃反政策后說：“地下幹部象許集美、高景春（許的爱人）我就盖上高樓，終生服侍他們也甘願”，許听后就告郑种植說：“石富海受委屈，可安排为政协委员”，助長了石的反动气焰。在接見党校代表团时又說：“南下幹部与本地幹部問題已成为普遍性問題，現在大家都要我發言，但由于我所处的地位与他們不同，所以要考虑影响問題。”在召开本地四个科局長座談时也說：“我們不能以粗反粗。”並向右派分子伍長順等人說：“你們不要放陈伯达，此人艰苦朴素，你們要放可放地委”，以此来煽动反南下幹部的反党風潮，並得意忘形的到处說：“如果我和郑种植、朱义斌在公园一号召，就会有成千上万人跟着遊行”，充分表現其狂妄的反党野心。不仅如此，而且採取內外夾攻的办法，批准统战部右派伍長順等所拟定参加党外人士鳴放座談会的机关肃反对象陈石、石富海、李克，以及对党不满分子許書紀（許的哥哥）向党进攻。

二、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包庇右派，阻撓破坏反右斗争。反右斗争开始后，許为了保住其反党的政治資本，实现其反党个人野心，污蔑坚决对敌斗争的同志（南下幹部）是“有情緒，受不了，小題大作”。开始就消極抵抗，拒絕地委机关耍他在幹部会上批駁所謂南下幹部宗派主义的邀請，在專署机关幹部会上也閉口不談這個問題，連省委伍書記交代地下負責同志要写文章批駁右派的指示，許和林汝楠、郑种植、朱义斌串联抗拒不写，进而坚持反南下不能划为右派的反党主張，用“既参加地下斗争，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出身成分好怎么会对党有仇恨”等謬論进行



詭辯。后又与郑种植、朱义斌商量抗拒地委要他回机关参加反右派的決議，同时串通林汝楠，利用省委工作组某些同志与地委斗争，有计划有目的的选择所谓出身成分好，历史清白，無反动言論，只有反南下的地下閩西南組織成員右派分子林士輯作为一条綫（三八綫），企圖拉下一批，保护一批，当林士輯綫守不住时，又和郑种植商量，郑提出保住郑星輝（右派）綫就行了，但許还不同意，認為郑星輝綫沒有林士輯綫保得多，前后为陈振亞、林遂錦、張永年、伍長順、丁永影、苏开平、林士輯以及党外人士林任生、黃玉英等十六个右派分子包庇辯护，並直接包庇企圖發動三千人遊行示威，搞大民主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許書紀（許集美的胞兄）。包庇泉州市民盟副主委林任生、学校教員黃玉英等右派，說林过去参加过党，一向靠攏统战部，放的是別人的事，如划为右派泉州民盟就会垮，說黃是黨員黃乐德（許的爱人最信任的）的老婆，有事会跟我們走，不会是右派。

並推翻地委在反右末期，整改初期斗争反党分子的决定，擅自决定把它推迟至整改第四阶段。

三、曲解利用省委幹部地方化方針，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排斥南下幹部，打击新生力量，積極安排老部下，培植地方主义势力積極准备晉位。在一九五七年省老区會議时，郑种植到省开統战會議，許特別交代郑說：这次我不去，怕黃国璋等人有意見，你給他解釋一下，郑到省后，曾三次見黃国璋，交談了本地幹部下放和老区路綫錯誤等問題，郑回来，关起門来秘密向許传达黃的反党計劃，並交代如有意見可打電話給黃，如黃不在可打給饒云山，第二天許即打電話給饒，要給他报一名。事后具体貫徹安排了地下幹部，同时認為“三反”、审幹等运动是有意整本地幹部，受委屈，有不愉快的回忆，南下幹部迟早要走，所以在反右斗争緊張尖銳情況下，不顧整个工作，向省委林一心書記提出修改經他同意过的历史結論，地委要讓張連書記下去鍛煉时，他就提出張連是專門人才不适于搞农村工作，地委要林汝楠来地委当書記时，

他又說林历史上自首过，不能当党委書記。而他則積極要求下去鍛鍊，学会全面領導經驗，地委不讓他下去，他即向張桂如同志說：

“將來要我負責，也要讓我下去，否則搞三五天就垮了”。正因为他野心勃勃，所以積極招兵買馬，安排了以泉州市为中心与全区各县連成一片的地方主义化計劃，除同意地委派郑种植为泉州市委第一書記外，还派所謂商業“小專家”許东汉任市長，管財經，作为郑的助手，並提出顏家澍为市委副書記管政法，后来，又提出和贊同在鳴放中犯有严重錯誤的晉江財貿部長洪肇服任泉州市委副書記，当地委不通过时，許正式提出保留意見，此外还計劃調右派分子郑星輝当文教部長，加上原在該市市委任宣傳部副部長郑种植的妹妹郑秀治計五人均屬許的部下。为便于他們进行地方主义活动，就和郑种植、朱义斌三人集体动员南下幹部市委副書記李春华（地委書記張桂如同志的爱人）到学校，並調出該市宣傳部長賴美泉（閩西人）；对本地幹部較少的同安县不放心，則准备調晉江县長朱义振（本地幹部，許的老部下）同志到同安任县長，讓現任該县第二書記兼县長的林平凡担任县書，將南下幹部地委委員兼县書唐靜同志調党校，在外部許也計劃安排农工民主黨委員陈鳳仪为晉江第一医院院長，民盟盟員林孝良为泉州第七中学校長，以及郑士美（郑种植叔父）为养正中学名譽校長，另外安排省文化局幹部蘭守仁（偽鄉長、偽县參議秘書）为副校長，来培植扩大他的地方主义势力，在整个幹部地方化的安排中，許經常和郑、朱私自研究，然后提到地委会上通过，如辜仲劍、李春华、張孙云、賴美泉以及民主人士林孝良等十多人，並計劃讓代表莆仙的饒云山，代表惠安的朱汉膺，代表泉州的朱义斌，代表閩西南的張連等同志留在地委。

为了达到排斥外来幹部的目的，許几次攻地委，要不要加强学校工作，主要看地委的决心，企圖將南下幹部調往学校，正如他自己檢查說：“將南下幹部从主要崗位降到次要崗位，从党政部門調到其他部門，从本地調到外地”。除了排斥外来幹部，許

去鍛說：正因與全泉州奪財來，在泉州還部進委出不志

對新生力量，如安溪施海濱，惠安陳金元，永春王浩等副書記也主張拉下來。

四、將老区作為自己的老区，喪失立場，許認為老区是地下幹部辛辛苦苦出生入死建立起來的，貪黨之功以為己功，污蔑南下幹部體會不深，照顧不夠，在訪問老区期間，提出所謂“還債”和對地下時期利用過的對象要“分清功過，衡量功過”等謬論，使訪問工作迷失方向，起引混亂，增加了不少本來不是錯案，而成為所謂錯案的案件，同時喪失立場，交代安排地主許從為省政協委員，決定給當過偽聯保主任的蔣報捷摘掉管制分子帽子，同意提前釋放土匪孫垮。

許的這一系列反黨活動，不是偶然的，解放前就企圖脫離閩中地委領導，建立獨立王國，解放後又將統一的黨分為南下、本地、閩中、閩西南，閩中又分為泉州、莆仙，而他則始終以泉州山頭的头子自居，除擁護黃國璋閩中大山頭外，並以泉州為中心，重建獨立王國。在政治立場上很模糊，土改時包庇地霸許志炮，公審反革命分子時不願主持宣判，與資產階級進行稅收等鬥爭，也不願出頭露面，怕得罪人，“三反”肅幹、肅反等政治運動，凡涉及本人或其老部下，則抵觸不滿，污蔑是：有意整本地幹部，對地下幹部特別嚴格，南下幹部不了解白區情況，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等等謬論，個人品質上則經常採取兩面手法，八面玲瓏。功勞包袱，名譽地位思想十分嚴重，未提地委前，則懷疑組織對本地幹部不信任，提地委後又想當常委，當了常委又想當書記，處處表現其極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所以在反南下反黨風潮中起了主導作用，造成反黨風潮猖獗一時，反右鬥爭中又給右派林祖愷撐腰，使林頑強抵抗，一再污蔑說，不是領導搞我（指許），是你們幾個人（指江琦等人）搞我。使整個反右鬥爭不能順利開展。

許身為地委常委、專員，進行了這一系列反黨活動，破壞了黨的團結，損害了黨的利益，模糊幹部階級認識，葬送了不少幹

部，阻碍破坏反右斗争的开展，影响了地委对全区工作的安排和部署，錯誤是十分严重的，性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他在地委开始反地方主义时，不仅不承認錯誤，反以攻为守，首先攻地委張桂如同志，同时考虑地委可能搞他（一）右派，（二）地方主义，（三）右傾等三个方案，因此檢查極不深刻。去年党代会又对郑种植等散布“归去来兮，解甲归田”的消極情緒，同时交代郑种植、朱义斌說：以前三人的关系可交代（实际上关键問題也沒有交代），今天談的不要交代。对党表現極不老实。这次来校学习，因感到作为內部問題，态度有所转变，但仍不够端正，如在开学时說：“党代会压力很大，有些問題我是硬套上，企圖翻案”，辯論曾鏡冰錯誤影响时散布說：“現在还有人認為我是有計劃有目的”，並說：“我要在永安工作就不会犯严重地方主义錯誤，仅不过是严重个人主义”。想推卸減輕罪責，开始檢查交代后又說：“我不是抗拒，就是有些不老实”。最后又說：“反正犯了錯誤，早点处理解决，去当什么都行”的消極对抗情緒，因此就不主动交代問題，經同志們揭發批判斗争后，檢查交代了一些問題，但对其反党事实仍不敢正視，避重就輕或推給客觀。总之，許几次檢查是被动的，一直到現在認為問題不大，还有不通，有抵抗情緒。

根据以上事实及其学习态度，按中央划右派标准第二項第一条規定于六月十三日經支部討論一致通过，並报地委研究决定划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

## 中共上海市委 对右派分子韓述之的处理結論

韓述之，曾用名張綱，男，四十八岁，安徽太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职员。一九四〇年入党。原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一) 反对司法改革，反对鎮反、肃反运动

一九五二年司法改革运动时，公开反对中央司法改革的方針，中央指示伪推事以上的旧司法人員必須坚决調离司法部門，但他却多方为旧人員找借口，企圖留下来。当法院党组坚决貫徹中央指示將旧司法人員調离法院时，他却对旧人員表示惋惜說“过几年你們可以再回来的，成批的調离，不能保証每一个人都处理正确”。

司改后，他利用总结八个月工作为名，否定司改运动的成績。如他攻击华东局、市委負責同志坚决貫徹中央对司改的方針指示是“主观盲动，好大喜功”，說司改对旧人員“採取了是非不分，一脚踢的办法”“司改有的改錯了，留得太少了”，惡毒攻击司改中強調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綫，他說“依靠群众办案是早經否定了，大呼隆的群众运动方式”，“是机械地搬用农村群众运动的經驗，过多地依賴了群众的調解，变成群众怎么說，我們怎么判，随便改，随便判”。去年又同意右派分子王造时、楊兆龙、陈吉墀等就司法工作向党进行了惡毒进攻为旧法招魂，叫囂旧司法人員归队的反动論点。

他对历次鎮反运动也是消極的、反对的。一九五一年大鎮反

时华东分院批評上海市法院处理鎮反案件右傾，他却滿不在乎。一九五五年开展第二次鎮反运动时，中央和市委提出反对右傾，但他說“反右傾是顛倒是非，把‘左’傾当右傾批判了，真是一瀉千里，不可抑止”。他还反对中央少杀長判的方針，說“一九五五年是盲目的長判”，“审判員一判五年、十年，是昧着良心判的”。在审判委员会討論案件时，总是从有利被告出發，甚至为罪犯辯解什么“职务犯罪”“免于追究”，盜窃国家資財是“牟利”等等为反革命罪犯着想，为罪犯辯解。

在肃反运动中，他反对法院成立“五人小組”領導肃反运动，他还公开的講“肃反以来，有些制度給搞乱了”，企圖否定肃反运动成績。

### （二）攻击党对司法工作的領導，歪曲法院的專政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他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領導是極端仇視的。他曾攻击党委不守法，說“运动与宪法的问题，市的領導恐怕注意不够，有的人一搞运动就头脑發热”。又說“党委对审判工作干預太多，象孙乐平这类案件，党委还是少抓为好”。他还污蔑某些人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是“麻木不仁，毫無創見，不会独立思考”，說这些人是用別人的威信或政治上的空洞詞字来掩盖法律上的無知”，他还污蔑党对法制工作的領導，認為党扼杀了法律科学的研究，說“党把一切旧法范围内的东西，簡單地、籠統地目之为反动”，他認為目前的法学研究工作是公式化、概念化，停留在从中央文件和負責同志的言論中找寻字句等等。

### （三）宣揚旧法、污蔑社会主义法制

韓述之的資產階級反动的旧法观点是根深蒂固的。几年来，一直在司法机关中傳布和推崇旧法，毒害幹部。他主張旧法可以繼承，說“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的历史，法律也有繼承性”。“所謂法制建設，决不能理解为历史宝藏加以無視”。他还宣揚坐堂問案，反对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綫，說“开庭是重要的調查方法”，坐堂問案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遺產”，指示下面要“案案

开庭”。公开号召要鑽研資本主义法制，还污蔑苏联的法制，說“也是向資本主义国家所抄襲来的”，在具体办案中他經常提出要参考旧六法。他还主張恢复资产阶级的律师制度，說“律师可以挂牌，成为自由职业”，他还認為“律师应成为反对派”。

此外，几年来，他在政治上一貫表現消沉，每次运动都采取了消極对抗的态度，直到此次鳴放初期右派分子李任民向党进攻，他还認為对整風帮助很大，到反右派时，市委指示挖掘右派，他当时負責领导机关整風，但他却認為法院無右派可反，对市委指示採取抗拒的态度。

## 二、斗争中的态度

經多次批判斗争后，作了檢討，表示願意悔改。

## 三、处理結論

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十級降为十三級）。

# 中共上海市委

## 对右派分子徐亞夫的处理結論

徐亞夫，原名徐煥庭，男，三十七岁，浙江諸暨人，家庭出身伪軍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十月入党。原任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反对鎮反、肃反运动，篡改党的方針政策

（1）徐亞夫自一九五四年主持审理鎮反案件不久，即提出

“打击面太广了”，要防“左”，他主持拟訂的“一九五四年第四季度鎮反計劃”，当时市委政法工委曾予严厉批評，指出是歪曲割裂党的鎮反政策，放縱敌人。不久他草拟一九五四年鎮反总结中，又将打击范围尽量縮小，庇护敌人，政法工委負責同志再度批評他“屁股坐錯了”，但他仍不悔改，特別是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寬一些政策后，他即乘机向党反击，說“当时將我搞的一九五四年鎮反总结拿出来就好了”。

(2) 从根本上否定一九五五年二次大鎮反的必要性和成績。他認為市委政法部門和法院的領導同志貫徹中央指示批判右傾是“說理太少，批評过火”，是“錯了”，又說“這是一股勁反右，以致把不是右傾也当作右傾反掉了”。他曾十四次狂妄地攻击中央和市委对敌斗争形势估計有錯誤，甚至說“現在有兩個主觀主义，大主觀主义是中央，对敌情估計有片面，小主觀主义是审判具体案件不实事求是”，来否定一九五五年鎮反的必要性。他攻击中央“少杀長判”的方針是“盲目从严”並丑化审判員是“象机器一样，一搖五年、十年”。他还誣蔑中央和市委在一九五五年鎮反所控制的捕判数字是“主觀盲目”，因而“濫打濫捉”造成肃反“扩大化”，搞得人家“妻离子散了”。

(3) 在清案中他又別有用心地扩大鎮反缺点和冤錯案件数字，企圖否定一九五五年鎮反成績。他曾故意違背中央和市委一再提出的：檢查一九五五年鎮反案件必須根据一九五五年政策标准的指示，他主張“案件改判不能依一九五五年运动中过左的情緒”，坚决“要依据今年政策”，拒不执行中央和市委指示。他公开指示清案改判組的同志“清案时要用黃紹竑的眼睛”，对反革命主張“設身处地”“將心比心”，因此在他掌握的市捕市判檢查組改判了六二九个案件，錯改錯放的有四八五件。

(4) 反对內部肃反。一九五五年机关肃反开展以后，他就表示反感，說“不要搞得人人自危”。之后他又公开地提出質問“肃反以后那里有新气象”？他对組織对他在肃反、审幹运动中



审查曾表示极端愤慨，认为党不该采取这种“手段”，他还煽动当时被审查的王容海示意“因你是地下党所以整你”。

## （二）企圖篡改法院專政职能，标榜“防錯”

（1）他公开主張法院的主要任务是“防錯”，不應該“強調从斗争出發”。他將毛主席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二十四个字的方針，曲解为“前十二个字是公安局的事，后十二个字才是法院的事”。在公安、檢察、法院三者之間的关系上他片面地極力強調制約，並經常散布不相信公安部門的言論，說“公安局的材料不可靠，不能全部听信”。他还主張在鎮反問題上應該有一个“反对派”能頂得住公安局等謬論。

（2）徐的“防錯”指导思想在办案当中，是以有利被告論、無罪推定論等一系列的論点为罪犯开脫罪責，庇护和放縱敌人。他把寬一点政策曲解为“坦白不究”“既往不究”，宣揚所謂“朋友論”“分化論”“長期徒刑犯人失望論”等等，將許多罪大惡極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予以放縱了。

## 二、斗争中的态度

經多次批判斗争后，作了檢討，表示願意悔改。

## 三、处理結論

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十一級降为十四級）。

## 中共上海市委 对右派分子鞠华的处理結論

鞠华，男，四十六岁，山东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四月入党，历任秘書、縣長、專員、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办公室主任等职。前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長、党組組員，党内曾任司法局党委書記。

###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 在右派分子譚惕吾来滬借“視察”司法工作为名，收集反党“資本”期間，鞠华主动的向譚提供了大量的内部机密材料。在譚“視察”后鞠华又表示譚污蔑和攻击社会主义法制的反动言論是“宝贵的建議”，要“分別研究解决”，内应外合地向党进攻；

(二) 鞠华与右派分子楊兆龙在南京認識后，关系一向很密切。一九五五年市委安排民主人士时，鞠曾推荐楊任司法局副局長，在提名后还担心不被批准。在反右派斗争期間，鞠华参加斗争楊的會議时除一言不發外，会后还把严肃的政治斗争歪曲成为“学术性的爭論”，支持楊的反党活动；

(三) 同时供給右派分子王造时向律师协会要的所謂“違法乱律”的材料，为右派分子提供反党資本；

(四) 指責蓬萊区院前副院長右派分子馮玉培不應該写攻击“党内由公安、檢察、法院三長共同决定处理案件是違法”，“一九五六年清理人犯是違反法制”的大字报，破坏党組動員“鳴放”的决定，給右派通風；

(五) 長期以來，对党抱着离心离德，疏远对立的态度。三反运动中，鞠因思想严重右傾，領導运动不力，受到停职反省和党纪处分后，对党心怀不滿，耿耿于怀，抱着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态度，甚至喪心病狂地認為在党的领导下，他“总不會有好收場”。

## 二、斗争中的态度

經多次批判，指出其錯誤的严重性后，才承認了自己的反党言行，並作了檢討，表示願意悔改。

## 三、处理結論

开除党籍。降职、降級、降薪（由十級降为十三級）。

# 中共上海市委

## 对右派分子关百胜的处理結論

关百胜，四十四岁，山西人，一九三八年入党。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盧灣区人民委员会区長，中共盧灣区委常委委員，盧灣区人委党组書記。十二級。

###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 污蔑領袖。当“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發表时，惡意地攻击說：“事情是他（指毛主席）惹出来的，当然他要講話了。”並公开說：“現在不行啦，毛主席也有官僚架子啦。”

(二) 企圖取消党的領導。曾多次提出要取消区人委的党组，說：“党组作用不大”，“人委党的組織不要有二套”。並

主張取消党对宗教工作的領導，說：“不要管到教会內部去。”

(三) 積極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当关收到右派分子黃苗夫的反动小册子后，回信支持，要他“繼續發揚知無不言，言無不尽的精神”，以致得到右派分子的“感激”，認為他的反动活动“是与陈、章（乃器）、关（百胜）三公的指示分不开的。”当群众要求撤掉黃的职务时，竟說：“撤职对他沒有帮助”，“对右派分子不要一棍子打死。”並攻击市委召开宣傳會議是“名不符实。”

(四) 攻击肃反运动。曾公开在会上說：“教育科肃反的成績是次要的，还是主要的？要研究。”污蔑区人委机关肃反“浪費了不少錢，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打击肃反外調幹部說：“如果出去參觀我也願意”。並攻击党的肃反政策，說：“胡風、饒品梅都是以反革命逮捕，但到現在也沒有判決。”

(五) 支持鬧事，到处放火。公开号召可以將“不称职的科長拉下来”，並利用某些基層幹部工作叫苦的情緒在群众中进行煽动。对艺徒鬧事，則說：“这是我們的錯。”

## 二、斗争中的态度

开始态度恶劣，拒不承認事实，經数次斗争，才被迫低头承認；斗争后表現尚好。

## 三、处理結論

开除党籍。降职、降級、降薪（由十二級降为十五級）。

## 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

### 关于右派分子邓声永的政治結論

邓声永，男，現年四十一岁，湖北汉川县人，本人成分私塾教师，家庭出身富农（其父在土改时被捕押，后病死）。其本人曾于一九三七年在伪湖北省隋县乡政人員訓練班受訓四个月，並在受訓时集体（約一百余人）宣誓参加复兴社忠义救国会；一九三八年当过联保主任四个月。邓于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二年二月入党，历任县府副科長、科長、区長，南昌市法院副院長、院長，一九五三年二月任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 一、主要反动言行

1. 同情与包庇右派分子刘文濤的反动言行。一九五三年右派分子刘文濤調往中南學習，省委統战部指定省法院党組进行一次鑒定（刘未参加），張元暉同志（当时任庭長）提出刘文濤接受反革命家屬賄賂，包庇伪县長，还有人提刘偷看党内文件，鑒定整理后，邓借口原則一点，沒有通过党組，也沒有讓張元暉同志知道，把这些有关政治性的重大問題統統勾掉了。一九五六年初，邓、刘同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三屆司法會議，小組討論时刘文濤攻击江西肃反是“戴上一頂‘血債累累，民憤重大’的帽子，就把人杀掉了”，当即遭到朱开銓院長的駁斥，而邓声永身为大組副組長及江西小組長，不但沒有反駁，而且还在会后責备朱院長“态度不好，方式不好，使刘文濤不得下台”。

2. 为右派分子刘文濤打气，鼓励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在党决定整風之后，邓（当时在高级党校學習）便積極地向刘文濤写信打听江西鳴放情况。当刘在省委統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

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上大肆攻擊黨的人事、保密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等謠言在江西日報公布後，鄧於六月二十九日由北京寫信給劉文濤大加贊揚，說：“你的發言我都看了兩遍，問題提得具體，觀點、立場明確，內容豐富……。”

3. 毀滅罪証，以死威脅組織。當右派分子劉文濤的反黨事實被揭發以後，鄧於九月二十一日請假回南昌（高級黨校未結業）向劉文濤要還了原信，予以毀滅，並借病去廬山休養，企圖逃避罪責。當劉文濤在民革整風會上暴露這一問題後，法院黨組於十月七日打電話查問時，鄧一口否認，並於十月十七日寫信給朱院長說：“這完全不是事實，要求組織上對我進行考查，追究劉文濤這樣無中生有的責任”。鄧從廬山回南昌後，對司法廳副廳長張阜民同志說“這個問題如果不搞清楚，我考慮活不活下去的問題。”

4. 利用職權散布資產階級“司法獨立”的反動觀點，抗拒省委領導。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鄧寫的“關於吉安、廣昌、南城、臨川、贛縣人民法院及吉安、贛南、撫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一至八月鎮反審判工作的檢查報告”中，把黨對法院審判工作的領導關係說成是“配合”關係。鄧說：法院工作是“在黨委和有關部門配合下……。”這個報告是鄧個人署名的。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三月間，經省委批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有二十四起，鄧（當時負責全面工作）未請示報告，借口法律手續不完備（原來法律手續是完備的，按新頒布的法院組織法對照法律手續有欠缺）不予執行，全部退回各地補辦法律手續，並說：“錯了我負責。”

## 二、其他錯誤事實

1.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二、三月間（鄧負責全面工作時），省高級法院受理死刑復核案件一百四十件，事實全部清楚，就是按照法院新的組織法手續有些欠缺，就一件未予批准，

全部退回各地，事後也未抓緊督促處理，造成該殺的不能及時杀掉，影響對敵鬥爭的開展。

2. 一九五五年鄧帶一個工作組去豐城檢查工作，帶回一百多件案例，其中地、富佔百分之八十以上，鄧却認為錯了，應該釋放。黨組沒有通過他的檢查報告，但鄧還是將當過三年多保長，捉過壯丁，歷史上有罪惡，解放後又造謠破壞的分子趙日秋改判為教育釋放（原判二年）。

3. 鄧在南昌市法院任院長時，法院開設的群力米廠在救濟蘇北災民的食米中摻了雜，給群眾影響很壞，江蘇調糧指揮部派人來江西追查，當時決定將主謀摻雜的蔡振宇（現在市法律顧問處工作）押起來，鄧對江蘇來人說“人已押起來了”，實際是把蔡送到看守所幫助填寫犯人名冊，並沒有押。江蘇調糧指揮部來人要去看看守所查問時，鄧即派歐陽明同志（現任市法院院長）前往賠禮請酒，另一方面親自主使會計將米廠摻雜所獲利潤賬簿毀掉一頁，偽造另一頁裝上。

4. 與右派分子劉文濤一貫志同道合，經常拉拉扯扯，無話不談。一九五七年春節鄧從高級黨校回來，劉請鄧吃飯，鄧將在學習期間所寫的以肅反為中心的個人思想總結給劉文濤看，請劉提意見，並根據劉的意見作了修改。在一九五六年評工資級別時，司法廳秘書副主任李勳原來準備提二級，鄧有意見，對劉文濤說：“李勳不應提二級，我是無所謂，你應該提一級……”司法廳提劉威華、熊雄二人為副科長，鄧又對劉文濤說：“劉威華、熊雄提得太快了，不應該提拔。”這二件事鄧雖不承認，但確是事實。

5. 在幹部政策上，一貫輕視、排斥工農幹部，而對未經改造的舊知識分子卻很有感情，特別重用。一九五三年六月鄧在一次會議上說：“法院增加編制要選擇文化高的，工農多了，恐怕有第二次司法改革”。（鄧交待是前最高法院中南分院李光斗副院長在電話中和他講的，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李光斗同志來

信說明並無此事)：一九五〇年八月邓在監獄問案時，看見女犯人文昭長得漂亮，竟不請示組織，擅自將她（當時刑期未滿）調到市法院當文書，經常找文昭逛馬路，進行玩弄，又叫一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徐日彰（鎮反時已伏法）為文昭母親找房子，在群眾中影響很壞。市法院一旧職員吳植本寫的判決書，給歐陽明同志改了几處，邓又給改轉過來，邓並要提拔吳植本（三反中發現吳賣案不少）。邓調省法院沒有几天就拉余寄生（肅反對象）入黨，以後又提出提拔余寄生當科長（省人事廳未准批）在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余是肅反對象，一九五六年三月，那時余尚未作結論，邓就指定余寄生起草“一九五五年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審判經驗初步總結。”

省委整風領導小組已批准將邓声永划為一般右派分子，予以開除黨籍，撤消原有職務，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工資待遇由十二級降為十六級的處分。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

## 中共四川省人民委員會辦公廳 總支第四支部關於開除右派分子 李俊成黨籍的決定

李俊成，男，四十四歲，原籍廣東大埔縣，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學生成分，一九三五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三六年轉為正式黨員。歷任：一二〇師教導團政治教員，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副主任，西南公安部二處處長，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副院長，四川省人民委員會政法辦公室副主任，省政法黨組副書記。

李的養父是惡霸，在一九五三年被我鎮壓（已交待）後，他常表



示不滿，說：“有些罪惡不确实”，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

本人历史上一九三七年七月脱过党，后在太行經北方局恢复关系。李坚持反动地主阶级立場，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一、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他叫嚷：“现在党政不分，党委管得太細”，攻击“乡村普遍存在着党、政、社不分；使基層政权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竭力主張“法院独立审判”、“垂直领导”，反对党委过問案件，提出“先由法院审判，再由党委审批”。捏造“清案中埋怨情緒严重，埋怨錯在党委和公安”，“各地錯案不少，本应报党委后立即平反，但因有种种顧慮，迟迟不予糾正”；誹謗“公安机关粗糙，不慣于遵守法律，党委偏听偏信”，謾罵“达县地委领导的清案小組是烏合之众”，誣蔑“党委审批死刑案件，明知証据不足，先批死刑，后查事实”。达县專区郑成学貪污案，右派分子朱乐秋不执行地委決議，拒絕判处徒刑，李公开表示讚同和支持。去年省委批評政法部門严重右傾，他不但不积极貫徹和檢查糾正，反而声称当前“左”是主要的，並要省檢察院、法院搜集下面“左”的材料，妄圖用此来反抗省委的正确批評。他还散布謠言，挑撥和破坏中苏关系。李和其亲信右派分子潘久維、袁鑑、侯开潮等，都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有的又是伪司法人員，政治上很反动，有强烈的个人野心，資产阶级旧法观点严重，情投意合，互相吹捧，互相包庇。由于原政法办公室支部長期处于瘫痪状态，对坏人坏事一直没有展开严肃斗争，因而这些臭味相投、政治上一致的人，逐步糾合成宗派小集团，一方面散布种种謠言，竭力反对党的领导，惡毒攻击無产阶级專政；另一方面他們投机取巧，对党陽奉陰違，当面老实，背后謾罵攻击，丑化和誣蔑党組领导同志，挑撥党和群众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同时他們还宣揚腐朽的資产阶级生活方式。

二、反对無产阶级專政，攻击一九五五年鎮反运动。他一貫

不願听鎮反成績，到处煽動說：“鎮反案件質量低，缺點、錯誤嚴重”。一九五六年中央司法部巡視組來四川檢查工作，右派分子潘久維等綜合由他簽發的六個簡報，都是惡毒攻擊黨委，否定鎮反成績，夸大缺點錯誤，中央司法部王懷安前年來我省時，散布一系列極其反動的謬論，惡毒攻擊大邑等地一九五五年的鎮反，李當時竭力贊同和支持，前年省黨代表大會上，李听了閻秀峯同志代表省委所作的報告後，認為：“鎮反存在的缺點提得不深，錯捕好人不是個別的”，而對右派分子黃紹竑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攻擊浙江、上海政法工作的謠言，却大加讚賞和推崇，認為“黃對於判案中的違法問題，提出了比較深刻和嚴重的問題”。羅部長在全國第六次公安會議上講話時，對一九五五年鎮反成績、缺點作了正確估計，右派分子潘久維誹謗“羅部長粗暴，不懂法制，掩飾錯誤”，李亦隨聲附和說：“從法律上講，羅部長的報告就是站不住腳”。右派分子潘久維等在所寫一九五五年審批死刑案件總結中，捏造各地報來審批的四百四十一件死刑案件，主要事實不清的達百分之五十一點九，量刑失當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二，李即借此攻擊鎮反，說“經過層層審批的死刑案件尚如此粗糙，其他案件可以想見”，誹謗“我們整個指導思想打擊面過寬，在判處上有重刑思想”，多次提出要檢查死刑案件。在清案工作中，他熱衷於查冤錯案，不談防漏防右，認為“捕後教育釋放和取保釋放都是錯捕的”，提出“冤錯案比例小的地區就是查得不深不透”，主張“事實不清的案件，一律先撤銷原判，重新調查審理”。他為了否定鎮反的必要性和正確性，從黨的領導、幹部作風和法制等方面，進行了極其惡毒的攻擊和誣蔑。他歪曲事實，叫囂“領導上作了某些違法和不切合實際的佈置，分配的鎮反數字有很大的盲目性，交待政策不清，運動中催得很急，形成過分緊張，下面當成生產數字去完成，造成不重質量，打擊面過寬，打擊不准，甚至錯打的現象”；攻擊“群眾運動和專門機關的工作沒有很好結合起來，加上‘一竿子到底’的錯誤作法，群

众檢舉揭發材料未認真調查對証，全憑公安、檢察機關移送的材料辦事”；誣蔑我們“把某些群众基于所謂响应号召提出的怀疑和意見，以及某些群众被恐吓威逼出的虛構檢舉材料，也当成法律上論罪科刑的依据，甚至明知不實而予以夸大歪曲，以达到拼湊数字完成任务的情形”，詆毀“党委根据这些不实事求是的材料，不可避免地会作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审批，法院則机械按审批意見草率結案，甚至明知已錯，也要照批示宣判，檢察院則默默無言，安然無事”；誹謗“某些幹部在批判右傾麻痹后，錯誤的以为可以‘左’一下，往往怕批評喪失立場，腦子一時發熱，就盲目打击”，“某些幹部法制觀念薄弱，甚至品質惡劣的現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大肆散佈“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和草率判处的結果，往往違反人情常理，越出打击界限，打到許多本来可以爭取改造和应当坚持教育的人的头上，甚至打到某些基本群众和完全無辜的好人头上”等謬論。

三、散佈資產階級法律觀點，为罪犯开脫罪責。李十分欣賞資產階級法律觀點，推崇封建王朝的法律，認為“唐律是一部好法律，歐陽修的縱囚論和雙網千表很有閱讀价值”，工作中常参考这些东西，並到处宣揚反动的“無罪推定論”和“有利被告論”，說“律師在法庭上不能講对被告不利的話，犯人未經判決之前，都是無罪公民”。对于累犯再提再判，他竭力反对，叫嚷“世界上沒有这个法律”，攻击“审判人員不懂天理，不問人情事故”，主張“上訴案件只能減刑不能加刑”。对沒有改造好的犯人，他也主張提前釋放，認為“提前釋放，可以使犯人感恩”。認為“判刑乱世要重，治世要輕”，誣蔑“我們处理死刑案件”对罪犯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認識不足，对促成犯罪的各方面的因素和犯罪者当时所处的环境、情况及犯罪的复杂心里状态等考慮不够，思想感情上往往容易受犯罪手段殘酷和后果严重所激动，存在着对杀人犯一定要处死的报复主义情緒”。总之利用各种借口为罪犯开脫罪責，縱容敌人破坏。

四、思想蛻化，道德敗坏。李貪圖享受，生活上講排場，特殊化，經常吟詩賞花，晚上多是看噩夢、唐詩等。同時喜新厭旧，道德敗坏，嫌爱人（黨員）文化低不漂亮，制造借口和其鬧離婚，長期暗中和黃××乱搞男女关系，利用职权將黃拉入党內。

这些事实表明，由于李拒絕党的教育和自我改造，已墮入資產階級右派泥坑，其罪惡是严重的。目前他虽然承認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表示願意悔改，重新作人，但檢查时強調客觀影响，很少接触真实思想，对宗派小集团等問題交待不徹底。根据李的問題性質和反省态度，按照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精神应划为右派分子。並經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李俊成党籍，建議行政上給予应得处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

## 中共安徽省監察委員會

###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方碧溪党籍的决定

方碧溪，男，湖北省蕪春县人，現年三十七岁，家庭貧农出身，本人学生成份，一九三九年九月入伍，一九四〇年五月入党，历任文書、机要員、副科長、副局長、县委宣傳部長、縣長、省人民監察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現任監察厅副厅長（党組成員）。其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趁整風之机猖狂向党进攻，否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領導。方在高級党校學習时，污蔑“中央有許多事是搖搖不定的”，“中央管不了的事也要管”；“許多技術人員積極性不能發揮，主要是‘怕’，有顧慮”；城市建設是“盖花园比賽、买汽車比賽、盖大樓比賽，百廢俱兴都很关心，但对公共財產誰也不

管”；“安徽每年撥几百万救災費，但災民問題並未解決，原因是官僚主义報災不實”；“官僚主义發展很快，特別是高級幹部只能說好，不能說坏”；並把一個縣基層幹部的強迫命令作風誹謗為“官逼民反”。他攻擊社会主义制度，反對統購統銷，說：

“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有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排队我不贊成”。方未到高級党校學習以前，早就叫囂“家里粮食不够吃”，“統購統銷不能不給人吃饱”，並謾罵：“日他妹子的，我非把小孩摔死！”在幹部、群众中造成了極坏影响。

二、坚决反对党政領導。尤其在他負責監察厅党政全面領導工作期間，反党气焰更加囂張。如省人委第一座辦公大樓未分給監察厅，方即心怀不滿，聲言“草房辦公室倒了砸死人要办公厅負責”，“一天不給房子我天天要告！”当省人委拆房兴建第二座辦公大樓時，方又借反浪費之名，攻擊省人委的領導，表示“杀我的头也要坚持檢查和上告！”並背着省委几次報告監察部，要求監察部派人前來檢查。当上述陰謀未能得逞時，又以家信沒有收到，而污蔑省委“暗中审查”他的信件，污蔑張愷帆副省長对他“打击报复”。当机要員到方宿舍寻找电報時，方竟污蔑是組織上派人搜查他。又如監察厅檢查第四工地与被檢查單位的意見分歧問題，省委負責人已指示工業交通工作部和省监委組織有關部門进行复查，但方竟私下派人到監察部請示窩工浪費的計算方法，並瘋狂叫囂：“監察部如同意我的計算方法，回来非狠狠地整他們一頓！”又說“工業交通工作部不相信我們，快打电報給監察部，要求監察部派人來查”。几次叫人写社論、新聞报导，說“写它个万把字，安徽日报不登，寄到人民日报去”。

三、違抗決議，破坏集体領導。如將全省監察工作會議決議对二十个百貨單位的事題檢查，擅自改為推動全省商業系統的大檢查；有次召开專、市監察处、局長座談会，不經集体研究，他对監察部減少專題檢查和檢查生产救災等重要指示根本不作傳達貫徹；全省監察机关的体制問題，原經党組研究已上报省委同



意，但方仍擅自主張保留派駐省直个别監察室，突行“垂直領導”。

四、与右派分子陈仁剛有共鳴之处。当陈別有用心的到方宿舍密談反对省委反右指示問題，方对陈說：“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多做工作少說話，有些問題很难講……”。

綜上所述，說明方碧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是严重的。他虽出身于貧农家庭，但由于存在着資产階級極端个人主义，入党后長期沒有得到改造，每当个人慾望不能遂意时，就对党不滿，与党对立，以致蜕化变质，完全墮落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支部大会討論通过，並报請省委批准，决定开除方碧溪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